
桃花坞人物春秋
胡伯诚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桃花坞，虽然占地约苏州古城区的十一分之一，但这地方有点特殊，首先是它在全国的知名度，譬如，妇孺皆知的唐伯虎，就住在桃花坞，全国各地来人寻访他遗迹的，至今络绎不绝；桃花坞木版年画，也是全国著名。就从小处来说，清末慈善家谢家福在上海的办事处，就称“苏州桃花坞赈寓”。至于历代咏唱桃花坞，更不知多少。这可以说明，“桃花坞”这三字，是有点文化含量的。


ISBN 978-7-5474-0362-4
9 787547 403624 >

定价：32.00元

桃花坞人物春秋

胡伯诚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花坞人物春秋 / 胡伯诚著. -- 济南 :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2.2
（桃花坞书系）
ISBN 978-7-5474-0362-4

Ⅰ.①桃… Ⅱ.①胡… Ⅲ.①历史人物 – 生平事迹 – 苏州市 Ⅳ.①K820.8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6624号

责任编辑：徐峙立
装帧设计：周　晨
主管部门：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山东画报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sbs.com.cn
　　电子邮箱　hbcb@sdpress.com.cn
印　　刷：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142 x 210 毫米
　　　　　7印张　29幅图　120千字
版　　次：2012年2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32.00元

目　录

前　言

本书写桃花坞历史人物四十馀人，原拟设十四个篇章，但置于桃花坞历史名人之首的泰伯，已由诗人、学者朱红先生操刀，写了《细说泰伯》，单独刊行，故本书不收泰伯其人。其馀十三篇，由在下滥竽充数，累计得十万馀字，是为《桃花坞人物春秋》。

桃花坞，虽然占地约苏州古城区的十一分之一，但这地方有点特殊，首先是它在全国的知名度，譬如，妇孺皆知的唐伯虎，就住在桃花坞，全国各地来人寻访他遗迹的，至今络绎不绝；桃花坞木版年画，也是全国著名。从小处来说，清末慈善家谢家福在上海的办事处，就称"苏州桃花坞赈寓"。至于历代咏唱桃花坞，更不知多少。这可以说明，"桃花坞"这三字，是有点文化含量的。

桃花坞地处苏州城北，历来荒芜与繁华兼容，市井与风雅并存，世道轮回，沧海桑田，在桃花坞似乎特别明显，时而兴，时而衰，上一代人或许看到华屋连绵，而下一代人或许就看到菜花遍野，这是苏州区域文化中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

历史上,苏州城北向是居人麇集,官宦士绅第宅犹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原因不外乎有这么三条:

其一,从城市的布局上看,不知是哪一代老祖宗定下的,城圈内,南部是官衙区,北部是居民区,东部是作坊区(以丝织为主),中间乐桥周围是商业区,这是苏州城内的大致格局。

其二,俯瞰苏州古城,城东娄门,城西阊门,并不在苏州城的东西居中,而是偏向城市的北部,这两座城门分别连接第一横河的两头,这是苏州的形胜所决定的。东出娄门,连接娄江,即至和塘,经太仓浏河出海;或向南,顺京杭运河而下,过吴江去杭州;或往北,经元和塘可往常熟方向。由第一横河的另一头,出阊门,经枫桥塘,又连接京杭运河北上。古时的交通主要是水路,这就意味着那里交通非常方便。

其三,当然是地价。桃花坞地区北沿城墙,闲置地块多,地价相对便宜,具备建造大宅院的绝好条件。豪门巨族集居之处,又最容易遭受政治性摧残。譬如,改朝换代、异族入侵,首当其冲。但旧贵族消亡了,新贵族又会崛起,在桃花坞这个舞台上不断地上演。至1949年前,北园、桃花坞,以及城南的南园,这些苏州历史上曾经的贵族区,均沦落为苏州的菜园子。《桃花扇》云:"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似乎说的就是这地方。

所以,纵览桃花坞历史,读到的就是一部苏州的兴衰史。

桃花坞在汉代时就相当著名了。东汉的大富豪皋伯通住在此地,从事商业开发,有诸多门店,还留下了一座桥:皋桥。以皋桥为标志物,引出唐寅唐伯虎,他的父亲唐德广,曾在皋桥头开一家小酒

楼,唐寅后来在桃花坞建造桃花庵,他是生于此,死于此的人物。还有一位,是因为他著有《皋桥今雨集》而找到他的,他叫舒位,是乾隆年间的诗人,是为“吴地三君”之一。舒位是个全才,他通晓音律,能吹笛鼓琴,所作戏曲,人称当行,有《圆圆曲》、《琵琶赚》等词曲杂剧数种。舒位还能书善画,山水、花鸟、人物、草虫,均师青藤。

桃花坞后板厂也是个显赫的地方,本书有四位传主在后板厂生活过,他们是李模和李吴滋、蒋灿和蒋深。李模是明朝崇祯初年的浙江道监察御史,有《请浚吴淞白茆并复设治水部臣疏》,收在《吴中水利全书》中,说明他是关心苏州地方政事的官僚。崇祯十五年(1462),吴县知县牛若麟编纂刊行《吴县志》,李模为之作序,另一个作序的是徐汧,从中可以看出李模的政治态度,他至少是同情复社的。李模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收藏了《烬馀录》,并完成了《烬馀录注》。关于这部书,下面还要说到。李吴滋是李模的父亲,官至湖广按察副使,有政声,李模父子都入祀在沧浪亭的五百名贤祠。后板厂的另两位业主,一位是明朝天津兵备参议蒋灿,另一位是绣谷园主人蒋深,都是可圈可点的人物。

桃花坞之得到极大的开发,要归功于北宋名将、同知枢密院事章楶。北宋一代,辽国的势力尚未养成,主要的外交麻烦在西北边境。西夏地方,原本是党项部落的领地,其领袖拓跋氏,世袭为唐宋的部将。唐朝末年,夏州裨将拓跋思敬帮助唐僖宗征服黄巢,赐姓李,拜夏州节度使。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李元昊即位,党项族开始崛起,宋朝的西北边境不安宁了。

章楶主持对西夏战事后,采用“浅攻之计”和“进筑之策”,非常奏效,终于将西夏搞定,西夏皇帝李乾顺上表归顺宋朝。宋哲宗激动得涕泗横流,赶到裕陵,向神宗祭告,一诉衷情。章楶为大宋创非

常不世之功，不但他同时代的其他经略使，诸如范纯粹、吕大忠无法与他相提并论，就是大宋一代名臣韩琦、范仲淹也无法比拟。

章楶是当时的华夏第一人。

章楶定居苏州后，在阊门城北买田置屋，“广辟池沼，旁植桃李”，题名“桃花坞别墅”，人称“章园”。章园很大，“广七百亩”，园内阡陌交通，溪流萦带，暮春三月，菜花油油，黄金布地，一望无垠，一直连到后来的章庄敏公祠。按今天的地理概念，已过人民路，到装驾桥巷了，甚至延伸至齐门北园一带。可见，宋代桃花坞，地域很广。但靖康国难后，章楶的桃花坞别墅成为金兀术南下的主帅营盘。金兀术北撤时，一把火将章园烧了。

宋元之间，桃花坞有四位人物值得一说。文天祥和张世杰，宋朝的忠臣良将，民族英雄。文天祥有文山祠（后改称寺），张世杰有张文忠祠，均在桃花坞。两人都身居枢密使（国防部长）的高位，都曾经身兼平江知府。这两位是宋朝的收尾人物，死得不仅壮烈，而且有气势。宋亡后，桃花坞又出了两位遗民。一为徐大焯，自号城北遗民，其人于史无传，《江苏艺文志 · 苏州卷》对他的介绍只有四个字，“元吴县人”。但他留下《烬馀录》二卷，是一部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是治宋元史的案头必备之书。这部著作曾经另一名桃花坞人李模的整理和注释，成为今天能看到的《烬馀录注》。另一名遗民的名气更大一点，他叫郑思肖，写了一部《心史》，历记南宋沦陷之悲，元朝腥秽之政，诗文奇僻，议论慷慨。郑思肖将其著作藏在铁函里，封锢极严，其缝隙用锡汁灌注，沉在承天寺一口废弃多年的古井里，待到明崇祯十一年（1638）发现，它已湮没三百六十多年了，世称《铁函心史》。梁启超先生非常推崇《心史》，每读完一篇，热血就“腾跃一度”，他说：“此书一日在天壤，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

永无尽也。”

明代,桃花坞着实出了几位本土人物:唐寅、杨成和文震孟、文震亨兄弟。

唐寅,是有明一代最受苏州人喜欢的画家。苏州人喜欢他,不一定是他的画。他在世的时候,画的生意并不好,否则,就不会常常揭不开锅了。苏州人也许更喜欢他的诗,喜欢他用幽默玩世的姿态,来化解对现实世界的反叛。唐寅身世凄凉,又风流倜傥,这种生活姿态,是苏州小市民所企望和追求的。桃花坞没有了唐寅,将黯然失色。

杨成,他是桃花坞五峰园的始创者。五峰园的卖点是园子里的五座峰石,是苏州园林中最古老的石峰,据说“丈人峰”和“观音峰”尚是汉晋遗物。五峰园占地不大,今已修复,并对外开放。睹物思人,杨成是本书最值得写的人物之一。他的儿子杨大溁、孙子杨廷枢,都是苏州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本书用较多的笔墨来记录他们祖孙三代。本书借杨廷枢,写到了天启年间的那次“苏州民变”。“苏州民变”常常被称作“五人之义”,它是怎么个过程?周顺昌、吕纯如、魏大中、陈文瑞、顾秉谦、毛一鹭、徐如珂、李实、魏忠贤等人,在这次事件中如何表现?这次事件如何起因?又如何收场?本书都运用历史资料加以阐述,也是本书写得比较用心的地方。

文震孟、文震亨兄弟,在苏州文化史上有重大影响。他们留下了艺圃和《长物志》,弥足珍贵。文震孟在天启、崇祯两代皇帝手中的三起三落;文震亨的恩贡与最终成为崇祯帝的中书舍人,都有许多故事与因果关系。对此,本书都作了相应的剖析。姜埰、姜垓兄弟,是艺圃的后主人。姜埰与崇祯帝,姜垓与阮大铖的恩恩怨怨,并不是简单的忠臣与昏君,或忠臣与奸臣的关系,也很有趣。

因为写到了艺圃主人，就得把桃花坞的历史地理概念清理一下。从区域界限而论，桃花坞可分为古桃花坞、旧桃花坞和今桃花坞三个历史阶段。古桃花坞很大，从桃花坞大街向东一直延伸到齐门，均为桃花坞。那时，齐门大街、临顿路，是苏州的南北中轴线。旧桃花坞比古桃花坞小多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东侧，从齐门大街一线退缩到人民路一线。老苏州人记忆中的桃花坞，就是这块地方。本书中的桃花坞，比旧桃花坞有所扩展。根据平江区制定的"桃花坞历史文化片区综合保护整治利用工程"的规划，将专诸巷、长船湾、天库前、宝林寺前这一块也通盘规划进去了，所以，本书写到了与艺圃有关的文震孟、文震亨、姜埰、姜垓等几位。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否则，老苏州要不买账的。

桃花坞在明代显得非常光辉灿烂。到了清代，桃花坞出了两位状元，陆肯堂和陆润庠。陆润庠与陆肯堂同宗，相隔五代，一为同治状元，一为康熙状元，绵延一百九十七年。虽然贵为状元，但陆肯堂寿短，《清史稿》居然无传；陆润庠则已处大清晚期，都没有什么大作为。

晚清时的桃花坞，倒出了两位名绅，谢家福和费树蔚。就全国而言，谢家福是著名的赈灾慈善家；就苏州而言，他镌刻了《五亩园小志》，编撰了《望炊楼丛书》七种三十卷，为苏州文化留下一丝血脉，他对苏州是有贡献的。费树蔚，苏州电气公司董事长，信孚银行董事长，与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为儿女亲家，与柳亚子谊属舅甥。费树蔚字仲深，与另一名绅张仲仁，并称"二仲"，为苏州人做了许多好事，苏州人应该记得这两位先辈。

自从司马迁创本纪列传，人物传纪成为记录历史的一种主要形

式和手段。笔者在写本书时,力图将传主放在他的那个时代来描述、来考评,这就涉及到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形态、社会风俗、典章制度等等。笔者努力这般做了,至于做得好不好,尚有待读者诸君的评判。

因为写人,必然要涉及他的周边社会关系,涉及到他的亲友、同僚,有些甚至还得花不少笔墨。这个办法是跟高阳先生学来的。他的《柏台故事》写了清代的二十七名科道官员,而附记的人物高达七十六名,将传主的社会关系如剥茧抽丝一般,细细道来,也能引人入胜,从中得到阅读的满足感。笔者的胆子比高阳先生小多了,写了四十四名传主,附记人物四十四名,对半开。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如何?有没有喧宾夺主之嫌?也有待读者诸君的评判。

皋伯通　梁鸿　孟光
附记：要离

就因为皋伯通做了一件好事，收留了梁鸿孟光夫妇，皋伯通就名满天下，并在桃花坞中市街留下了一座桥，名为皋桥。苏州有很多古桥，唐宋元明建的，都称古桥，但汉以前的不多。皋桥，得名于东汉初，距今约二千年。

关于皋伯通，留下来的资料实在是少。《吴郡图经续记》是苏州今存最早的方志，对他的记载仅几十个字，从中我们得知，皋伯通，字奉卿，皋桥乃是他的所居之地，他生前是汉朝的议郎，死后葬在胥门之西二百步，后人称为"伯通墩"。从这份极简单的简历中，惟一有点价值的，知道了皋伯通的身份"议郎"。郎在中国古代官制中，历来属于中高级这个层面，比如明清时代比较熟知的侍郎、郎中、员外郎等。汉朝的郎，在制度上接近于战国时代的门客或养士（钱穆言）。汉朝选拔官员，依靠荫任和赀选。有三个途径可以成为郎官，一是年俸二千石的大官（京里的副部级，地方上郡守以上的官员，均属二千石官），做满三年，可以保举一人为郎；二是家庭资产满

五百万的,可保举一人为郎;三是有特殊技能的,可以特别荐举为郎。通过这样的途径,将社会精英网罗起来,为朝廷所用。另据《汉书 · 百官公卿表》:“议郎,秩比六百石,徵贤良方正、敦朴有道之士任之,掌顾问应对。”按这个标准来对照,皋伯通应该是以资产满五百万而获得地方贤良这一身份的,属于新兴贵族。议郎,顾名思义,动动嘴巴的人,代表社会舆情。譬如大名人蔡邕,也曾做过议郎。议郎的收入,也不都是六百石,也有四百石的。可见在汉朝的时候,也有地区差,与今天是一样的。

成书于宋初的《太平寰宇记》(乐史撰)记录了一件与皋伯通有关的事。说是秀州郊外有一座会骸山,为什么会叫这样奇怪的名字呢? “古有金牛钻入此山,皋伯通兄弟凿山取牛。山崩,二人同死此穴中,因曰会骸山”。会骸山又称金牛山。成书于南宋的《海盐澉水志》,称皋伯通兄弟为当地村民。同样成书于南宋的《吴郡志》比较客气,避开了皋伯通,说是“昔有兄弟三人共凿求之,坎崩同死。因以会骸为名”。

秀州即嘉兴,今与苏州分省而治。汉代时,秀州与苏州同属会稽郡。即使到了宋代,苏州、嘉兴同属吴越,或称两越。苏州这一块称浙西,杭州这一块称浙东。

这个传说故事,至少告诉我们两点,其一,皋伯通是嘉兴人氏;其二,皋伯通很逐利,并逐利而死,很有点诅咒他的意思。但皋伯通虽然很有钱,显然不是为富不仁的人。这就要说到梁鸿的故事了。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今属陕西宝鸡)人。父亲梁让,为王莽时代的城门校尉,曾以修远伯的身份出使少昊,就是今天的曲阜一带,去宣扬王莽的德政。不幸,绿林、赤眉军起,梁让枉死在了那里。这时梁鸿尚幼,遭遇这样的乱世,只得草草地葬了父亲,回到京师长

安。做什么呢？先读好书吧。于是上了太学。梁鸿时代的太学规模很大，能容纳一万八百名学生。所以，像梁鸿这样的贫困学生，也能得到上学的机会。

梁鸿虽然少而孤，但他心志很高。常常一个人独起独坐，也不与人合伙吃饭。邻舍的学生先做饭做菜，做好了，招呼梁鸿，快做吧，灶头还是热的呢。梁鸿回答说，我年纪虽小，不愿占别人的便宜。他把灶火灭了，再重新点火。梁鸿“不因人热”的倔脾气，后来大受毛泽东的赞赏。其实，“不因人热”，不依赖他人，是一种非常自信的生活态度。

梁鸿非常珍惜在太学的这几年，他博览群书，又专攻《礼记》、《诗》、《春秋》，他善于融会贯通，掌握其精神要义，而不是一字一句的死读书，于是学问大进。毕业后，暂且在上林苑放牧。有一天，收猪晚了，梁鸿点了火把去寻找，一不小心，掉下的柴火烧着了别人家的猪圈。他打听到这家的主人，愿意用自己的猪来作赔偿。这家主人还是觉得少，梁鸿说，我没有其他的财产，愿意用自己的劳动来补偿。主人答应了。梁鸿非常勤奋，起早摸黑。邻居的耆老们看不过去了，觉得梁鸿不是寻常人物，于是大家都责备这家主人，而称赞梁鸿为长者。主人也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对梁鸿也更加敬重了，并把梁鸿赔偿的猪也退回了，但梁鸿不受，离开了这个地方。起初，梁鸿与京里的萧友很要好，相约不做东汉的官，但萧友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去当了郡吏，梁鸿很痛心，写信去责备了一通，郁郁寡欢地回到老家扶风县。

当地的富豪世家早听说梁鸿的高尚节气，知道他回来了，都想把女儿嫁给他，纷纷前来说媒，梁鸿都拒绝了。同县的孟氏女，长得又肥又丑又黑，力气很大，双手能举起舂米的石臼，但孟女的品行修

养非常好，有的人家就看重这一点，来提亲的，但她都不屑一顾，年已三十，还待字闺中。父母急了，问她想嫁何等样人？谁知孟女的择婿标准还很高，要德才兼备，就像梁伯鸾那样的。父母说，梁伯鸾这么清高，你配得上他吗？梁鸿听说以后，认为这是知音，便聘孟女为妻。待到出嫁，孟女盛装华服，穿戴得非常高贵。一天过去了，梁鸿没有搭理她；两天过去了，梁鸿还是爱理不理；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直至第七天，梁鸿还是不说话。孟女摸不着头脑了，跪在书案前，问道："听说夫子高义，数次回绝了说媒的，我也拒绝了好几个男人了，现在你选择了我，结婚后，却一言不发，能问问我哪里得罪你了吗？"梁鸿说："我要娶的，是穿着寻常，甚至粗陋的女子，可以一起隐居到深山老林里去的那种人。现在你穿得这样讲究，满身绮缟，脸上敷着香粉，岂是我梁鸿所想娶的女人？"孟女说："原来这样啊。这种结婚的行头，我也不喜欢，也不习惯。但因为是新婚时节，所以也将就着穿。早知道你不喜欢，我早就换了。"说罢就进内室更衣。看到孟女将头发挽起，穿着布衣，一副工装打扮，梁鸿非常高兴："这才是我的妻子啊，我今后的生活也有人照顾了。"于是为孟女取名叫孟光，字德曜，希望她的美德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过了一段日子，孟光说："常常听说你想隐居，避开这个是非之地，为什么如今反而默默不作声了呢？想低头自降身价了吗？"于是夫妇俩共入霸陵山中（今西安东北），找到一块清净地方，以耕织为业，闲暇时吟诗作词、读书抚琴，自娱自乐。夫妇俩仰慕前世高士的与世无争、淡泊利禄，为西汉"商山四皓"（即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以来的二十四名高士写了颂语，以此寄托自己的追求。

有一次，他们东出潼关，经黄河古道，到了京师洛阳。看到洛阳

城里宫殿巍峨高耸，气象森严，这样宏伟的建筑，不知耗费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啊。一旦改朝换代，这样奢华的宫殿又要成为另一座未央宫，辽辽的无人问津了。想到这里，忍不住写了一首《五噫歌》：

“陟彼北芒兮，噫。顾瞻帝京兮，噫。宫阙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这首《五噫歌》传到宫里，汉章帝听了很不高兴，下令追查。章帝刘炟是东汉的第三代天子。他的祖父光武帝刘秀为第一代，是个非常有才干的明君。父亲明帝刘庄为第二代。章帝十八岁登基，三十一岁去世，在位十三年。父子两人将东汉治理得很好，史称“明章之治”。梁鸿的这首歌其实真有点反动。起句说，我站在北芒，瞭望你的京城。北芒，即北邙，洛阳北面的山梁，是历代皇帝下葬的地方，向有“生在苏杭，葬在北邙”之说。这不是成心触章帝的霉头吗？所以，汉章帝要追捕反动诗人了。梁鸿只好改姓期运，名燿，字侯光，夫妇俩辗转移居到齐鲁之间。不久，又移居到江南。

梁鸿此行，实是无奈。他的这种心情在《适吴诗》中都写到了。他对入仕做官没有兴趣，要他写为朝廷歌功颂德的诗，他没这闲情雅致。虽然有人在不断的推荐他，但也有人在不断说他的坏话。他觉得他只能到东南地方去了。那里没人认得他，而且那里有他的追求与向往。他写道：“过季札兮延陵，求鲁连兮海隅”。延陵季子是吴王寿梦的第四子，也是寿梦最得意的儿子。寿梦临死的时候，留下遗嘱：“我想把王位传给季札，你们不要忘了我的话。你们兄弟几个一个一个地传，一定要传给季札。”但季札不受，三让王位，是吴国最著名的君子。当梁鸿路径延陵（今常州）时，心中升腾起对先贤的仰慕。他觉得这块地方他值得一来。梁鸿惦记的另一位先贤是鲁连。鲁连战国时齐国人，他光为国君出计谋、出点子，却不肯做

漢高士梁公鴻

矯矯梁公
寄跡皋廡
熱不因人
風高千古

国君的臣子。齐王打算赐予他官职，他便逃到海上。所以，梁鸿说“求鲁连兮海隅”，要瞻拜鲁连，只能跑到海边来了。

梁鸿是季春时节到的苏州，田里的麦子长得好极了，饱含着汁水，不断透出的麦香，恨不得凑上去闻一闻。此刻，梁鸿的心情真不错。他租住在当地望族皋伯通家的一排廊庑小屋里，专门做代客舂米的活。

舂米，就是把稻谷放在石臼里槌打，把稻壳剥离出来。这个活现在当然看不到了，早被轧米机所取代。但苏州人留下一句话，叫“顶着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

每次，梁鸿在外面舂好米回家，孟光为丈夫准备好了饭菜，放在饭案里，举案齐眉，请梁鸿享用。为什么要举案齐眉？其实举过嘴巴就可以了。因为举案的同时，常常要说一些礼仪性的话，说话有口水，所以要过嘴巴。但过了嘴巴还不行，上面有眼睛，要看路，所以还得举过眼睛。这样，举案齐眉，是最恰当、最合理的高度。另外，古人是席地而坐的。但身份高的，腚下会有一方地台，地台上再加一只案桌，而上菜或上茶的妻子或婢女，为了表示谦恭，需要蹲下。这样，高度上下一拉，举案齐眉，孟光举着的这只饭案正好在案桌的位置上，高度正好，有它的合理性。

梁鸿孟光间的这一场景被皋伯通看到了，他十分奇怪。梁鸿，不过一个佣人而已，能使他的妻子这样敬重他，绝非凡人，于是请梁鸿一家搬进自已的家院里，也不用去舂米了，就做皋伯通的门客。

从此，梁鸿有了一个读书著述的好机会，他常常门也不出，史书上说他“闭户吟咏书记”，非常用功，完成了十多篇著作，不料却病了，病得很重。他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对皋伯通交代说，过去延陵季子出使齐国的时候，其长子死了，季子就在当地掩埋了，没有带回

家乡。待我死了,要阻止我的妻子,不要把尸柩运回老家去,劳命伤财,就葬在吴地要离墓旁。吴中士大夫觉得,要离是位壮烈之士,而梁鸿是位清高之君,可以让两人葬在一起。丧事结束,孟光带着儿子便回扶风了。

要离墓在阊门内梵门桥西城下马婆墩,旧有炮座基。清嘉庆年间,在刘家浜十庙前小河旁露出一块石碣,有人剔去上面的藓苔,乃是"梁伯鸾之墓"五个字,笔力古劲挺茂,应为汉隶,但当时没有发现梁鸿和要离的墓。笔者青年时代,居住在梵门桥弄西头这一带,即景德路与刘家浜交界的地方,对面就是十庙前。在连接城墙的地方,附近有一口井,井栏圈之高为苏城第一,称为高井头。边上是第七初级中学,占了很大一块地方。不想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大名人都葬在这里,那时年轻不懂事,错过了。后来在这块地方,也发现了要离的墓碑,此碑后来被晚清大吏端方收藏,端方死后,不知所终。

桃花坞原有梁高士祠,为清道光八年(1828)江苏布政使梁章钜所建。祠后建筑,起名"仰高轩",庭中有山茶一株,尚是清初遗物。梁章钜自认梁鸿为其先祖,故有是举,为之立碑,并辑《梁祠纪略》二卷,请嘉庆七年(1802)同榜进士朱珔作序。朱珔,字玉存,号兰坡,安徽泾县人,官至右春坊右赞善、翰林院侍讲。道光初年,就以母病告归,主讲正谊、紫阳书院,长达二十馀年,被誉为"江左经师之冠"。

皋桥因梁鸿故事而著名起来,成为苏州的一大胜迹。白居易在《忆旧游 · 寄刘苏州》中咏道:"阊门晓严旗鼓出,皋桥夕闹船舫回。"可见是个热闹去处。皮日休曾做过苏州刺史从事,与陆龟蒙交游唱和,并称"皮陆",两人都有皋桥诗。皮诗云:"皋桥依旧绿杨中,闾里犹生隐士风。惟我到来居上馆,不知何道胜梁鸿"。陆诗云:"横绝春流架断虹,凭阑犹想五噫风。今来未必非梁孟,却是无

人继伯通”。连带使皋伯通也名满天下了。

明崇祯十一年(1638),杨廷枢曾倡募重建皋桥。关于杨廷枢，本书另有专章介绍。

章楶

附记：章绰　章综　章綖　蔡京

苏州章家，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北宋苏州有两章，城北一家，城南一家。城北桃花坞章楶，城南沧浪亭章惇。章惇为章楶族弟，官做得比章楶大，为尚书左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这两个头衔中，只要拥有一个，就可以称为宰相了，可见章惇不仅是宰相，而且是权力比较大的宰相。苏州人为了把这两个章家分清，称桃花坞章为“北章”，称沧浪亭章为“南章”，本文只说“北章”。

章楶生于北宋天圣五年（1027），字质夫，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治平二年（1065）进士，也有资料说是治平四年（1067）进士，包括《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等。经查《福建通志・选举志》，可确认他是治平二年彭汝砺榜进士，这样，就可靠了。说起来，章楶也是高官子弟，其祖父章频曾担任侍御史，因为违背了章献皇后旨意，被罢官。章献皇后姓刘名娥，这个小女人不是寻常角色，虽出身贫贱，却成了宋真宗赵恒的皇后。赵恒死后，与儿子宋仁宗垂帘听政。有人怀疑这个儿子并非她亲生，《狸猫换太子》这出戏影射的就是她。

章献皇后极有政治才能，史家将她与汉之吕太后、唐之武则天并称，而且称赞她“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评价相当高。笔者《古新郭史话》（古吴轩出版社 2008 年版）中也写到了她，在她当政时，苏州人、吏部尚书、枢密使、太子少师、晋国公丁谓曾大吃苦头。苏州人对丁谓不大熟悉，但苏州有两条丁家巷，都与丁谓有关。

章楶青年时代没有借到祖父的光，因为祖父已经罢官。更没有借到父亲的光，因为父亲在监狱里，似乎还蒙受冤屈。《宋史·章楶传》说他“应举入京，闻父封对于魏，弃不就试，驰往直其冤”。这段话真是读不懂，“封对于魏”，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查到《姑苏志》，原来是“对狱于魏”。章楶的父亲在地方监狱里接受调查，章楶进京，得知这一消息，考试也不参加了，去为父亲伸冤去了。他父亲是做什么的？《姑苏志》上有“父访，礼宾副使”。这桩冤狱后来肯定平反了，因为章访死后，赠太尉，级别还不低。

《宋史·章楶传》将章楶弃考的这件事写进本传，其实是对章楶的高度肯定和褒奖。弃考本身的意义不大，但能说明章楶是个孝子。在那个时代，孝是极其重要的、无可替代的道德标准。为此，康熙年间编订的《御定孝经衍义》将这章楶的这段故事收了进去。编这部书的也是两位苏州人，一位是叶方霭，昆山人，清初的探花。他著名于史，是因为他是顺治间江南奏销案中的典型案例，所谓“探花不值一文钱”，说的就是他。但康熙帝也没有将他一棍子打死，依然起用他为召试博学宏词的阅卷官，能坐在这个位子上，说明叶方霭学问很大，叶氏最终官至刑部尚书。另一名是韩菼，陆墓人，康熙十二年（1673）状元，也是大学问家。他十分贪酒，最终也死在酒上。

但苏州章家毕竟是有点底气的，他终究还是因为叔叔章得象的原因，在中进士前，享受到恩荫，得到了干部子弟的待遇，被授予孟

州司户参军。章得象是何许人也？在宋仁宗时代，做了二十年的翰林，八年宰相。他权力在握时，宗党亲戚，一切抑而不进，办事很公正，是位大智若愚的人物。退休后被封郇国公，卒谥文简。章得象为相，曾重定刻漏水秤，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很大。

但笔者觉得，章楶因干部子弟而直接就任孟州司户参军，似乎不大可能，《宋史》简略得意思走样了。司户参军是分管户籍兼税收的副州长，大了一点。经检索，笔者发现，章楶还担任过大理寺评事，监管华亭盐税，在青浦县青龙江边还有居所，《大清一统志》称其"寓居于此，筑思堂，苏轼为记，子孙遂家焉"。大理寺评事是从八品的官，品级比较低，作为安置性质，正好合适。华亭盐税之后，章楶升任将作监主簿，从七品，掌管国家和皇室工程。章楶自己也很争气，参加礼部会试，得了第一名，破格提拔为陈留知县。此后，做提仓官、提刑官，做转运使，升迁至吏部考功右司员外郎。

元祐二年(1087)，章楶出任庆州知州，从此掀开章楶一生中光辉灿烂的一页。庆州地处西北边境，即今甘肃庆阳地区，是宋朝与西夏隔界而治的军事重镇。西夏地方，原本是党项部落的领地，其领袖拓跋氏，世袭为唐宋的部将。唐朝末年，夏州裨将拓跋思敬帮助唐僖宗征服黄巢，赐姓李，拜夏州节度使。所以，西夏既是唐宋两朝的治外地区，又有臣属关系。宋明道元年(1032)，李元昊即位，党项族开始崛起，宝元元年(1038)正式称帝，国号大夏。辽国承认他的君主地位，而宋国只承认他是国主。历史学家为叙述方便准确，称其为西夏。西夏骤然强盛，宋朝的西北边境不安宁了，当时范仲淹、韩琦到陕西主持兵事，军事上占不到什么便宜，终究还是以和议了事。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绮、绢、茶，共计二十五万五千两，以金钱换和平。所谓"岁赐"，仅仅是大宋朝廷的说法，死要面子，骗骗皇

帝、骗骗老百姓的。在西夏的文书里,却被认为是宋朝对西夏的“献金”或“贡物”。

西夏从成立之始,就在宋、辽之间玩三国外交游戏,时而和辽抗宋,时而和宋抗辽。在对宋关系上,不是进攻,就是进贡。翻手为云,复手为雨。

元祐元年(1086),神宗去世,哲宗赵煦即位,西夏使节来开封祝贺,提出将安疆(今甘肃庆阳)、米脂(今陕西米脂)、浮屠(今陕西绥德)、葭芦(今陕西佳县)四个寨子归还西夏的请求;元祐二年(1087)春正月,宋朝册封李乾顺为西夏国主。同年三月,经廷臣权衡利弊,宋朝采取息事宁人的决策,决定将安疆、米脂、浮屠、葭芦四个寨子发还西夏。

元祐三年(1088)三月,西夏得寸进尺,进攻德靖寨,被张诚击败。四月,西夏又进攻塞门寨,守将朱赟、郝普等战死。

元祐四年(1089)六月,西夏人又来进贡。宋枢密院告知西夏方面,兰州和寨门两处地方绝不会赐给西夏,请西夏不必再请求了。

元祐五年(1090)八月底,西夏以大军十五万进犯麟州及神木等寨,宋将不敢与战。为什么呢?这时,宋朝的河东路经略安抚使押运着赠送给西夏的大批礼物正浩浩荡荡而来,其中包括给西夏国主的生日礼物以及中冬时服、岁赐银绢,车队已到延安府,面临边境线上大批蕃汉居民被杀,房屋被烧,牲口被掠,不知所措。在此之前的六月份,西夏人还进犯质姑堡、胜如堡,也是不了了之。

西夏重臣梁乙逋(一作梁叶普,西夏梁太后的哥),把宋朝的宽容视作软弱,得意得很,“当年嵬名家族的人掌权,可有如此战功”?西北边境遭此蹂躏,迫使朝廷重新调整政策。

这时,宋朝在西北边境的三位经略使,鄜延路经略使范纯粹,秦

凤路经略使吕大忠，环庆路经略使章楶都对时局发表了看法。

原先主张对西夏采取宽容政策的鄜延路经略使范纯粹，也坐不住了，他给朝廷的报告说："夏国今年之内，大兵三举，猖狂已甚。"这样下去，"恐非息兵安民之术"。

而秦凤路经略使吕大忠提出，上策守而不战，中策守而或战，下策守而常战，主张固守清野。

环庆路经略使章楶认为，西夏兵举国而来，则坚壁清野，以避开锋芒。待它引退时，诸路出击，分头追讨。章楶提出，西夏无城郭之固，无营卫之兵。西夏军队是军民一体的，战时为兵，散则为民。它聚集的时候，很有战斗力，一旦散还，很难在短时间内聚集起来发挥战斗力。虽然西夏沿边也有守御之人，但每一处都不满百人。因此，他提出"浅攻"之计。这一着，很让西夏人头痛，因为西夏国要调集军队，在军事上作出反应，先要用银牌召集部落首领商议。一旦发生决战，事先更要刺血盟誓。军事机制比较笨重，是西夏的弱点。而"浅攻"有点像游击战，比较灵活。

浅攻的部队，并不需要正规兵，以弓弩手为主，以当地人和蕃人混合搭配，其作战目的是，扰耕，践稼，实施疲劳战术。使近国门三百里之地的西夏人，既不能为生，又不能自存。所得人口、孳畜、钱财，分给出塞作战的将士。我方诸路之师，都可以组织浅攻部队，用轮值的办法，更出迭入，以逸待劳。

章楶说，夏国不仅贪利，而且欺软怕硬。不惩艾他一下，边境不得休息。应该略为占领它的一些土地，就像古代的削地之制，以巩固自己。

章楶反对一味的野战。神宗年代，采用五路大军深入西夏腹地作战，战线很长，特别是补给线，很容易被西夏骑兵切割，使军队瘫

痪而失去战斗力。

章楶也反对一味固守。元祐二年(1087)时,宋朝的十一将兵尽被坚壁在城寨里,西夏兵横行三百里以上,如行无人之境。因此,宋军要守住城寨,不光城寨要坚固;城寨外,要留有具有威慑力的军事力量。这样,西夏军腹背受敌,就不敢全力攻城,城寨反而安全。当然,临机措施,更加重要。自古良将御戎之策,不能按照一个死办法,如果没有一点变通,反而会被对方识破而失败。

元祐七年(1092)三月,西夏军队在韦州集结了三万馀兵,准备进攻章楶经略的环庆府。事先,章楶早就安排了间谍,获知了准确的军事情报,得知夏军分了很多个营寨,每寨只有八百人,营寨之间又相距二三十里。于是派遣环庆路第七将折可适统兵八千九百馀人,向韦州急击。折可适,这个名字很怪。他是府谷县党项族人,曾参加攻打方腊,捕捉宋江,是宋朝的一员悍将。折家也因为折可适的勋劳,成为陕西榆林地方的强宗豪族,势力很大。却说折可适一昼夜奔袭西夏监军司所,西夏军毫无防备,仓皇而退,扔下大量牲畜、器物。宋军轻松截获西夏的马牛羊骆驼等凡二千一百三十馀口。折可适撤回时,西夏军在后面尾随跟踪,于是,折可适又选择险要之处设下埋伏,西夏军中伏大败,死伤无数。

同年六月,宋军在熙河路修筑定远城,西夏集结了数万兵马准备袭击,章楶又派折可适带六千兵潜入,将正在集结的夏军一举击溃。再次显示了"浅攻"的功效。

西夏屡败于章楶,恼羞成怒,决定向环庆路实施反击。元祐七年(1092)十月,西夏梁太后亲领十万大军向环庆路而来。为了迷惑章楶,西夏军先佯攻泾原路,突然折向环庆路,此时环庆路只有蕃汉军五万人,除了老弱病残、出差以及布置在州县、城寨、镇堡参加

防守外，能够出战的将士仅有二万六千人，兵势单弱，正面对抗十分不利。不过章楶作战，遵循知己知彼的原则，他早就有内线谍报，把西夏军的意图摸得一清二楚。他命令折可适领所部八千多人由间道出发，作为影子部队，隐匿起来。命令庆州总管李浩领一万八千人出庆州，向环州进发，三天之内，走了一百七十五里路，部队虽然相当疲劳。章楶命令李浩，张大声势，派轻骑兵骚扰西夏军，但是"贼进一舍，我退一舍"，正面不得接仗，使西夏军以为宋军胆怯，而忽视了折可适的迂回部队。果然西夏军中计，虽然一路杀到环州，但没有实质性的收获，而辎重部队却被折可适的宋军所袭击。西夏军最怕腹背受敌，只得撤回。这时章楶早就在西夏军必定经过的水源里下毒。西夏人攻城不克，又喝了有毒的水，死的死，病的病。特别是牲口，一旦中毒，暴噪不已，跌入山崖的，狂奔而毙的，不知凡几。而折可适按照原先的布置，在西夏军归途上一个叫洪德寨的地方作了埋伏，西夏大军途径洪德寨时，折可适放过前军，待到西夏梁太后的旗帜出现时，才一声令下，宋军蜂拥而出，西夏军猝不及防，人畜踩踏，死伤无数。但西夏人行军打仗，有个习惯，入境则精锐在前，出境则精锐殿后。此时，西夏军最精锐的铁鹞子军作为后军，率先展开反攻，把宋军逼入城内。折可适用神臂弓、虎蹲炮轮番攻击，并用铁蒺藜阻挡骑兵，重创西夏军。之后宋军再次发动突击，西夏军大败。连梁太后也差点无法逃脱，只得将仪仗等物丢弃了，狼狈逃走。这一战役，斩首千馀级，获牛马、骆驼、盔仗以万计。

战后，朝廷觉得章楶此举属于违背朝旨，什么是朝旨？宋哲宗曾对环州之战专门下达诏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七十八记道："诏令章楶丁宁城寨专作守计，但能坚守无虞，即为有功。密诫诸将凡事慎重，勿与贼锋迎斗。"章楶只要守住城寨，即为有功，凡

事要考虑慎重，不与西夏交战。诏书中的“丁宁”，现代汉语作叮咛，既是叮嘱，又是告诫。

哲宗下令不战，章楶战了，虽获小胜，是国家之福？还是国家之祸？言官指责章楶“轻易邀战，侥幸一胜，必有覆军亡将之虞。上则损国威灵，下则公违节制”。这篇长达一千三百多字的长文收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但说这话的官僚是谁？却没有注明。史家觉得是李清臣，此公在哲宗朝，独专中书，是个渴望权力又大权独揽的人物。李清臣是韩琦的女婿，他做官的技巧是，你看不出他有什么私心，很公正。另外，他很节俭，做了大官依然节俭。这是他的长处。

文章指责章楶还有两项过错。一是上报的数字不对，章楶上报斩首千馀级，获牛马、骆驼、盔仗以万计，而朝廷认为只有四百馀级，牛马、骆驼千计，有冒功之嫌。二是没有捕捉好战机、没有重创来敌，使西夏全军而归。

章楶于是“升官”了，元祐八年(1093)，他被提拔为户部侍郎，知同州。宋朝有个规矩，凡在地方任职的官员，都是中央派来的，所以地方官常常有中央的官衔，章楶虽然挂了户部侍郎的名头，其实不需要到户部上班。他的实职是同州的知州。同州在陕西关中东部，今名大荔县，从地图上看，在潼关偏北，稍稍往西，就是山西、河南境地了。可见，朝廷将章楶边缘化了，将他剔除在边境事务外。章楶当了同州知州后，还当过应天知府，广州知府。宋朝的应天，并不是今天的南京，而是河南商丘。后平调为江淮转运使，那是管财政钱粮的。

章楶一走，边境却不安宁了。每每西夏军进犯，守将们恪守“清野坚壁”政策，坚守不出。西夏军也很狡猾，常常声东而击西，又虚虚实实，使宋军不得不处处为备，不敢出战，眼睁睁地看着西夏骑兵

四散掳掠，即便有战兵在外，也无法阻挡西夏军的横冲直撞，边民损失巨大。即使边民躲进城寨，也没有地方安顿，人畜昼夜暴露，不是冻死，就是饿死。

绍圣四年(1097)，哲宗再度起用章楶知渭州，为泾原路经略使，诏令章楶斟酌敌情兵力，究竟如何举动可以保证全胜？具状以闻，打个报告上来。章楶的再度起用，背后有两个因素。一是章楶的族弟章惇出任宰相。二是哲宗在章惇的劝说下，决心对西夏实行强硬措施。

北宋时的渭州，即今甘肃平凉，以及周边的泾原、华亭、崇信这一地区。渭州的知名度不高，但一说《鲁提辖怒打镇关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故事就是发生在渭州。渭州东与庆州相邻，西与六盘山相接，是为北宋西北边境前沿，这个地区古称陇东，王安石为相时，曾来视察过，留下《陇东西二首》，有"添却征人无限泪，怪来呜咽已千秋"诸句。在西北边境征戍，十分艰苦。章楶在渭州为官，又何尚不是，需要一点奉献精神。

章楶报告说，他担任陕西转运使时，曾巡历泾原、环庆，才知道有葫芦河川，原野广阔。他提出，在这种地方，应有"进筑之策"，因为葫芦河川的对面，是西夏的没烟峡，是西夏入侵的主要通道，应该在这个通道上修筑一道城寨，以遏制西夏军的进退。章楶的建议得到朝廷批准，诏令熙河、秦凤、环庆三路兵马，加上章楶的泾原路，共三十万人马，全部由章楶节制。当年的三月二十三日，章楶调集八万馀人，修筑平夏城、灵平寨。为了迷惑西夏，章楶故意放出不敢与西夏对抗的烟幕，而指令两侧的秦凤路、环庆路主动骚扰西夏，以保护筑城。西夏军也前来攻击过，但都被宋军击退。章楶全力以赴，仅花了二十二天，就大功告成。继而宋朝倾其所有，在宋夏边境线，

连筑五十馀城，西夏人惊愕得不知所以，哀叹道："好田地都被汉家占，夺了我饭碗。"哲宗很高兴，对群臣说，章楶到渭州，尚不满一旬，就有这样好的策划，不满八旬而一举成功，其他诸路经略使，都可以照此办理。

元符元年(1098)，西夏动员了三十万大军强攻平夏城，出发的时候，每个士兵都带了一捆干草，企图将城濠填满；每人带了一把铁锹，准备将平夏城耙平。还运来了高车，可以攀上城墙作战。这种高车，形制已经失传，据说可以装载数百人，可能有点夸张，但至少是攻城的利器。西夏军攻势很猛，飞石激火，矢石如雨，昼夜不息，还企图在城墙上凿开洞坑，但都被宋军粉碎。西夏军连战十多天，筋疲力尽，粮食吃光，死伤无数，一无进展。由于遭遇大风，高车派不上用场，甚至被风摧毁。西夏梁太后遭此厄运，痛哭失声，披发掩面，无奈退军。这时又下起大雪，人马冻死无数，损失惨重。

西夏统帅嵬名阿埋、监军妹勒都逋不甘心失败，装扮成放牧人，进入天都山，意在偷窥大宋的边境防务。章楶的谍报系统获悉后，迅速将这一情报送达章楶，章楶决定赌一把，派手下最得力的两员悍将折可适和郭成，分两路衔枚以进，轻骑夜袭。夜半时分，直入其帐，居然将嵬名阿埋和妹勒都逋抓获，俘获其家属族部三千馀人，牲口十万计。此仗属于轻取，斩获不多，仅"虏馘三十馀"，馘，就是将俘虏的左耳割取下来，代表首级。

宋军抓走了嵬名阿埋和妹勒都逋，令西夏人痛不欲生，连天都山也放弃了。天都山是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举行大婚的地方，在西夏国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天都山的放弃，表示西夏再也无心西进，西夏崇宗李乾顺上表归顺宋朝。宋军在天都山驻军，重建西安州，即今天的海原县。这样，宋朝的西北边境线推进到银川、西安州、兰

州一线。边境线外，与西夏以沙漠相隔，这对宋朝的防守十分有利。消息传到开封，朝廷十分振奋，称赞“此为非常不世之功也”（曾布言）。哲宗亲临紫宸殿受贺，擢章楶枢密院直学士，龙图阁端明殿学士，进阶大中大夫。嵬名阿埋和妹勒都逋被解到开封，于宣德门举行献俘大礼。哲宗赶到裕陵，向老爸神宗祭告，真是涕泗横流，想当年仁宗搞不过李元昊，英宗搞不过李元昊的儿子李谅祚，神宗搞不过李元昊的孙子李秉常，大宋被迫向西夏岁赐、割地，西夏对大宋不称臣，奇耻大辱啊，现在，大宋朝扬眉吐气了，被西夏强占的数千里地，如今又要回来了。原先，宋朝每年向西夏赐款。现在，西夏向宋朝请罪纳款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章楶完成的。

章楶对宋夏边境事务提出的“浅攻之计”和“进筑之策”，非常奏效，以战争手段换取了和平。因此，有宋一代，都称赞章楶所立边功“为西方最”。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确，章楶之功，不光与他同时代的其他经略使，诸如范纯粹、吕大忠无法相提并论，就是大宋一代名臣韩琦、范仲淹也无法比拟。

这场战争不仅将西夏经济拖垮，也将大宋经济拖得非常疲惫，耗费的资金和粮食不可胜计。元符二年(1099)，经略使章楶就向朝廷报告，陕西府库仓廪储蓄内外一空，前后资贷和原有资金不知花了几千万数，至今粮草尽乏，主管财赋、负责军粮的漕司(即转运使)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即使是下文征收，也是一纸空文。现在地方上最想做的，乃是休兵息民。

哲宗重新起用章楶，将他派遣到渭州时，已是七十一岁的老人了。他不图享受，不畏艰苦，真是极不容易的。他在渭州先后四年，

他创立的平夏城及九个卫星城寨，为保障大宋的边境安宁做出了杰出贡献，也为西夏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至元符二年与西夏的战事结束，宋夏通好，边境无事了，他也已七十四岁，于是请求退休。哲宗说，明年再说。但明年哲宗自己去世了。徽宗继位，徽宗对章楶的功劳是认可的，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拜章楶为同知枢密院事。宋代官制，"知枢密院事"为国防部正职，同知，就是副职。第二年，章楶就去世了，享年七十六岁。对他的去世，徽宗极为动容，发布诏书，称赞他"直亮而刚明，忠勤而庄毅。能守正而不膠于变，善书策而不诡于经。顷者，节制一方，威名万里，生擒劲敌，坐解重围"。并亲自祭吊，给予特别丰厚的抚恤金，赠右银青光禄大夫、太师秦国公，谥庄简，改谥庄敏，并赐庙怀德军，曰忠烈庙。据《姑苏志》记载，苏州报恩寺东有章庄敏公祠，即章太师庙。其地有桥，叫章家桥，河称章家河，巷称章家桥巷，大概就是现在的装驾桥巷。

章楶虽然戎马一生，但终究是进士出身，写得一手好词，有《水龙吟》留世，词曰："燕忙莺懒芳残，正堤上杨花飘坠。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绣床旋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

苏轼与章楶相交极深，时常往来唱和。上文说到，章楶有筑思堂，苏轼为记。章楶这首《水龙吟》，苏轼收到后，称赞说："柳花词，绝妙。"在回复的短柬中，苏轼还写了这么几句话："窃闻公会用香药，皆珍异之物，极为蕃商之苦。公若奏罢之，阴德非小补也。"这句话译成现代汉语，意思就是，听说公家会晤常用香药，这些都是珍异之物，是番商历尽辛苦搞来的。你如果能上奏朝廷，今后不要再

进口这类物事,其阴德不是一点点啊。从语气上看,这种香药就是从章粢的渠道进口的,否则与章粢何干,要章粢上奏?苏轼自己不好说吗?另外,章粢长年在边境做事,也许与番商们很熟。而西夏,正是丝绸之路所必经的处所。

苏轼另有《水龙吟 · 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回复,词云:"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街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章粢词写的是杨花,却又写得十分香艳。词人肚子里究竟想的什么,只有词人自己知道。而读词的人也完全可以自己去理解,这才是词的魅力所在。章粢和苏轼的这两首《水龙吟》被王国维收在《人间词话》中,他说:"东坡杨花词,和韵而似元唱;章质夫词,元唱而似和韵。"后世论者因此认为,王国维看似什么也没说,但隐晦地说出了,苏轼写得比章粢高明,因为和韵比元唱难写。但这种评论又似乎与没说一样,谁不知苏轼是大词家,而章粢是一员良将,两人一生操持的家伙不一样,没法比啊。

笔者觉得王国维这两句话,不是这意思。我的理解是,章粢明写杨花,暗写的却是个人的志向,否则,"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便无处落脚,关键是要校正对"章台"两字的理解。章台,大家熟知的,长安城有章台街,是歌妓聚居之处,是汉代的红灯区。张敞每天下朝,要经过章台街,为了不让人看见,他关照驾驶员快点赶马,自己用扇子挡住脸。因为章台走马,容易被人误解为冶游。章粢还故意用了"燕忙莺懒"、"玉人"、"春衣"、"绣床"等词,就是引导读者往香艳的方向想。但章台的本意却是政治的,因秦代章

台而得名。在“完璧归赵”的故事中,“秦王坐章台见相如”,就是这个地方。因此,章台还可以引申为秦国政府,“则诸侯莫不西面而朝于章台之下矣”(《史记 · 苏秦列传》)。从汉朝开始,政治和色情纠结在一起了,有官员的地方,色情业常常很发达,章台街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张敞以扇遮脸,表现很特别,所以被写在传里,而大多数,恐怕就到“天上人间”快活去了。章楶的“望章台路杳”的章台,是政治的,而并非是欢场。章楶是多么希望哲宗能像秦王一样,在章台召见他,希望他的才能和志向能被君王所赏识。但是章台路遥,找不到方向,恨不得大哭一场。他的心情正像是随风飘荡的杨花一样啊。

章楶这首词的创作年代,应该是在元祐八年(1093)至绍圣四年(1097)之间,章楶平定西夏的志向,刚刚实现了一点点,就因为与朝廷的意见相左而被调离,只有在这一的情况下,章楶才会发出“章台路杳”的感慨来。

而苏轼的和韵,故意避开章楶的伤心处,只浅浅地说了句“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意思是读懂了,但不顺着这个话题走。只写杨花,只说杨花,“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表达了他的理解。所以,王国维说,苏轼的词应为元唱,而章楶的词应为和韵。因为章楶的词主题升华了。“章台路杳”,就是全词主题。

章楶定居苏州后,在阊门城北,买田置屋,“广辟池沼,旁植桃李,曲折凡十馀里,仍桃坞旧名”,称为桃花坞别墅,人称“章园”。章园很大,“广七百亩”,阡陌交通,溪流萦带,暮春三月,菜花油油,黄金布地,一望无限,一直连到章庄敏公祠。按今天的地理概念,已过人民路,到装驾桥巷了。可以说,整个桃花坞,都是章氏的了。章

楶的这座庄园式别墅，大概是开放式的，或者有一部分是开放式的，没有围墙，以桥相连。《烬馀录》说："楶，字质夫，家城北，买田五百亩，任人种植。惟阡陌间，随流屈曲，遍栽桃柳。当春花发，徒步自娱，世称北园。"

为了纪念平定西夏的渭州之捷，章楶将桃花坞别墅的西轩名为"清夏"。夏雨过后，暑气一清，双池荷花，香风习习，章家子弟都喜欢到清夏轩乘凉。章园的主景为旷观台，地铺五色石，主楼为五马楼，俯瞰园景，历历在目。五马楼上的一副楹联以翡翠琢成，联云："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每字的花费都在千金以上。靖康国难后，章楶的桃花坞别墅成为金兀术南下的主帅营盘。金军北撤时，放了一把火，将五马楼烧了，章家子孙仅在瓦砾中捡得一"云"字，尚完好无恙，其馀不知所终。此为后话。

章楶有七个儿子：章綡、章综、章縡、章绾、章綖、章缜、章缜。

长子章綡，字伯成，熙宁九年（1076）进士。元祐三年（1088）出任三泉县知县，因为父亲章楶在陕西转运使任上，故避嫌改知越州萧山，迁宗正寺丞。徽宗即位，提举江南东路常平，其职能是管理常平仓，平抑市场，主要是粮食。章綡进京述职，奏对称旨，留在开封府担任推官，是为首都地方法院院长。因为徽宗考虑到章楶在京担任同知枢密院事，年事已高，需要章綡在身边，好有个照顾。章楶去世，章綡丁忧而去位。后迁户部郎中，不想却生出一番事来。

却说章綡在户部做官，二弟章综和三弟章縡正好因事到京。蔡京知道了，特地请三兄弟到宰相府，一番交谈，却谈出了不愉快。蔡京说，你们的父亲秦国公，作为封疆大吏，威名震西州，很威严啊。今皇上正在物色将帅，要派遣到灵武（今银川）去。传承父亲的事业，

都在你们几位身上。章绰听了，并不乐意，笑笑回答说，越人善于游泳，其子方周岁，他的母亲却在教他游水，没有不淹死的。打仗，是件很危险的事。当派能干的臣子去，这不是我们兄弟几个所敢做的。蔡京听了，大不高兴。

这桩事，蔡京无错，他只是转达了徽宗的意思。章粢去世后，徽宗召见章综，听说章综曾在西夏边境镇戎军（军级建制的地方政府）任通判，章粢帅府的文书、档案、檄书、请奏，都是章综做的，非常高兴，对他说，名臣之子啊，曾经佐理过父亲的，以后物色能担当大帅的人，也不用找了，就是你啊。

此后，章绰被调出开封，出任淮南东路提点刑狱、权知扬州兼提举香盐事。扬州是江南重镇，无论从这个职位、职务上看，都比户部郎中崇高。所以，蔡京并没有使小心眼，对章家还是蛮好的。

当时，徽宗刚登基，朝廷改铸大钱，史称“崇宁更钱法”。起先说是一枚大钱当十，后来又说当五，再后来又说当三，弄得人心惶惶。大钱正式使用时，核定以一当十。老百姓不接受，商店大白天都关门，不敢交易。有人拿着大钱想买一束柴火、一斗米，到了晚上也没人卖给他。为了安定人心，章绰吩咐官仓粜米，而收进大钱。连续粜了十天，市面渐渐地安定了。

写到这里，我真为《大清一统志》卷六十七的记载汗颜。它居然把章绰的“粜米”，错写成“籴米”。这两个字，字形上很清楚，一为卖出、一为买进。作者在农村呆过，很明白这两字的意思。《大清一统志》怎么就糊涂了呢。章绰之所以粜米，收进大钱，是为了表示新货币的信用，而糴米，恰恰是放出大钱。谁要大钱呢。

但大钱的发行依然出了问题。因为新钞出而旧钞不用，徽宗和蔡京怎么会制定这样的货币政策呢？真是令人想不通，这不是抢钱

吗？豪商大贾一夜之间成为穷光蛋，有因此而赴水死、上吊死的。章縡兼管盐务，在仪真有四十多人拦住章縡的轿子哭诉，他们手持的三十万缗大宋钱钞，说作废就作废了。章縡于是上书，痛陈新钞法剥民之利，建议政府要取大信于民。疏上，徽宗不听，将章縡降两级调用。

但笔者相信徽宗和蔡京绝不是脑残，崇宁更钱法的核心是解决财政困难。宋初，吏禄兵廪的费用，全年不过一百五十万缗。神宗元丰年间，月支三十六万，已经在叫不够花了，以致王安石变法，变来变去，无非是盘算着增加收入，减少支出。神宗以后，哲宗在位十五年，有一半时间花在与西夏打仗上，军费开支更是浩大。徽宗即位，手上更是穷，能有什么钱呢。而且宋代的租额，已经七倍于唐，农民身上已榨不出什么油水了，只能动富人的脑筋了。当十大钱的推行，与穷人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只是苦了富人。而徽宗是个会花钱的主，后来他有钱了，曾月支一百二十万，堆艮山，搞花石纲，终于把北宋的家底搞空。

客观地说，徽宗的大钱，做得相当漂亮，“崇宁通宝”四个字，由他亲笔书写，瘦金体，仙风道骨，舒展飘逸，在古代钱币中，无出其右，堪称神品。关于“崇宁通宝”，宋朝的伶人已在表演中调侃了，一人取当十大钱买汤，卖者无零钱可找，只得劝他多喝几碗，结果喝得肚膨气胀，连声叹息说：“幸亏相公铸的是当十钱，要是当百钱可害死人了。”

由国家发行当十大钱，这个念头王安石也动过，只是没做成。蔡京与王安石在思想路线上是一致的。说实在的，就宋朝货币本身而言，改革是必然的。因为宋朝的铜钱太重了，每一千文重五斤，约三千二百克。陕西那地方用铁钱，更重，每一千文六斤半，合

四千一百六十克。换成蔡京的当十钱,同样的币值,重量减为十分之一,当然是好事。仁宗的时候,沿边告急,朝廷下拨了二十万贯以辅军用,结果,这笔钱运了五个月,才运了十一万贯,就是因为钱实在是太重。所以,从货制改革的角度看,蔡京的做法是对的。

这时,章綷的五弟章綖出事了,被人告发私铸钱,逮系诏狱。章家是大宋朝的功臣,受皇帝宠爱。老章楶去世时,徽宗亲自吊唁。怎样才能不动声色,又让徽宗知道章家有人铸私钱?这件事只能让伶人来做。

先把背景交代一下。崇宁更钱法实施后,为徽宗积累了大量财富。钱多了,怎么办?铸鼎。崇宁四年(1105),九鼎告成。在开封中太一宫之南专门建殿,安放这九只鼎,名曰九成宫。中央一只叫帝鼐,北方曰宝鼎,东北曰牡鼎,东方曰苍鼎,东南曰风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九成宫的规制不是一般的宫观道寺可比。《宋史 · 蔡京传》记道:"京每为帝言,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制定命宝。任孟昌龄为都水使者,凿大伾三山,创天成、圣功二桥,大兴工役,无虑四十万。两河之民,愁困不聊生。"九成宫是徽宗时代的标志性工程。

伶人借鼎说事,乘徽宗看戏的机会编了这么两句台词。

甲:"今岁东南大水,请派彤鼎前往苏州镇压水魔。"

乙(扮作鼎神):"不愿不愿。去了怕要被章家铸作当十钱了。"

朝廷因治章綖之罪。

据《资治通鉴后编》记载,崇宁更钱法出笼时,民间私自铸钱的,不是一家两家,而是犯法者纷纷。为什么?因为在宋代,铜依然是贵金属。每一枚铜钱的货币价值与它的金属价值大致是等同的。

现在一枚铜钱以一当十,骤增十倍之利,铤而走险、追逐利润的,自然大有人在,这是一。其二,旧钱废止不用,正好改铸新钱。当然,私铸钱币得承担很高的政治风险。

对章綖的指控,案情大致是这样的。

章綖公然聚工铸钱,一说数万,一说千万,用枢密院、中书侍郎刘逵的官船偷偷地载运到开封。当章綖的船只刚刚抵达开封水门,被查获数大缶私钱,连同与刘逵的往来尺牍,俱交平江府审讯。章綖此时的身份是西安州的签判,相当于办公室主任,掌管文案,案发时闲居在苏州。章綖为什么敢于冒法?因为朝中有刘逵这个靠山。刘逵是章粢的女婿,也是章綖的姐夫。中书侍郎不是小官,视同副宰相。而且同案犯也抓到了,也是苏州人,名叫郁宝。

这一切都是蔡京一党编造出来的吗?而历史记载对这一话题,非常一致,是蔡京陷害。

"綖,刘逵之妇兄也。蔡京怨逵,因而兴狱"(《资治通鉴后编》)。

"綖,为时相诬以盗铸"(《吴郡志》)。

"蔡京又诬其弟章綖私铸钱"(《宋故左朝奉大夫提点杭州洞霄宫章公墓志铭》)。

"蔡京兴苏州钱狱,欲陷章綖兄弟"(《宋史·沈畸传》)。

蔡京为什么怨恨刘逵?以致要陷害章綖以达到打击刘逵?

在政治上,刘逵绝不是蔡京的对手。早先,刘逵还是蔡京的政治盟友。《宋史·刘逵传》记道:"逵无他才能,初以附蔡京,故躐进。""躐进"这个词,用得很有意思,即跳跃式的升迁。崇宁元年(1102),蔡京当了宰相。靠着蔡京的势力,刘逵从政治圈边缘的国子监司业骤然进入中央机关,从一名秘书少监升任太常少卿、中书舍人、给事中,以户部侍郎的身份出使高丽,回国后,迁尚书。由兵部同知枢密院,成

为军界的二把手。再拜中书侍郎,是为蔡京的副手。

蔡京后来因为星象示警,被罢官。刘逵以副代正,成为代理宰相,他做了一件事,使蔡京恨之入骨。原来他乘蔡京下台的机会,劝说徽宗毁了元祐党人碑。元祐党人碑是蔡京花了大力气,以徽宗的名义,树立在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名单上有包括司马光等三百零九人,虽然大多数人已经去世,但处罚依然是极严厉的,其子孙不准在京城为官。此碑由蔡京书写,他是北宋最著名的书法家。应该说,蔡京的政治胆量还是令人敬佩的。他敢直面与这三百零九人叫板,包括他们的亲属、子孙、门生,不容易。

刘逵本想投机一把的,蔡京被罢,他失去了靠山,想拍拍元祐党人的马屁,不想元祐党人傲得很,不以蔡京立了党人碑为耻,反以为荣。刘逵马屁拍到马脚上。反而被元祐党人以"庇其妇兄章綖,使之盗铸"的罪名,一脚踢出京城,贬到亳州。更让刘逵没想到的是,蔡京居然又回来了,依然做他的宰相。这下,刘逵连亳州知州也做不成了,调到镇江,做节度副使。要等到蔡京再次下野,刘逵又得到知杭州的好差使,但这时,他的寿到了,才活了五十岁,算是中寿。

蔡京怨恨刘逵,为什么要将章家牵进来?问题出在章综身上。章综,章楶第三子,从小受到章楶极为严格的教育,与其兄章縡常常被关闭在书房苦读,所以,章家兄弟七人,章縡、章综文名最好。章综年轻的时候,就受到诸多著名人士的推崇,如范仲淹的长子范纯祐,前右相韩玉汝,中书侍郎李邦直、范子功等,他们都向朝廷推荐其文行。元祐二年(1087)的国子监考试,章综第一。《姑苏志》把这个第一,误为进士第一,显然是错了。

刘逵的元祐党人倾向,得到章综的赞同,恰恰引发了蔡京的仇恨。诏开封府尹李孝寿来处理此案。李孝寿此人,以严厉著称,京

中称他李阎罗。李阎罗到苏州后,动用武装甲士,包围了桃花坞章家,钲鼓之声,昼夜不绝。为什么有如此声响?因为搜索犯人,收集证据,形同抄家。苏州人历来胆小,听到这样的动静,人人震骇。李阎罗连逮千馀人。李阎罗用刑,喜欢用夹棍,当时正是冬天,将手指、足指夹脱落的,不可胜计。死了则投到墙外。还误抓了不少姓名相同和面貌相似的人,一旦进来,决无生理。折腾了几个月,瘐死了数百人,一无所得。蔡京很生气,将李孝寿召回,另遣御史沈畸重新申理。沈畸受命,不五天,升任左正言。未满十天,再次升任殿中侍御史。沈畸请求坐船去苏州,蔡京通知所有堰闸夜间放行,并差监察御史萧服陪同前往。在京里,沈畸对盗铸问题很关注,蔡京很希望沈畸实施"盗铸者必众,将威以刑"的强硬措施,将章家一网打尽。沈畸疾驰奔苏州,下车伊始,正值春瘟,沈畸先命打扫监狱,然后释放了没有证据的犯人七百多人。他对属僚说,御史为天子耳目,岂可附会权要,以杀人来换取富贵?蔡京闻讯大怒,将两名御史分别削籍羁管。沈畸连降三级,被贬为信州酒税,未几,沈畸怨恨而死。沈畸是湖州德清人。历史上,苏州人与湖州沈氏一直很好,这恐怕是一个原因,苏州人欠沈家的情。另一名御史萧服,记载是被贬到处州管制,后经萧服的玄孙萧祺提供大观四年(1110)的印鉴,才明白萧服其实是贬到虔州,因为繁体"處"字与"虔"字十分近似,所以写错。虔州即今江西赣州。

沈畸、萧服没有完成的任务,蔡京另派陕西转运副使孙杰来申理此事。孙杰曾任给事中和淮南两浙察访使,是刑审侦破方面的专家,又是个强硬派,他认为处理盗铸,要采用淮东重法,按强盗律处置,家财充公,作为举报人的奖金。孙杰到苏州后,将案件强行了结。章綖刺面,发配沙门岛。孙杰凭此案的运作,擢龙图阁直学士,并留

在苏州继任知府。对章家弟兄几个,孙杰没有手软,除了章缜早亡外,章綡放逐台州,章综放逐秀州,章综放逐温州,章绾放逐睦州,章缜放逐永州。孙儿辈,章芨放逐处州,章荩放逐均州。此案连坐的十馀人,都是苏州的名门大户,士大夫阶级,均发配海岛,时论冤之。所谓的章綖盗铸案,在大观元年(1107)九月结案,苏州为此冤案死了数百人。全国为崇宁更钱法,死了十多万人。

大观元年(1107)十月,苏州发生地震。按当时人的理解,那是天象示警。

大观四年(1110),张商英入相,章綖案得以平反。章綖先是回常州为官,后转内殿崇班。章综平反后也是分管两浙刑狱、越州知府,后以龙图阁直学士退休。章綡于政和元年(1111)复故官,提点成都府路刑狱。但他不想在朝廷混,多次报告请为奉祠官。先是提点江州太平观,秩满后,再提点杭州洞霄宫。此后,他闭户治书,绝口不谈世事。有《周官仪》十六篇,《伯城集》三十卷,可惜都散佚了。章氏一门,大致如此。其他诸子,于史无记。

桃花坞大街东首,有天后宫,原是章楶的专祠,章綡、章综、章综、章绾、章綖、章缜及孙子章芨皆配享。元初,改为漕运万户府署。见《吴门表隐》。

文天祥　张世杰
附记：伯颜　文璧

文天祥在苏州为官的时间不长，仅四十天，但苏州人十分看重他，将他列为五百名贤，列为忠义节气文臣，赞词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岳岳文公，于斯无愧”。这十六字，评价极高，翻阅在祠的五百九十四名名贤的所有赞词，无出其右。但这个赞词的原话却脱胎于文氏绝笔。文氏就义后，人们在他的衣带上发现了一段文字，后世称为《衣带赞》。原文是“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顷被执以来，欲引决而无间，今天与之机谨，南向再拜以死。其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本来是文氏的临终遗言，一旦放在赞词中，角色转换，就显得无与伦比，前无古人了。但这句赞词，用在文天祥身上，十分合身，一点也不过头。

文天祥生于南宋端平三年（1236），吉州庐陵人。吉州这地方，是欧阳修的故乡。他小时候在书院读书，看到书院里供奉着欧阳修、

杨邦乂、胡铨的神位，都谥有一个“忠”字，尊为欧阳文忠公、杨忠襄公、胡忠简公，十分羡慕，说：“今后我死了，如果没有供奉在这里，就不能称为大丈夫。”从小就立下志愿，要做宋朝的忠臣，为国家办事。宝祐四年(1256)，年仅二十岁的文天祥举进士，在集英殿参加殿试，以“法天不息”为主题，万把字的文章，不着草稿，一挥而就。理宗十分高兴，见文天祥长得体貌丰伟，皮肤白净，秀眉而长目，顾盼煜然，一副堂堂男子汉的模样，心中一阵暗喜，将他拔置第一。文天祥得中状元后，时隔四天，父亲去世。

关于这件事，还值得说一说。这一年，文天祥、文璧兄弟两人同时赴京考试，父亲文仪亲自送考至临安，不想在旅店病倒。在这个骨节眼上，文天祥一边向主管进京学子的“期集所”请假，侍候汤药；一边复习迎考。这一科，共取六百零一名进士，文天祥和弟弟文璧同时进士及第，大喜临门，足以告慰老父。五月二十四日发皇榜，文天祥又高中榜首，大魁天下。四天后的五月二十八日，文仪居然病死在临安客栈。进士及第后的热闹和应酬，自然是顾不上了。兄弟俩即日起身，将老父灵柩运回吉州老家，丁父忧，为期三年。

所以，文天祥得中状元后，于跨上政坛的第一步，就走得并不顺利。按南宋的惯例，状元的第一个职务往往是“某某军节度判官”，文天祥得到镇南军节度判官时，已是景定元年(1260)。此后，文天祥一直很寂寞。到真正为国家作出贡献，已是度宗咸淳十年(1274)，文天祥出任江西安抚副使，知赣州。这年文天祥三十八岁，一蹉跎，十八年过去了。这一年，朝廷事多，元朝以丞相伯颜为统帅，发大军二十万征伐南宋。宋度宗赵禥病死，恭帝赵㬎灵前即位，仅四岁小儿，由太后谢道清临朝称诏。

当年年底，鄂州，黄州、蕲州、江州、德安、六安等地在元军铁骑


宋信國公追謚忠烈文公天祥
孔曰成仁
孟曰取義
燕獄文公
於斯無愧

的攻击下，相继失守，京师震动。十一月二十一日，太后谢道清下《哀痛诏》勤王，述说继君年幼，自己年迈，民生疾苦，国家艰危。在此危急之机，希望文经武纬之臣，食君之禄，不避其难。忠肝义胆之士，敌王所忾，以献其功。

勤王就是组织军队。文天祥一介书生，手下无兵、无将、无官、无吏、无钱、无米。但文天祥报国心切，白手起家，成立了勤王军帅司。发动郡中豪杰，江西本省的少数民族以及家乡吉州的农民参军，共聚集了万馀名将士。有人跟他说，你这样做，无异于赶着一群羊，去与老虎搏斗。文天祥说，"国家养育臣子与庶民，已经三百多年了。一旦有急，征天下兵，而没有一人一骑出来，这是我深恶痛绝的。希望天下忠臣义士，闻风而起，则社稷可保全了。"勤王需要军费，他把家财都变卖了，以充足军费。

但文天祥此番行军，并没有得到朝廷的赞许，反而责疑声不断。勤王军四月从吉州开拔，尚未出江西，就有屯驻隆兴府（今武昌）的命令下，朝廷觉得，文天祥的勤王军是乌合之众，农民出征，形同儿戏。说不出口的担心是，江西的夷蛮土著涌到京城，不是朝廷之福。

朝廷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想法，遭到同情文天祥的官员的讽刺。当时有一首打油诗，颇为流传，诗云："出师自古尚张皇，何况长江恣扰攘。闻道义旗离澧口，已驱北骑走池阳。先将十万来迎敌，最好诸军自裹粮。说与无知饶舌者，文魁元不是猖狂。"

文天祥的忠君爱国，在一些人的嘴巴里，怎么就变成猖狂，好出风头呢？但这种责难，也不能完全归罪于贾似道。至少在组织勤王军之前，文天祥并不怎么被人看好。《宋史 · 文天祥传》说："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可见是一个极会享受的人。景定元年（1260），文天祥丁父忧结束，回朝廷报到。朝廷按惯例授予

“签书,镇南军节度判官厅公事”的职务,他请求辞免,而希望得到祠禄之职。祠禄,就是吃闲饭。宋朝皇帝相信道教,于是有管理道教宫观的官员。所谓祠禄,就是这行当,是个借名吃俸禄的散官闲曹。理宗于是另行下旨,将文天祥发回江西,主管建昌军仙都观。这年,文天祥仅二十四岁,还没有在朝廷的浑水里趟过,怎么就想找个清闲差使?做个吃喝玩乐人?

读文氏的《文山集》,文天祥在组织勤王军之前,只能算是一名诗人、文学家,充其量,再加一政论家。他的廷试对策以及给理宗的建议,都非常好。但政论家并不一定是政治家,说与做,毕竟是两回事。他很迷信,喜欢交结相士,如拆字嗅衣相士、闾丘相士、神目相士、镜湖相士、秋月叶相士、曾兰谷相士、月洲相士、刘矮跛相士、梅谷相士、碧眼相士、镜斋徐相士、鉴湖相士、赵神眼、桂岩杨相士,这些人物,都在他的诗文集里露过脸,他也都有诗文相赠。他与道士也很亲近。我们能读到他的《听罗道士琴》、《闻居和云屋道士》、《游集灵观》、《题凝祥观》等诗,看来关系也不一般。有一年,他在病中,还特地借了件道服穿,留下了一首诗,叫《借道冠有赋》,他在诗中表达了一个愿望:“幸有山阴深窖处,他年炼就九还丹。”看来道家的长寿功夫,他是相信的。咸淳二年(1266),他的长子出生,取名道生。咸淳三年(1267),次子出生,取名佛生。文天祥其实有很浓重的出世思想。

写这些,只是想说,文天祥在没有成为令人景仰的英雄前,也是一个凡人。喜欢喝喝老酒,喜欢听听音乐,喜欢住在山里,喜欢下棋。“酒酣剩有诗酬唱,步倦何妨车往回”(《与朱古平饮山中,和萧敬夫韵》),酒多了,可以叫辆车,日子过得很有滋味。咸淳三年(1267)这一年,他有一男二女出生,可见侍候他的,不只是一只肚皮。他有

一妻二妾,生有二男六女。咸淳七年(1271),他在家乡文山起了一处大房子。文山很漂亮,其高处,可极目数百里,俯视万壑,云烟芊绵。文宅在文山之南,地方绝妙,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诚隐者之居也。“后闻江上有变,即罢匠事,惟厅堂仅成。”《宋史》上说,变卖家财,充作军费的,应当包括这处房子。

文天祥说:“我于山水之外,别无嗜好。衣服饮食,只取粗适,不求鲜美。对于财利,随至随散,不令有馀。平生无官府之交,无乡邻之怨。”如果元世祖忽必烈不来,他本是一个清净淡雅之人。

德祐元年(1275),形势变得愈加严峻,元军已经越过长江。南京、镇江、宁国、隆兴、江阴守臣皆弃城而逃。无锡失陷,常州失陷,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投降。潜说友,浙江缙云人。这个人十分龌龊,他原先曾担任临安尹,是首都的一把手,后因事降职为平江知府。南宋当时有一批军费要运到安徽舒城犒军,但路梗不通,只好寄存在平江府。不想潜说友就用这笔金银,带了降表,以全城投降为功,无耻至极。但这时元军主力尚未真正进入,宋军总督张世杰带兵赶到,驱逐了潜说友,平江收复。潜说友后来被元人任命为福州宣慰使,仅一个月,就被手下将领李雄所杀,这是后话。同年八月,朝廷批准文天祥率勤王师进驻临安西湖边。九月,即任命他为浙西江东制置使,兼江西安抚大使,知平江府事。文天祥之与苏州发生关系,就是从那年那月开始的。

十月,文天祥驻军平江时,元兵已沿着长江南岸东下金陵。分兵三路,右军进军独松关,左军由水路进江阴,伯颜自率中军攻打常州。文天祥派麻士龙、尹玉,和淮将张全、曾全分别率军前往增援。曾全首先逃走,张全拥军观望。麻士龙战死虞桥,尹玉与元军战于五牧,前后杀伤数千人。收拾残军,仅得五百人,又和元军相持周旋

一夜，亲手杀死数十人。全军阵亡，无一降者。常州一仗，打得异常激烈，日夜攻战不息。知府姚訔战死，通判陈照巷战而死，刘师勇率八骑突围走平江。常州失守后，元军屠城，全城杀剩三五人。曾全临阵脱逃，被文天祥斩首。

这时，独松关告急。据同治《安吉县志》记载，独松关是南宋建炎年间修建的，为临安北侧的主要屏障，只要守住了独松关，也就挡住了杭州北来的兵患，因此，独松关是古时兵家必争之地。南宋左丞相留梦炎、右丞相陈宜中决定，放弃平江，调文天祥移守临安。应该说，这个决定并无不当。文天祥以吴门空虚为理由，请分兵，一支守平江，一支赴临安。但朝廷不允，命再下。进封文天祥为资政殿学士浙西江东制置安抚大使兼江西安抚大使，守独松关。而将平江府防卫之职交于通判王矩之、都统制王邦杰。文天祥离开平江仅四天，王矩之、王邦杰率众迎降于寒山寺，伯颜领元军进入平江府。

临安的情况也已一败涂地。曾发生朝廷大员数十人一起逃走，甚至恭宗赵㬎宣召慈元殿，文臣只有六人听宣。谢太后下达诏书骂道，我大宋三百多年，对士大夫以礼相待。今日我与嗣君遭难，你们做臣子的，未尝出一言能救国，我有什么对不住你们！今内有百官不辞而走，外有守令委印弃城，监察不仅不能弹劾纠捕，执政不仅不能率领臣工，反而商量着怎么逃走。你等平日里读的都是圣贤之书，我看你们活着怎么对人说？死了有什么面目见先帝？

谢太后觉得绝望，生出投降的念头。挨过了年，就是德祐二年（1276），谢太后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文天祥身上。时元军游骑已出现在临安城外，而张世杰的部队驻扎在六和塔，临安城中还有二十万义士。文天祥觉得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尚可背城一战，以战为守。这个想法，虽然张世杰觉得有点冒险，但谢太后还是决定不妨一试。

正月十九日早上，朝廷授文天祥为枢密使，到中午，就加授右丞相、都督诸路军马，名义上成为南宋朝廷的军事一把手。二十日，文天祥与元军统帅伯颜谈判，不想被伯颜扣留，使谢太后几乎绝望。张世杰请皇帝、太后、皇后三宫入海，然后率军背城一战，被右丞相陈宜中一票否决，谢太后觉得什么都徒劳了，于是派监察御史杨应奎送出传国玉玺，请降。

在历史纪年上，德祐二年（1276），同时又是景炎元年。因为谢太后与宋恭帝于五月投降元朝后，年号取消。但益王赵昰在福州继位，称端宗，年号景炎。所以，这一年，有两个皇帝，有两个年号。

关于南宋的灭亡，《马可波罗游记》第六十五章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

据说，王后曾经听得一位星占学家告诉她的君王说，除了一个有着一百只眼睛的首领外，没有人能够夺取他的江山。此后，这种预言的力量一直在支持着她，虽然城池已经岌岌可危，然后她却自信王城决不至于陷落。因为一个凡人，哪会有一百只眼睛的呢？可是，当她询问了敌方元帅的名字，人们告诉他这个人叫伯颜时，她这才大惊失色。因为她相信，按照星占学家的说法，把她的君王从王位上驱走的，就是这个人了。她摄于大势已去，于是向元军投降称臣。王后被送到忽必烈御前，受到了他的优厚款待，并且拨给她一定的供给和款项，使她得以维持王后的尊严。

在王恽的《玉堂嘉话》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南宋灭亡之前，民间流行着一段歌谣："江南若破，百雁来过。"当时谁都不知道歌谣的意思，一直到伯颜南征，才恍然大悟，原来"百雁"就是伯颜。

元军进入临安前，忽必烈向伯颜发出指令："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不能杀，是吾曹彬也"。曹彬是宋太祖的心腹大将，

史称宋良将第一。他征服南唐金陵时,令诸将不可妄杀一人。元军统帅伯颜也是个人物,用兵极严,元军和平进入临安,“市不易肆”,城市生活得到保护,受到人民的欢迎。伯颜命令将宫廷宝物、图书、档案、仪杖、印章全部封存起来,防止兵士抢掠。至今,宋代的艺术珍品大多完整地保存在故宫博物院,伯颜功不可没。

伯颜对珍奇宝玩,一无所私。一些城市投降后,也有借口请伯颜检查府藏、账册的。伯颜置之一笑,他下令,将士敢抢掠或私自进城者,以军法论罪。由此而元军过境,不致大掠。伯颜的个人作风,起到了战场上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许多城市兵不血刃,纷纷投降。

文天祥被扣的第二天,丞相吴坚、贾馀庆就向伯颜递交了降表。并以吴坚等五人组成祈请使团,向元世祖献土称侄。伯颜强制文天祥一起北行,还解散了文天祥的部队,约有一万多人。天祥闻讯,十分伤心。

二月十八日,文天祥到镇江,居然逃脱,这段经历很有戏剧性。却说文天祥一行过江后,他身边有一名志愿随从叫杜浒的,在镇江用三百两银子买通了一名老校,用一千二百两银子搞到了一艘船。当夜,将紧随文天祥、寸步不离的王千户在妓院用酒灌醉,妓院仆役提着官家的灯笼,文天祥换了公服,直奔甘露寺下船。这时,江面上元军的船只连亘十数里,不时能听到巡逻船的吆喝声,十分恐怖。文天祥的小船进扬州七里港时,正好潮退,巡逻船搁浅,才没有遭遇。文天祥过江后,“镇江走了文丞相”,早已乱成一团,侦骑四出,大索数日,没想到文天祥竟然北走扬州、过高邮,经通州出海。这一路上,睡过坟堆,躺过猪圈,吃尽千辛万苦,于五月二十六日至温州。这时,宋端宗在福州刚刚即位,授文天祥通议大夫、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二个月后,再加授同都督诸路军马,为左丞相兼枢密使、

都督诸路军马陈宜中的副手。笔者为什么要将文天祥与陈宜中两人的官衔罗列出来比较，就是想说明，在景炎时代，文氏的地位略有下降。

景炎二年（1277）一月，文天祥在漳州主持抗元斗争。三月，一家人在漳州相聚。六月，有空坑之败。部队打散，儿子道生、佛生走失。妻子欧阳夫人及两个女儿柳娘、环娘，两妾颜孺人、黄孺人，均被元军俘获，文天祥也差点被擒。当时，他的密友赵时赏的轿子落在文天祥后面，追兵赶上来问："是谁？"赵时赏答："姓文。"元军以为抓了文天祥，立即送往大营。那天早上，正是重雾，寻丈以外，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天祥听得后面一阵喧闹，遂和儿子道生以及镇江救他的杜浒三人，簇拥着母亲曾老夫人得以逃脱。

赵时赏为救文天祥而被元军所杀，死得十分光彩。他是赵家宗室，长得风姿伟然，相貌堂堂，所以被元军兵士误认为是文丞相。赵时赏到了元军大营后，一直说自己姓文，元军搞不清他的真实身份。后来得知他是通判赵时赏时，十分恼怒，将他杀了。赵时赏很聪明。在军中时，看到同僚随身带着这么多的行李，还有美姬，感叹说："军行如春游，怎么行呢？"等到被抓，看到同僚也在，挥手说，你一个小小的签厅官，到这里来干什么？很多人因此而得以逃脱。

景炎三年（1278），因为有空坑之败，文天祥在南宋小朝廷已没有什么作为。三月里，他去了惠州，因为母亲和弟弟文璧在。其时，文璧的职务是户部侍郎、广东总领兼知惠州。四月里，端宗病逝，年仅十一岁。卫王赵昺即位，年仅八岁，以陆秀夫为左丞相兼枢密使，与张世杰共秉政，外筹军旅，内调工役。到八月，文天祥看看朝廷没什么动静，于是上表，先检讨自己空坑之败的责任，再请求回朝工作，但被拒绝，给了一个少保和信国公的虚衔。

文天祥驻军潮阳，与潮阳地方武装陈懿、刘兴等发生军事冲突。陈懿兄弟五人，号五虎，本是潮阳剧盗，南宋小朝廷势力南移后，陈懿等曾归附过，被授予右骁卫将军、潮州知州，但又绝不听督府节制。文天祥调集所部会师潮阳，杀了刘兴，陈懿脱逃，投奔正在漳州的元朝将领张弘范。张弘范派弟弟张弘正追击文天祥，天祥退至海丰县五坡岭，正坐在虎皮胡床上与客人一起吃饭时，被张弘正偷袭，猝不及防，遂被擒。

张弘范请文天祥修书一封，招降张世杰，文天祥写了一首著名的《过零丁洋》，诗云：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被解往燕京，途径吉州，百感交集。他是从吉州走出来的。他的理想，他的生活态度，最终被他的爱国主义所覆盖。他会想到什么呢？史书说他“痛恨不食八日犹生”，他痛什么呢？

他的仕途其实并不顺。自从元军正式进攻南宋之后，文天祥屡次向朝廷进言，却完全不被采纳。明朝有人评论说，被三次回绝而不恼怒，人是做不到的。文天祥做官，今天罢官，明天复官，这样的经历，有六七次，而且志愈坚，气愈烈，从来不自悔。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对他的评价很高：“天祥平生大节，照耀今古。而著作亦极雄赡，如长江大河浩瀚无际。”

元世祖忽必烈一直想用文天祥，羁縻了他三年，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他对文天祥说，你用为宋朝做事的劲头为我做事，我将用你为相。文天祥说，愿赐一死。临刑时，南向而拜，仰天长叹：“我事

毕矣。”时在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初九日,文天祥四十七岁。处死令下,元世祖还后悔,赶紧下诏书,但为时已晚。第二天上朝,他还在惦记这件事,对臣子们说:“文丞相真男子,本朝将相皆不能及,可惜也。”忽必烈并不是做秀,他有这个用人之量。史书记载,投降的宋恭帝到了元上都后,忽必烈三天一小筵五天一大筵地款待他,授予他开府仪同三司与大司徒的官职,封瀛国公,还将一名皇女嫁给他。瀛国公的故事延续到明朝,还被人所津津乐道。程敏政、钱谦益都是有明一代的学问大家,都饶有兴趣地来论证: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原来就是瀛国公的儿子。

关于文天祥担任平江知府时,被朝廷紧急调到临安,而放弃平江防务的一段往事,文天祥还是有点愧疚的。他说:“予过吴门,感念凄怆。向使朝命不令入卫严速,予以死守,不死于是,即至今存可也。”他知道苏州人对此颇有微词,对他不认可,甚至觉得他是逃跑主义。但文天祥真是觉得冤枉,他的证据是,他的离开,有两府严命。《姑苏志》说:“天祥去平江数日,邦杰开门迎降,都人大骇,议天祥弃平江。天祥出两府劄牓之朝天门,众始定。”两府是指那两个衙门呢?查钱穆《国史大纲》,宋代文事属宰相,武事属枢密。所以,中书省和枢密院,被称为两府。“劄牓”是上司行下的公文,唐人称牓子,宋人称劄子。由两府联合下达的公文,应该是最高级别的指示了。文天祥奉两府严命领兵去临安,苏州人对他,没什么好指责的了。

最后,将文氏后人交代一下。

文天祥死于宋,而其弟文璧以惠州尹的身份最终投降了元朝。有诗云:“江南见说好溪山,兄也难时弟也难。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金埴《不下带编》)文璧归元后,出任广西宣慰使。

文天祥得知后，很无奈地说：“兄为国家弟为家，各行其志。”

文天祥的儿子道生、佛生均死于战乱。文氏族人将文璧之子文陞过继给天祥。至元二十年(1283)，文天祥灵柩归葬故里，弟弟文璧时任临江路总管兼府尹，一切丧葬事宜都是文璧操办的，而文陞庐墓三年，为文天祥守孝。文陞在元皇庆间官至集贤殿学士，死于赣州。当时有人送了一副挽联：“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宋稗类钞》)世间事真是说不清楚。

文天祥的两个女儿柳娘、环娘被元军虏到大都后，分别随公主下嫁，均没有生育，终身为奴婢。文天祥的夫人欧阳氏，后由文陞供养，于大德九年(1305)去世。

苏州有文丞相忠烈祠，在元和县乘鲤坊，明嘉靖年建。乘鲤坊在何处？据楹联家俞涌先生告之，阊门下塘张广桥西街口西，旧有鲤鱼桥，用三条石板铺就，其方位在皋桥之北，与皋桥平行。俞涌先生幼年即住下塘禾家弄，后门在文山寺，建国初尚见此桥，今已不存。由此，大致可以断定，明朝之乘鲤坊，即是今已不存之鲤鱼桥。明代之文丞相忠烈祠，即今文山寺。文山，是文天祥的号。今文山寺依然还在，规模不小，有大小殿宇六十五间，因并入潮音庵，又名文山潮音禅院，建筑、碑刻尚存，为苏州市控制保护古建筑。

苏州之有文山寺，与文徵明叔父文森大有关系。文徵明在《先叔中宪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文公行状》中说：“公平生忠义自许，雅慕文山为人。以先世尝与通谱，且尝建节吴门，有功德于民，因言于朝，得列祀典。即所居建祠，俾子斗主之。吴之有文山寺，实自公发之也。”从中可知两点，一是现今文山寺的滥觞，为祭祀文天祥之文山忠烈祠，系文森创建；二是以“所居建祠”，当时文森的宅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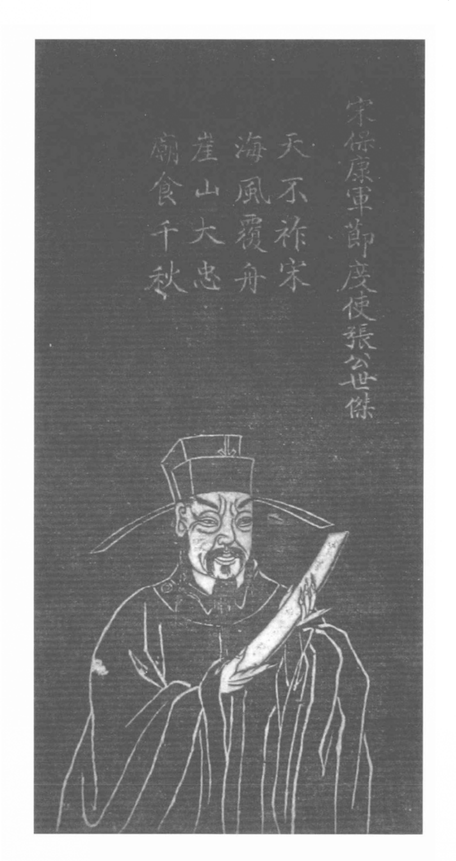
就在那里，文徵明并称其“疾卒于正寝，实公所建文山忠烈祠之右”。王稼句先生《吴门四家》说到此事。

文山寺一带的桃花坞，在南宋初年，尚有章楶故园留下的庆云亭等建筑，有岳飞题辞，待到一百来年后的文天祥游览桃花坞时，庆云亭周围已是一片油菜田，文天祥题了亭壁诗：“一片黄云万顷田，江南父老庆丰年。”但诗中没有提到岳飞。以文天祥的为人，不可能见到岳飞题字而熟视无睹，显见那时庆云亭的题额已经不是岳飞的笔迹了。

文天祥在这次出游中，认识了当时还在军府为吏的张世杰，两人一见如故，互相激励。之后，他们分别率军守过苏州城，又先后成为抗元的“贤相”。而两位首次相遇并结交为友的地方，就在桃花坞，这不能不说是桃花坞的光荣。

明景泰末年，张世杰后人于桃花坞采香庵旧址捐建张文忠祠，祭祀宋枢密使知苏州府张世杰。张世杰在德祐初曾总督府兵，收复平江。到十月份，正式知平江府，当过苏州的一把手。张世杰是守卫宋朝的最后一人，死于陆秀夫之后。《宋季三朝政要》记道：“张世杰复还崖山收兵，遇杨太后，欲奉以求赵氏后而复立之。杨太后始闻帝崩，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遂赴海死，世杰葬之海滨。世杰将趋安南，至平章山，遇飓风大作。世杰仰天呼曰：‘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复存赵祀，则大风复我舟。’舟遂覆，世杰溺焉。”

与文天祥一样，张世杰也是宋朝的忠臣良将，民族英雄。


宋保康軍節度使張公世傑
天不祚宋
海風覆舟
崖山大忠
廟食千秋

郑思肖　郑起

附记：郑清之　张国维　郑敷教　陆嘉颖

大明崇祯十一年（1638）冬天，江南少雨。整个冬季又寒又旱，川竭井涸。自从崇祯帝登基以来，先是陕西大旱，继而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也出现旱情，到崇祯十一年，终于旱过长江，连苏州这样的水乡也有点扛不住了，城里居民买水而饮。承天寺僧人达始想起，狼山房里有一口古井，已废弃多年，现在用水紧张，倒不如掏掏干净，出清污泥，至少也能派一口水缸的用场。这样一想，倒想出劲道来了，于是，说干就干，组织工人挖井。这一挖，却挖出一样惊世宝贝。起先，以为是一块砖头，抹去泥浆，却是一只大铁函，上面铸有三个字"铁函经"。达始弄不清此物来历，见有经字，不敢怠慢，将铁函整理干净，恭恭敬敬供奉在佛前再说。

承天寺从眢井中捞出一只大铁函的消息被一个人知道了。此人乃苏州西郊寒山别墅主人赵宧光的公子、古文字学家赵均。赵均是文从简的学生，也是他的女婿。赵均把这件事告诉了陆坦，自己外出旅游去了。陆坦想想好奇，就拖了郑敷教一起上承天寺找达始，


明舉人私謚貞獻先生鄭公敷教
寒蛟深潛
冥鴻避弋
象列三高
金韓同逸

想见识见识这件宝贝。写到这里，要把陆、郑两位介绍一下了。陆坦出身官员家庭，父亲陆嘉颖曾在天启年间做过主薄一级的小官，类似于政府办公室主任。郑敷教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郑光宙是大儒巷王敬臣的大弟子。但陆、郑两位也非寻常人等，他们俩是崇祯二年（1629）乡试举人，与杨廷枢、许元溥是同榜，人称"吴中四孝廉"。赵均也交代一下，他此次出门，好像很不顺利，两年后就死了，因此这只大铁函后来的故事，他都没有参与。

陆坦和郑敷教觉得，这只铁函里装着的绝对是件非同寻常的物事，非得打开看看。达始无奈，只好答应。铁函封锢极严，其缝隙用锡汁灌注。打开铁函，函四周填满石灰，中间包裹着一只锡盒，用蜡漆封裹。打开锡盒，里面有个纸包。纸包有两层，外包纸中间写有"大宋铁函经"，旁边另有两行字"大宋世界无穷无极"、"此书出日一切皆吉"；内包纸上写有"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十个字。再打开，则是折叠成卷的《心史》，原来是一部著作手稿，共七卷，计《咸淳集》一卷、《大义集》一卷、《中兴诗集》二卷、《久久书》一卷、《杂文》一卷、《略叙》一卷。咸淳是宋度宗赵禥的年号，仅存十年。大家一看，肃然起敬，这部《心史》藏在井中，已经三百六十多年了。

陆坦的父亲陆嘉颖听说后，极有兴趣，便与达始商量借阅，谁知达始一口回绝。陆嘉颖只好向文从简救援，文家父子与寺僧的私交不错，更何况文从简是赵均的老丈人，寒山赵家与承天寺更是熟人。不想达始还是不松口，此事拖了三个多月，直到明年的春天，由陆家出了一笔钱，由文从简作担保，才好不容易将稿本借出来。陆嘉颖读到文稿后，见《心史》历记南宋沦陷之悲，元朝腥秽之政，诗文甚奇僻，议论极慷慨，深为郑思肖此人此书所叹服。与文从简一商量，决定立即安排人员抄录，并萌发了要将这部奇书整理出版的念头。后来陆

坦果真把它刊行了，书名就叫《郑所南井中心史》，世称《铁函心史》。

郑思肖，字所南，一字忆翁，祖籍福建连江县，淳祐元年（1241）生于临安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郑震，后更名为郑起，字叔起，号菊山。郑家大概富有家财，郑起常年住在临安，早年因为科举不利，后来就放弃了，一心一意的读书，曾在浙东的于潜、诸暨、萧山等处主持教育，晚年担任安定、和靖两书院山长。郑起执教的安定书院在湖州，而和靖书院在苏州虎丘。两所书院都是当时的名校，所以被史家记录下来。

郑起很关心政局，而且脾气爆。淳祐七年（1247）四月，朝廷授郑清之为太傅、右丞相兼枢密院使，封越国公，执掌朝政。郑起认为宋理宗用人不当，很气愤，他不能骂皇帝，只能登门骂郑清之："端平败相，何堪再坏天下"。因为这是郑清之第二次出任宰相了。端平元年（1234），郑清之曾出任左丞相兼枢密院使。客观地说，其政绩还可以，郑清之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任用了一批正人君子为官，如真德秀、魏了翁、李宗勉、杜范、李韶等。端平三年（1236），因为大雨雷电震坏了宋理宗行礼的明堂，被认为天象示警，非人之咎，郑清之被罢免，一起罢免的还有右相乔行简。因此，郑清之端平罢相，基本属于意外。但这个意外，被理宗利用了。不久，理宗恢复了右相乔行简的职务，而把郑清之忘了，说明理宗心中有想法。那么，郑起骂得对不对？对。《宋季三朝政要》说，郑清之淳祐任相，像变了个人似的，居然将国家大事交给他的子侄来处理。郑起上门骂人，至少是个治安事件，于是被抓，连带子女一起被关。京兆尹赵与筹觉得处理过当，将郑起一家偷偷放了。大概就是这个事件过后，郑思肖随父移居苏州，时在宝祐二年 (1254)。这年，他十四岁，考中了秀才，

成为太学上舍生。宋朝的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等级,称为三舍制。外舍生二千名,每年一考,博取三百名内舍生名额。内舍生也是每年一考,博取一百名上舍生名额。这是北宋的情况。到南宋,疆域减少,需要的官员后备也少,每年的上舍生仅为三十名,但录取比例是一样,整个宋朝,从外舍生培养成上舍生,其比例大致都在二十比一。上舍生完成学业后,可以推荐给中书省授官。但从学校这条路径进入仕途的,级别不高。想做大官,得走科举这条路。

郑思肖能成为一名优等生,与父亲郑起学问好恐怕大有关系。因为宋朝的太学,其实不需要学生天天上学,注册挂名就可以了。而郑思肖的优势在于家中有位知名度很高的老师。为什么这么说?自然有根据。

郑起执教虎丘和靖书院第一堂课,写了一首诗,题为《虎丘尹和靖书院示开讲》,诗云:"和靖书堂八面开,新分半席在山隈。若无人听都归去,传语生公借石來。"后两句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人听课,就问生公借石头来听。"生公说法,顽石点头"是虎丘一典。郑起为什么这么说?原来此诗还有一句小注:"从前听者少,是日听者多。"原来,郑老夫子说的是反话。他其实很得意,得意得摇头晃耳,要说说嗲话了。

郑起还有一首诗,也与虎丘有关,题为《宿虎丘》,诗云:"到晚归不去,因而此宿休。云深千古寺,月冷一天秋。崖裂池如束,天虚墖欲浮。最宜初日上,高处看烟收。"住在虎丘,却回不了家,可见宋朝交通之不便。那郑起的家在哪里?据郑思肖《三膜堂记》记载,在苑桥。苑桥至今尚在,坐落于平江河与干将河的交汇处,相传为吴王阖闾园囿游憩之地。

翻阅郑起的诗集《清隽集钞》,还有几首充满苏州风味小诗,读


宋太學生鄭公思肖
宋之遺老
元之逸民
一編心史
抱恨千春

来也清隽淡雅，就像他的书名一样。试看：

“晴采桑，雨采桑，田头陌上家家忙。去年养蚕十分熟，蚕姑只着麻衣裳。”（《采桑曲》）

“上山斫山山丁登，下山嵌山山稜层。秋残日暮归來晚，茅檐洗脚月又明，明朝早入芙蓉城。”（《樵歌三首之一》）

“入城不识公与卿，行歌道上傍无人。衣衫蓝缕鹑百结，与妻索笑妻生嗔，那知不是朱卖臣。”（《樵歌三首之二》）

可见郑起不仅学问好，还是个性情中人。

说完老爸说儿子。

郑思肖的精彩处，他是一位极其可爱的爱国诗人和画家，元兵南下后，他的生活和意识形态被打乱，在他的内心里，始终生活在大宋世界。对元蒙统治，他处处抵触。他毁家，寄迹寺观庙宇，固守着自己的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他没有妻孥，以书画自娱，是位孤独的、乐观的、幽默的、不屈的，甚至有点偏执的爱国者。

他原名少因，宋亡后改为思肖。繁体字的“趙”，俗称“走肖趙”，“趙”字“走”了，馀下“肖”字，因此，思肖就是思赵。他字所南、忆翁，也表达了思君的意思。南宋最后亡于海南，是为所南，忆翁，即义不忘赵。每年的岁末年初和卫王赵昺忌辰，他都要跑到野外，南向痛哭一场。他在家里呆着，也是面南而坐。他自题自己的居室叫“本穴世界”，“本”字去“十”，加在“穴”字下，正好“大宋”两字。他曾写了一部经书，叫《大无工十空经》一卷，谁也弄不清是什么意思。他自题其后云：“臣思肖，呕三斗血，方能书此，当有巨眼能识之。”后来人家读懂了，“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这部经书就叫大宋经。

郑思肖精于画墨兰。自宋朝灭亡后，他画的兰花就不带泥土了，有人很奇怪。他说，土地都被别人夺去了，你不知道吗？由此，郑思肖创造了一种兰花的新画法"露根兰"。元朝的苏州地方官想求他一幅兰花，他坚决不给，地方官很恼火，扬言要对他的三十亩地课以重税。他回答得很干脆："臂可断，兰不可画。"他有一方隶书闲章"求则不得，不求或与，老眼空阔，清风万古"。说得拗，而且傲。"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一点馀地也没有的。他自题的《兰花图》有这样四句："纯是君子，绝无小人。深山之中，以天为春。"元代书画大家倪瓒十分理解他的心迹，《题郑所南兰》诗云："秋风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当别的人已经在新朝欢欣鼓舞的时候，只有郑所南还是异常的执着。

郑思肖绘画作品存世很少，据称仅存四件。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收藏的纸本《墨兰图》是目前惟一没有争议的存世真迹。《墨兰图》作于元大德十年(1306)元宵节，落款为"丙午正月十五日作此一卷，"不写年号。丙午为公元1306年，当时宋亡已二十六年了，思肖年近七十，早已是生活在元代的南宋遗民了。

赵孟頫是一代书画大家，名重当世，他是宋宗室，却投降了元朝，还写了"往日兴亡今莫问，且将忠赤报皇元"这样的诗，十分恶心，所以郑思肖很看不起他，与他绝交。赵孟頫住在湖州，与苏州很近，曾数次前来，终不得一见。郑思肖不事北面他姓，更不与北方客往来，有时在朋友座上遇见，有口音不一样的，他就借故离开，大家也不以为怪。历朝历代的遗民脑筋转不过弯的，有点怪脾气的，大有人在，也很正常。后代史家称郑思肖是"独往独来，独处独坐，独行独吟，独笑独哭的奇人"。

郑思肖十四岁到苏州，也终老在苏州，在苏州生活了六十四年。

他先是居住在苑桥,后迁居乐桥东条坊巷(今调丰巷),住了十年。父亲在条坊巷逝世后,郑思肖与母亲从条坊巷迁往黄牛坊桥(今黄鹂坊桥)。后来又在采莲巷、仁王寺、双板桥、望信桥、皋桥住过,最后复迁望信桥。

郑思肖为什么这样频繁地搬家,找不到答案,既找不到政治上原因,也找不到经济上的原因。郑家应该是很殷实的。嘉定十三年(1220),郑思肖的父亲郑起敢于携眷出闽,到临安定居,没有经济的支撑,是不可想象的。郑家在苏州也是有地有房的。据《姑苏志》记载,郑思肖后来把房子卖了,卖房子所得的钱,用来周济他人之急。而自己居无定所,苏州周边的名山、禅室、道宫,他是常客。平时经常住的地方,是苏州万寿、觉报两所寺庙,晚年定居承天寺。而郑家祖传田产,他都捐给庙里。为什么要捐?这是典型的遗民心态。将田产捐了,就不用为新朝纳税了。郑思肖仅留数亩作为衣食之资。有多少?据陶宗仪《辍耕录》的记载,是为三十亩。这三十亩地,郑思肖还关照佃客:"我死,则汝主之。"

郑思肖一生没有娶妻,他皈依佛门了。他的母亲楼氏,也是比丘尼,受业于饮马桥南的宝林尼寺。

郑思肖活了七十八岁。临死时,关照他的密友唐东屿说:"思肖死矣,烦为书一位牌,当云'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说完气绝而亡。不忠,指他没能为国而死;不孝,指他没有子嗣。这位唐东屿,也是苏州人氏,但生平事迹全无记载。

郑思肖其人其事,元末明初的陶宗仪在《辍耕录》中就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也载入《苏州府志》和《宋遗民录》,但传世的诗文并不多。《心史》的发现,一下子将宋末元初的这位奇人、奇文,推到了大家的面前。其《补梦中所作》诗云:"鸿雁流离梦亦惊,满怀凄怨

足愁声，此身不死胡儿手，留与君王取太平。”《飘零》诗云：“飘零书剑十年吴，又见西风脱尽梧。万顷秋生杯后兴，数茎雪上镜中须。晴天空阔浮云尽，破屋荒凉俗梦无。惟有固穷心不改，左清右史足清娱。”《此心》诗云：“此心期不变，曾洒血为盟。举世无人识，终身独自行。海中擎日出，天外唤风生。净尽去云雾，重开白昼明。”《咏制置李公芾》诗云：“举家自杀尽忠臣，仰面青天哭断云。听得北人歌里唱，潭州城是铁州城。”

郑思肖也并非是个政治狂人，他的一些闲情诗，读来清新自然，说明他的心理很正常。其中有几首写到苏州的，读来特别亲切。如《春日游承天寺》诗云：“野梅香软雨初晴，來此闲听笑语声。不管少年人老去，春风岁岁阖闾城。”《春口偶成五绝》诗云：“山塘游舫接荒城，纵有笙歌耳不清。深忆国家无事日，人心和气是春声。”《夏驾湖晚步》诗云：“豈独吴王事可怜，人生回首总凄然。空嗟落日犹如梦，不记东风几换年。宝驾迹消前古地，菱歌声断晚來船。如今城郭多迁变，茅屋荒颓草积烟。”

如果要选一首可以留在厅堂里的诗，我会选他的《无题》：“凤凰身宇宙，麋鹿性山林。天下皆秋雨，山中自夕阳。”觉得写得好极。而最能体会退休后的写作生涯，我会选他的《隐居谣》：“布衣暖，菜羹香，诗书滋味长。”几乎就是我想说的话。

近年来，郑思肖变得吃香起来了。2008 年 3 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回答台湾工商时报记者的提问时说：“我是一个爱国者，我的脑子里总在想“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这两句，就出自郑思肖的《德祐二年岁旦》，全诗云：“力不胜于胆，逢人空泪垂。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日近望犹见，天高问岂知。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

一个诗人的作品，历经八百年后，依然能表达出国家声音，这就是爱国诗人的幸运。

《心史》抄录整理好后，陆嘉颖和文从简各写了一篇跋文，并在苏州士人间传阅。一时题跋者有杨廷枢、张世伟、郑敷教、许元溥、姚宗典、姚宗昌等，并上报苏州地方长官应天巡抚张国维。张国维与文震孟是同榜进士，文是状元，张是同进士，崇祯七年（1634）调任是职。张国维抚吴，颇有政绩。建苏州九里石塘及长洲至和塘、平望内外塘，修松江海堤，纂修《吴中水利全书》，所以苏州士人对他印象不错。张国维是位好官，是他发现并提拔了史可法，向朝廷推荐就任安庆巡抚。他出面刊刻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他坚持抗清，直至清顺治三年（1646）六月，知事不可为，才在家乡东阳投水死，是位气节之士。张国维当年收到《心史》，“览而异之，立捐俸修梓”，将自己的俸银捐出来，为地方办事，是件很风雅的事，并不是苏州士人连印本书的钱也没有。譬如说，为《心史》作题跋的许元溥，号千卷生，家在甫里，有梅花墅，聚书连屋，富于收藏，都是不差钱的主。

《心史》付梓刻书，书稿仍归寺僧保存，张国维还请同乡冯维位写了跋，并在井边立有一碑，记录了这桩文化盛事。崇祯十七年（1644），原稿归郑敷教收藏。到顺治初年，郑家仇人吴好古以私藏《心史》的罪名，向苏州将军李延龄告发，虽未果，但从此《心史》不见下落。至康熙年间，学者徐乾学、阎若璩、全祖望等提出，《心史》为伪作，至乾隆年间，被列为“四库禁书”。而顾炎武作《井中心史歌》，近代历史学家孟森号心史，都是对《心史》的肯定。梁启超读《心史》，每读完一篇，热血就“腾跃一度”，他说：“此书一日在天壤，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永无尽也。”他主张中国应该有“郑思肖精神”的。

皇清賜謚忠敏明督師大學士張公國維

撫綏十郡
大度淵涵
疏通水利
澤被東南

唐寅　韩世能
附记：徐经　徐祯卿　袁袠　宋荦　仇英

明成化六年(1470)二月初四,唐寅出生于苏州吴趋里。吴趋里,现在叫吴趋坊。宋人郑樵《通志》说:"吴趋者,吴人之舞。"在古代,那里也许是个类似市民广场的地方。当年伍子胥流落吴市,曾在吴趋坊吹篪乞食,正是选对了地方。在吴趋坊亮相,人流多,传播快。

在明代,吴趋坊依然是一个极知名、极热闹的去处。它北接皋桥,南接黄鹂坊桥(即黄牛坊桥),与第一直河平行。古代苏州以船为主要交通工具,所以,吴趋坊的繁荣就可以想见的了。旧时迎神赛会,吴趋坊是必经之地,于是留下一句俗谚:"吴趋坊看会,老等。"

说了许多吴趋里的事,其实是想交代一下唐寅生活的社会环境。因为他的父亲唐德广,在吴趋里北、皋桥头开一家小酒楼。由于地段好,想来生意不错。所以,如果断定唐寅生活在一个略为小康的人家,苏州的文史专家们,大致不会有意见。但唐寅的阶级层次显然不高,开酒楼的,属于吃油腻饭,基本是社会下层。按照朱元

璋的看法，比农民（自耕农）都不如。对此，唐寅的感受也很深。他曾在《与文徵明书》中，称自己"居身屠酤，鼓刀涤血"，话虽然说得有点愤慨，但唐寅出身低微，也是事实。父亲唐德广，亦作唐广德。据王稼句先生《吴门四家》说，南京博物院藏祝允明撰、王宠书《唐子畏墓志并铭》，作"父德广"，故从碑文。

唐寅的名字也很有意思。他是明成化六年出生的，农历庚寅年故取名寅。在十二生肖中，寅属虎，所以字伯虎。一般来说，中国男子一生有三个名字。刚出生三月会笑时，就有小名，这是从商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传。为什么要三个月后？因为古代婴儿的存活率低。取小名的另一个理由是祭祖，生儿育女，特别是生男孩，得告诉祖宗先人，后继有人了，当然要起一个比较正规的名字，否则祖宗不认识。待到孩子进学，有了第二个名字，叫学名，或称庠名，也叫大名。有的人一辈子进不了学，也一辈子没大名。唐寅这名字应该是进学时所取，依生肖取名，比较简单，而且男子称虎，还是蛮好的。从伯虎两字，还可以看出，唐寅是家中长子。伯，排名老大，很明了。成人后，人名不能随便叫了，呼名犹如呼命，于是有了名讳。这也是从远古的巫术意识中传承下来的，保护自己的名，也就是保护自己的命。民国以前的知识分子，都有字，称为表字，方便别人称呼的。古人不仅有字，成人后还常常更字。唐寅有两个字，一字伯虎，更字子畏。

中年以后，唐寅还有许多别号。起别号是明中期以后兴起的时髦物事，不但文化人有，乞丐也有，皇帝也有，嘉靖帝就有许多号。唐寅的别号有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旧时文人的别号，信息量很大，常常是解读其人的一把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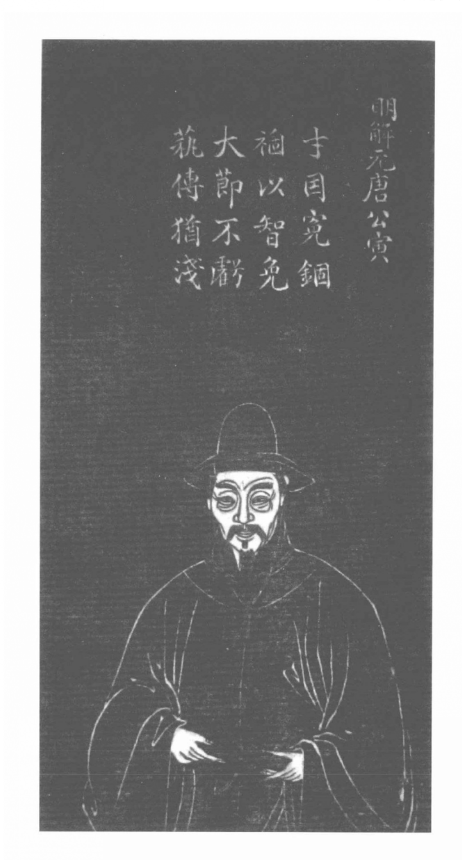
青年唐寅读书很用功，目的性很强，就是要登龙门，改换门庭。

他有一首《夜读》诗，透出其中消息："夜来欹枕细思量，独卧残灯漏转长。深虑鬓毛随世白，不知腰带几时黄？人言死后还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场。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读文章。"他实在是太需要这功名了。

唐寅在十六岁时以第一名得中府考，成为一名生员，即秀才。此后久困科场，长达十四年，实在是太长了。二十四岁时，唐寅曾往福建仙游九鲤湖祈梦，希望得到仙人指点。结果真得了一梦，梦见仙人遗墨一担，有万个之多。后来唐寅建造桃花庵时，还专门建了个梦墨亭。但这种荒诞的故事，近乎痴人说梦，能糊弄自已，能糊弄别人吗？都不是。唐寅造这样的舆论，其实是想抛弃举子业，将绘画进行到底了。试想，梦人遗墨万个，指点唐寅做什么？画画啊。因为暗示科考的，不会用墨，而是用笔。科举考试，就是做文章。

写到这里，要把思路校正一下。明代士子，对于书画，本来就十分讲究，能写几笔真草隶篆，涂几笔山水花卉，不算什么稀奇事，是文人应有的技能。但将副业转为正业，就不免有点难堪。更何况，明代的专业画师哪有像现在这般吃香？一代大家文徵明以岁贡进京，授翰林院待诏，兼职画师，尚且被翰林们瞧不起，后来他愤而辞职。那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年代，而书画仅是士大夫文化生活中的附载物，所谓琴棋书画，均是玩物。即以书画而论，书为上，画为下。书法是士子的必杀技，一手好字，是起码的本事。书法不好，在科举的道路上也很难走远。至于绘画，是那个时代的软装修，实用性大于艺术性。厅堂里挂的四季花卉条屏，季季要换，没什么了不起，所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也。所以，唐寅想走绘画这条路，非常没面子，只能假托天意神授。个中滋味，只有唐寅自己知道。

唐寅为什么作此打算？怕与经济有关。一名秀才，一年中官府


明解元唐公寅
才因寬錮
禍以智免
大節不虧
藝傳猶淺

下拨的膏火钱,充其量三四两银子,要养家糊口,非常困难。再说,唐寅的老爸毕竟是开小饭馆的,能有多少进账?作出这样的判断,还有一个理由:唐寅二十三岁的时候,三十四岁的祝允明终于中举了。这对唐寅来说,似乎有点刺激。说不准还要熬十年,才能弄个举人,仅仅是个举人而已,科举真是一场望不见头的漫长旅行。

二十五岁的时候,父亲唐德广死了,他没有看到唐寅成为江南乡试解元。这一点,说什么也是极其遗憾的。他一生的希望就是儿子为他光宗耀祖。他虽然是个商人,却不乏士子的品格。他对唐寅怀有极大的希望,希望唐寅以举业起家,并一直教导他不得违背父亲的旨意。“德广常语人,此儿必成名,殆难成家乎”?但是,年复一年的科场失意,也令唐寅几乎绝望。他看不到自己的路,生活放纵。男人常常犯的错,他也犯过,因此而被祝允明斥责了一通:“你如果想完成你父亲的指望,你就好好地做举子之业。如果你一定要顺从你的愿望画画,那你就干脆把蓝衫幞头(明朝秀才服饰)脱了,将科策烧了。现在你挂名学宫,而精神不在科策上,你究竟想要什么?丢什么?”面对这样的责问,唐寅回答:“诺。明年当大比。吾试捐一年力为之,若勿售,一掷之耳。”

从行文上看,祝允明与唐寅的这番对话是在弘治十年(1497),因为弘治十一年是乡试之年,唐寅准备为之一搏了。明朝的乡试,采用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并不是所有的秀才都可以参加乡试,得进行选拔。这种选拔考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叫科考。唐寅参加科考的文章,南直隶应天学政方志并不喜欢,差点被黜革,幸亏苏州知府曹凤力荐,才勉强以最末一名入选,获得参加弘治十一年应天乡试的资格。曹凤对唐寅的评价很高,称他是“龙门燃尾之鱼,不久将化去”。而曹凤之所以青睐唐寅,是文林的推荐。文林是文徵

明的父亲，当时任温州知府。所以，文家对唐寅是有恩的。唐寅真没让人失望，居然高中应天乡试第一。唐寅得意极了，刻了一方印"南京解元"。这一科，解元唐寅，经魁陆山，锁榜陆锺，都是苏州人。经魁得解释一下，凡乡试的第五至第一名，统称五经魁，因为第一名另有美称，叫解元，因此经魁常指第二至第四名，如第三名经魁、第四名经魁。锁榜，即为最末一名。知府曹凤好不得意，作彩旗，上书："一解一魁无敌手，龙头龙尾尽苏州。"唐寅此时对南京的感觉太好了，在一次聚会上，即席创作了《六朝金粉赋》，南京是他的福地。

唐寅的座师是司经局洗马梁储，大名人，大学问家。司经局洗马掌管国家典籍，翰林出身，坐在这个位置上，离尚书、侍郎就不远了。梁储曾编纂《明会典》，官至吏部尚书，一度还进了内阁。有这样的热门官僚做老师，前途无量，唐寅暗暗高兴，写了七律《领解后谢主司》，诗中有"壮心未肯逐樵渔"、"红绫敢望明年饼"诸句，他要红绫披身，志向不言自明。梁储也很喜欢唐寅这个门生，乡试后，将唐寅的卷子带到京里，程敏政看到后，也觉得这小子前途无量。

乡试在秋天举行，叫秋闱。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即举行会试，叫春闱，其间仅隔一个冬天，所以时间很紧。按照唐寅的才情和发挥，唐寅成进士的可能性很大，他在京城里，至少有司经局洗马梁储、詹事府少詹事程敏政、吏部侍郎吴宽、吏部尚书倪岳在照应他。其中，吴宽是苏州老乡，状元出身。倪岳是当朝名臣，大学问家。程敏政是这次会试的副主考，其身份为掌詹事府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显赫得很。

当时，会试已考过两场，不想风云突变。户部给事中华昶上疏弹劾程敏政出卖试题。孝宗下旨："学士程敏政不得阅卷，徐经、唐寅不得录取。"并将三人及华昶都下了诏狱，由锦衣卫审讯。唐寅

后来回忆说："天子震赫，召捕诏狱，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涕泗横流"。从一个意气风发的江南解元突然间坠入地狱，受尽皮肉之苦，尊严全无。这巨大的反差和打击，落在任何人头上，都是受不了的。

弘治十二年(1499)的这场会试，江阴举人徐经相约与唐寅同行。徐经是江阴县学增广生，以治《易》见长，弘治八年(1495)乡试第四十一名举人，比唐寅高一届，家饶赀财。唐寅是苏州府学附学生，治诗，新科解元。徐经仰慕唐寅之材，唐寅借徐经之财，珠联璧合。但徐唐此行最大的失误是太张扬。徐家是江南巨族，超级大富豪，每年上缴的国赋达数千石。这种人家，谁不仰其鼻息？手上掌握的社会资源十分丰富，历史上，就与当今主考有交往。徐经的祖父徐颐于成化十九年(1483)去世时，翰林院侍读学士李东阳撰写了墓志铭，而且经办这件事的就是徐经。李东阳在铭文中写道："其孙经具书状以请于予。"现在，李东阳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出任主考，徐经能不张扬吗？心里早已乐开了花。而吴宽曾为徐经的父亲徐元献作墓志铭，也是熟人。而且吴宽此人非常厚道，很愿意为家乡作贡献，奖挹后人，是他最乐意的事。吴宽的官衔是吏部侍郎，但他真正职务是弘治帝和正德帝的师傅。

徐唐两人到京后，"公卿造请者，阗咽街巷。徐有优童数人，从六如日驰骋于都中，都人瞩目者已众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赴京赶考要带着戏子，真亏徐经想得出。北京的政治势力要借机生事了，于是有华昶的弹章出笼。北京的试子也不甘心这两个江南人在京里闹腾。有明一代，全国的生员约有五十万人。这些学子都挤在科举的羊肠小道上，每三年仅录取二三百名进士，其搏杀之激烈可想而知。凡有开后门之嫌的，必定会引起全社会的愤而攻之。唐

寅在《与文徵明书》中，痛苦地陈述："海内遂以寅为不齿之士，捽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辱亦甚矣。"

此案查下来，虽然证据不足，但处分不轻。徐经、唐寅有交通主考情节，徐经黜为民，唐寅黜为吏。华昶奏事失实，降调为南京太仆寺主簿。程敏政勒令提前退休。程敏政出狱后，咽不下这口气，愤恚发毒疮而死，后赠礼部侍郎，算是为他平反。在舆论上，北京政界都觉得此案是傅瀚在背后搞鬼。在詹事府衙门，程敏政是正职，傅瀚是副职，傅瀚搞掉了程敏政，果然取而代之。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中，说傅瀚后来白昼见鬼，忧悸成疾而死。明显有诅咒他的意思，同时发泄了苏州人的不满。王世贞，太仓人，生于嘉靖五年（1526），而唐寅已在嘉靖二年（1524）十二月去世了。这两位文化名人生在同一个时代，就这样阴阳相隔了。

江阴徐家要补叙一下。徐经被黜为民后，被处以"废锢终身"，就是终身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正德元年（1506），朱厚照继位，徐经进京申诉，希望有所澄清。不想进京后就病卧永福禅寺，第二年客死他乡，年仅三十五岁，吴宽写了墓志铭。他有遗著《贲感集》，文徵明为之序，但没有出版。徐经死后，名下有田产四万多亩，夫人杨氏为子女析产，两个儿子各得一万二千五百九十七亩田，可见徐氏家产之巨。传至四代，徐家出了个大名人，旅行家徐宏祖，即徐霞客。当旅行家得有钱有闲，这两项，徐家都占了。徐霞客死于崇祯十四年（1641），发生在顺治二年（1645）的江阴屠城他没看到，尚是有福之人。他的《徐霞客游记》被誉为明代四部科技巨著之一，另三部是李自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弘治十八年(1505),唐寅三十六岁,在皋桥之北的桃花坞买地,谋筑桃花庵别业。这块地方原是北宋名将章楶定居苏州后建造的桃花坞别墅,人称“章园”。园内阡陌交通,溪流萦带,暮春三月,菜花油油,黄金布地,一望无限。金兀术南下,将章园一把火烧了,但田园风光依然。唐寅有《姑苏八咏》,咏唱的八处地方其实是明代苏州的著名景点,是为天平山、姑苏台、百花洲、桃花坞、响屧廊、寒山寺、长洲苑、洞庭湖。其《桃花坞》诗云:“花开烂漫满村坞,风烟酷似桃源古。千林映日莺乱啼,万树园春燕双舞。青山寥绝无烟埃,刘郎一去不复来。此中应有避秦者,何须远去寻天台。”苏州有这样的好地方,为什么还要远去天台寻觅呢?唐寅从桃花坞风烟中,找到了避世的感觉,他要找一块清净地方。

唐寅买地,当然仅是其中极小部分,即今廖家巷准提庵至北面唐寅坟一带,面积不大,旧称唐家园。园中有桃花庵、学圃堂、梦墨亭、读书阁、蛱蝶斋、检斋、寤歌斋等,四周遍植花木,尤以桃花为多。唐寅有《桃花庵歌》,脍炙人口,诗云:“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开花落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笑我忒风颠,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自章楶建桃花坞别墅后,“桃花坞”三字就深深印在苏州人的记忆中。章园毁,“桃花坞”三字因唐寅再建桃花庵别业而发扬光大,苏州士子在桃花庵时有雅集,我们在唐寅诗集中可以轻易地找到《桃花庵与祝允明黄云沈周同赋》、《长洲高明府过访山庄,失于迎


明國子監博士徐公禎卿
迪功有集
名滿士林
文章壽世
式昭德音

迓，作此奉谢》、《桃花庵与希哲诸子同赋》、《桃花坞祓禊》、《社中诸友，携酒园中送春》等作品。唐寅在桃花庵很开心，宾客盈门酒当茶，芳园正在桃花坞。看得出，这段时间，唐寅已从科场案的阴影中走出来了，身边有沈九娘相伴，经济上虽说并不富有，但一壶浊酒，一盘韭菜，还是有的。

唐寅的桃花庵，断断续续造了好些年，从弘治十六年（1503）动工到正德三年（1508）历时五年，尚未完工，还开口问徐祯卿借钱。徐祯卿也很背运，他在弘治十八年（1505）成进士后，因为长得丑，弘治帝不喜欢，没有入选翰林院，被派到大理寺，担任左寺副，也是七品官。明朝的大理寺，职权比清朝略高，负责案件的审核封驳，凡是刑部经手的重犯，大理寺都要过堂。徐祯卿在任上，恰恰丢失了犯人，朝廷追查责任，被降为国子监博士，当教师去了。唐寅问他借钱，他哪里有，只好回了一首诗《唐生将卜筑桃花之坞，谋家无赀，贻书见让，寄此解嘲》。徐祯卿寿短，仅活了三十三岁，过了三年，就去世了，心情不愉快，怕是一个原因。

虽说唐寅建造桃花庵，也是惨淡经营。但建成后，凭着唐寅的人气、才气，依然引来了它的全盛期。袁袠说："唐子畏筑室桃花坞中，读书灌园，家无担石而客尝满座。风流文采，照映江左。"袁袠，字永之，号胥台，吴县人。嘉靖四年（1525）应天乡试解元。他的命运比唐寅好些，中解后成了进士，由于不肯拍马屁，已经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仍然被权贵踢出来，发为刑部主事，后改兵部。那天夜里代人值班，衙门失火，被诬为纵火，差点被砍了脑袋。后来拿不出证据，被发配湖州。这种经历，与唐寅有相似之处。因此，他是唐寅诗文的积极收集者，也是第一个刊行唐寅集的出版家。

杨静庵《唐寅年谱》认为，桃花庵文酒之会，历十年而不衰。唐

寅是嘉靖二年(1524)十二月去世的,嘉靖之前,是正德帝武宗朱厚照,在位十六年。因此也可以说,桃花庵的全盛期在正德年间。这十年,正当唐寅四十岁至五十岁,年富力壮。唐寅四十五岁的时候,接受宁王朱宸濠的聘请,去了一趟江西。同时邀请的还有文徵明、谢时臣等。文徵明与唐寅同岁,谢时臣年轻一点,三十多岁,以山水著名,也是苏州人。文徵明托病没有成行,唐、谢两人都去了,后来一看苗头不对,落荒而走。四年后,宁王朱宸濠造反被杀,这是后话。唐寅等人又不认识朱宸濠,朱宸濠为何会有邀请之举?原来是一个苏州人在牵线,他就是江西按察使陆完,《明史》称他“有才智,急功名,善交权势”,可见是个人物。他曾镇压了刘六、刘七农民起义而升官至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进而升任兵部尚书。陆完曾收受朱宸濠的巨额贿赂,结果搞得很惨。朱宸濠失败后,搜查出他与宁王的往来信函,正德帝震怒,诏令逮捕陆完及母妻子女全家,抄家封门。陆完押进北京的时候,赤膊反绑游街,背上插着一根竹竿,上面写着犯人的姓名。本来要处以极刑的,正巧正德帝去世,嘉靖即位,才免于一死,发配到福建靖海卫,九十老母死在狱中。至于宁王为什么要聘请几个画家去,去帮他造反吗?从来没有人说得清楚。想来宁王也是一个极有想法的人,只是成王败寇而已。

翻开一部中国美术史,有人曾这样议论说,倭寇曾不止一次地骚扰过文徵明居住的地区,但在文徵明的诗和画中看不见丝毫的反映,由此而表达出强烈的不解。奇怪的是,苏州文人的退避、安于恬淡闲静,以善良懦弱处世,又常常被歌颂为品格高尚。传文徵明为他人鉴定书画,常常故意将赝品鉴定为真迹。有人仿冒了他的作品,他甚至不拒绝在画上题款。这种性格,在另一个苏州画家沈周身上也有。以这样的精神状态,苏州文人有什么资格参与改朝换代?宁

王召来几个胆小怕事的苏州人能做些什么?

唐寅,虽说他的性格比文徵明要叛逆一些,但他对现实世界的反叛,充其量是嘲弄和调侃,甚至扮演插科打诨的角色。譬如他的《伯虎自赞》便说:"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再譬如他的《五十自寿》诗云:"自家只道是童儿,谁料光阴蓦地移。总算一万八千日,犊成四十九年非。从前悲喜皆成梦,向后荣枯未可知。去日已多来日少,急忙欢笑也嫌迟。"唐寅的诗,贵在通俗明白,看看似乎肤浅,其实富含哲理。宁王召他去,也是慕其名,充其量,宁王借落魄文人的脸面而将谋国之心遮掩起来,如此而已。

却说唐寅从宁王处落魄而归,苏州对他的流言蜚语,扑面而来。其中最厉害的,说唐寅为了骗过宁王,故意在朱宸濠的差人面前,"裸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四友斋丛说》)。这种记载,已经近乎泼脏水了。江西之行后,唐寅就一直住在桃花庵,直至去世。据其嗣子兆民所撰《遗民记》记载,灵柩于当年葬于桃花庵次。今日之桃花坞,尚有一处地方叫唐寅坟,此说不虚。而祝允明所撰墓志铭,说是葬在横塘王家村。可见当时丧家有先暂厝、后移坟的。嘉靖二十二年(1543)移葬横塘王家村,即今解放西路唐寅墓,而桃花庵就渐渐地荒废了。到明末天启元年(1621),仅八十年光景,杨大溁在桃花坞买地修建准提庵,已不知这里就是桃花庵了。第二年,精舍完工,禅僧闻宗入持。有顽童在池塘里玩水,摸到一方石碑,捞起一看,乃唐寅《桃花庵歌》石刻,另有祝允明题写的庵额,才明白这里原是桃花庵故址。闻宗闻讯,走告杨大溁,杨大溁抚几三叹,而闻宗亦为之三叹。为什么呢?先前,苏州籍的礼部左侍郎韩世能退休后,曾经想复建桃花庵的,但由于寻访不到原址,所以这件事没有做


明禮部侍郎韓公世能
秩宗典禮
奉職寅清
君子有穀
子孫其繩

成。韩世能留有一封手札，非常懊恼地写道："百年遗迹，竟付衰草斜阳。"现在，桃花庵找到了，韩世能早已去世，杨大渫、闻宗的运气比韩世能好多了，当然为之唏嘘了。

韩世能此人，要略微介绍一下，他表字存良，号敬堂，长洲人，祖籍南阳，生于嘉靖七年（1527），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活了七十一岁。他大器晚成，四十一岁才成进士，选为庶吉士，同馆三十人，他是最年长的。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参与整理世宗、穆宗实录。实录完成后，照例要嘉奖升官，他升任修撰，充经筵日讲官。以后，历任侍读学士、国子监祭酒，以礼部左侍郎致仕。古人尊礼部春官为宗伯，故他又被称为韩宗伯。相传母亲在生他的时候，梦佛降生，人们又称他为韩佛子。韩佛子是桃花坞人，他的家就叫韩衙庄，在廖家巷的西侧。后来，韩佛子将旧居及田圃全部舍作佛寺，这座佛寺叫福田庵。韩世能是明朝晚期的收藏大家和鉴赏家，属于顶级水平。凡是盖有他的印章的，绝对是好东西。他身后有两桩值得骄傲的事，一是一代大家董其昌是他的学生，二是康熙十二年（1673）状元韩菼是他的曾孙。

杨大渫在准提庵留了一处地方，供奉唐寅、祝允明两位，后又加了文徵明。当时就画了一张唐寅小像，唐寅有像，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但唐寅四十八岁时，文伯仁为他画过一像，他还题词作答，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至康熙三十二年（1693）冬，又一件大事发生，有居民在桃花坞准提庵西掘得"明唐解元墓"一碑，是明嘉靖五年（1526）苏州知府胡缵宗所书，唐寅之弟唐申所立。这更证实了唐寅确实曾安葬于此。江苏巡抚宋荦亲往视察，决定捐出薪金重葺。桃花庵地方已沦为农家菜地，于是将地赎还，修墓道，建草亭，树门墙。考虑到桃花坞其

皇清吏部尚書江蘇巡撫宋公犖

惠愛黎元
宏奬髦士
心跡雙清
滄浪之水

名，乃集资购买了数千枝桃树，杂植其旁。这样重大的文化活动，要有重量级的苏州文人来担纲，于是由翰林院检讨尤侗作《重修桃花坞唐解元祠墓记》，由礼部侍郎韩菼撰联，联曰："在昔唐衢常痛哭，只今宋玉与招魂。"这副联看似寻常，但后代联家评价甚高，称韩菼将眼前之景，信手拈来，便成绝对，不愧状元手笔。

经宋荦这番运作，准提庵不但面目一新，"筑其墙垣，间以台榭，春草池塘，桃花兰若，先生居中，可消长夜"（《公祭明解元唐伯虎先生祭文》），而且升格为唐寅祠，成为苏州人瞻仰唐寅的去处。康雍年间的翰林院编修储大文说："今游苏沧浪亭、桃花坞者，未尝不拜唐子畏先生坟。"这里所说的子畏先生坟，就是准提庵唐寅墓。至嘉庆六年（1801），吴县知县唐仲冕以族裔的身份重修唐解元祠。太平军战火，祠遭毁，于同治年间再次重修。这次重修，将宋荦和唐仲冕两人也配享进去了。对于喜欢唐寅的人来说，顺便纪念一下宋荦和唐仲冕，也是合理的，公正的。

晚清民国期间，桃花庵再度沦落。有人寻访桃花坞，留下一段文字："今日准提庵之四周皆锡箔作场，所居尽绍兴工人，所谓桃花坞，亦仅庵后有小桃一株而已。"但庵中仍有奉祀，是为金炯、杨廷枢、唐寅。杨廷枢，本书另有专章介绍。金炯，嘉兴人，洪武中任苏州知府，因为上书请减赋额，触犯上怒，被杀。查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苏州知府三十人，其中被降职、被罢官、被黥面、被杀的，有名有姓，约有三分之一，何以独独祭祀金炯。这个问题不深究了，留待以后去解题吧。

也有记载认为，唐寅故宅与桃花庵并非一处，唐寅故宅在宝华庵，有读书阁、梦墨楼等建筑，均已塌圮。乾隆间僧禅林道心重修，有屋十馀椽，水阁环池，颇极清旷。宝华庵距桃花庵东北数百步。

范君博在《吴门园墅文献》中说："庵与宅本非一处，庵在廖家巷，而宅在庵北。载《明小志》。"

写到这里，唐寅的事说得差不多了。还有两件事，值得说一下。

杨大滐其实多事，准提庵供奉唐寅、祝允明两人就可以了，何必硬生生地将文徵明也拖进来？唐、祝两人是密友，趣味相投。在科举的问题上，祝允明"七试礼部，竟不见录"，终其一生，是个举人，比唐寅的黜革解元，好不了多少。怀才而不遇，唐、祝两人绝对是臭气相投的。因此，这两人对世俗社会是背异的，逆反的，玩世的。但这样的解释未必有说服力，文徵明在科举上也不顺利，但文徵明依然是一个被封建道德所追捧的长者。

《唐伯虎全集·轶事》说："文徵仲素号端方，生平未尝一游狭邪。伯虎与诸狎客纵饮石湖上，先携妓藏舟中，乃邀徵仲同游，徵仲初不觉也。酒半酣，伯虎岸帻高歌，呼妓进酒。徵仲大诧，辞别。伯虎命诸妓固留之，徵仲益大叫，几赴水，遂于湖上买舴艋逸去。"

类似的恶作剧，唐寅经常做，而祝允明常常扮演"帮凶"的角色。唐寅的纵饮颓放，寄情风月，与文徵明的道貌傲然，使这两个人始终走不到一起。文徵明曾数次相劝，唐寅总不听。在文徵明的诗文中，也经常能读到这种带有规劝意思的诗句："曲栏风露夜醒然，彩月西流万树烟。人语渐微孤笛起，玉郎何处拥婵娟？"（《月夜登南楼怀子畏》）对此，唐寅也很感冒。曾对文徵明说，"农种粟，女造布，各致其长"；"牛顺羊逆，愿勿相异"。两人一度反目，几乎失和，十年间甚为疏远。

另一件事，就是春宫画。首先有个大背景。历史学家吴晗说，明朝的正德、嘉靖以前与嘉靖以后是两个显著不同的时代，由于社

会经济的多样化,商业的崛起,商人地位的提升以及官员参与经商,使整个社会秩序和社会礼法受到激烈的冲击。明朝前期,官员是禁止嫖宿的,明中期以后,这个禁令不生效了,狎妓嫖娼,缠头争掷,变成一种时尚和风雅。这种社会情状,我们在《醒世恒言》中也能读到,连卖油郎也到妓院里走一遭。与此对应,春宫画大举入侵,苏州是明代春宫画的创作基地,并且主要集中在桃花坞和山塘街。

"吴门四家"中的唐寅和仇英,在春宫画上似乎是高手,以至成为后来大量春宫画的伪托对象。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秘戏图考》里断言:"近年来出现在中国市场的几乎所有春宫画卷,都有以善画人物而闻名的两个明代画家中的一个的落款,他们是仇英和唐寅。然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中,这些绘画都制作得很粗糙,以至于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它们是十八或十九世纪的赝品。除此而外,明代春宫画卷真迹几乎没有画家的落款。"

接着,高罗佩更武断地说:"唐寅在苏州的西北部选了一块叫做'桃花坞'的有名的历史遗址作为他的居所。在后来的若干年中,这个场所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书画雕匠的中心。虽然此地本身的真正名声产生于雍正和乾隆时期,但很有可能,在明朝末期,一些雕匠就已经在这里定居。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假定,大概在那些作坊中流传着唐寅的春宫画'草图',这些'草图'在1600年被春宫木刻画册的编者所利用。"

高罗佩觉得,明代的春宫画为什么制作粗糙,与这些草图被不断复制有关系。高氏此话说得还是有点道理的,举桃花坞木刻为例,每一版都有印数规定,超过了这个印数,原作的神韵全无。印数越前的,质量越好,收藏价值越高。

以唐寅的性格和行事作风,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他就是春宫

画的始作俑者。譬如,唐寅曾用非常娇情的语言来讴歌女人的小脚:“第一娇娃,金莲最佳,看风尖一对堪夸,新荷脱瓣月生芽,尖瘦纤柔满面花。觉别后,不见它,双凫何日再交加?腰边搂,肩上架,背儿擎住手儿拿。”唐寅的这一首,诗不像诗,词不像词,有点像道情,有点像小曲的文字,真正写的还不仅是女人的小脚,仔细读读就知道了。

但唐寅依然是极为大胆的,敢写女人的脚,绝对是狂而又狂的超级狂士。明代女人的脚,与女性的其他隐蔽部位相比,其私密姓更为严密,是绝不能让人窥见的。一旦窥见,是奇耻大辱。反过来说,连脚也看到了,其他地方还有什么不可以看的呢。中国古人的这种文化心态,至今还找不到合理的解释。高罗佩是研究中国性文化的专家,在他收集的所有的春宫画中,还没有看到有一幅画上的女子是裸足的。

一般认为,明代苏州是最有资格做春宫画的。苏州不但经济繁荣,而且社会风气奢靡,苏州还有为数众多的绘画从业人员,做假画也是全国一流。风传沈周就曾操此业,至正德、嘉靖年间,这一行更为兴盛,形成一个产业群。有专人伪造宋元明人书画,尤以苏州所造绢本青绿重彩山水为多,或署赵千里,或署仇十洲,这些苏州伪作在古董圈内称为“苏州片”。“苏州片”就产于山塘街、桃花坞、专诸巷、北寺前一带,由专门出售名人字画的画铺销售。钱泳在《履园丛话》里说,专诸巷有钦姓父子兄弟,俱善作伪画,世谓之钦家款。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散见全国各地收藏的《清明上河图》有三十卷,除了一张真迹外,其馀均出自苏州人之手。笔者看到过乾隆间的高仿《清明上河图》,以其色彩艳丽而显得富贵雍华,它的观赏性甚至超过原作。

而唐寅、仇英为此行祖师。

与唐寅的高调相比，仇英一直比较低调，吴中诗酒文会，看不到他的身影。他是太仓人，字实夫，号十洲，出身寒门，从小失学。少年时期可能在江西饶州做过陶瓷绘画工，后来改做漆画，在雕梁画栋上施展手脚，擅长人物楼阁。他的人物功底，后来转而写仕女，写春宫；他的楼阁功底，后来转而写青绿山水，都获得巨大成功。他向宋人学习绘画，临摹仕女、鸟兽、台观、旌辇、车仗、城郭、桥梁，他的临摹作品常常在用色和布局上作一些提升和调整，基于原作而高于原作，因而大受称颂。苏州的临摹古画这一行，说起来属于做假一类，非但没有授人诟病，反而能在绘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与仇英这个领军人物大有关系。从历史角度看，由于"苏州片"的存在，使一些已经失传的历史画作存留了下来，成为研究古代社会生活和审美情趣的重要资料。

唐寅虽然是知名画家，其实收入很有限，经常揭不开锅。唐寅卖画的润格是多少？说不准，但手边有沈周的润格，一幅六尺中堂，值银五两。五两银子不算小数目了。这里姑且不说这个画价打不打折，据成化年间叶盛提供的价格："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水东日记》卷一》）叶盛是昆山人，他的记述比较符合这一带的实际情况。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这是翰林名人的价格，一件作品，一两银子，大致是这个水平。

明朝的许多职业，月工资就是一两银子上下。譬如军士，一天三分银子，十天三钱，三十天九钱，一两还不到。明朝的米价其实很低，嘉靖年间，白米五钱一石。一石按常规算，是一百五十斤。但明朝一石为一百八十八市斤。接着算钱。按明朝正常的兑换率，一两

银子兑一千文。但正德、嘉靖年间的兑换率为一两银子兑七八百文。按八百文算，五钱即四百文。这两个数字一除，每斤米价为二文多一点，相当便宜了。沈周的五两银子可买十石白米一千八百八十斤，按现行米价，二元一斤，折合人民币三千七百六十元，仅是一笔小收入。如果唐寅的润格与沈周一样，如果唐寅每月也能画一幅六尺中堂，如果每月能卖一幅出去，他也就是这个收入。唐寅家有八口人，平均分摊，每人四百七十元，相当紧了。据他在正德十三年(1518)写的《阴雨浃旬，厨烟不继，涤砚吮笔，萧条若僧，因题绝句八首奉寄孙思和》，他的晚年相当凄苦，如"十朝风雨苦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肯嫌斗粟囊钱少，也济先生一日穷"，"抱膝腾腾一卷书，衣无重褚食无鱼"，"天然兴趣难摹写，三日无烟不觉饥"，"荒村风雨杂鸣鸡，燎釜朝厨愧老妻"，"问字昔人皆载酒，写诗亦望买鱼来"。

当然，唐寅是艺术家，收入无法与官员相较，但与小民比比，绝对算是白领了。据文徵明《重修织染局记》记载，织造局的外发工，每月有四斗米的补贴，为六十斤白米。月工资多少呢？文氏没说，他也说不出，因为是计件工资。经查，最高的约为一两四钱。织造局是当时的国企，钱米相加，应该算是高的了。西门庆当铺里的高级经理，月薪才二两银子，这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工资水平。

唐寅一生以画著名，其实他的诗也相当不错，他进学的专业就是治诗。譬如他的《姑苏杂咏四首 · 长洲苑》，我就很喜欢。诗曰："长洲茂苑占通津，风土清嘉百姓驯。小巷十家三酒店，豪门五日一尝新。市河到处堪摇橹，街巷通宵不绝人。四百万粮充岁办，供输何处似吴民？"这样细腻的苏州风情，不是苏州人是绝对写不出的。尾联说，苏州每年向朝廷上贡税粮达四百万石，这样高的田赋，还有那个地方能像苏州这样高呢。又呼应了首联的"百姓驯"。苏州人

就是这样艰难而又快乐地活着。

他的《一世歌》写得很风趣，又很有哲理，谨照录，作为本文的结束：

“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阴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需满把金樽倒。世人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春夏秋冬捻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杨成　杨大滐　杨廷枢　杨无咎　杨绳武　杨庆孙　杨一鸿

附记：杨时　潘季驯　魏校　王敬臣　周顺昌　吴昜

杨成此人，虽然官至万历间南京兵部尚书，正部级干部，但身后名声却并不显彰，《明史》没有传，只有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中简略地提到他，使我们知道，杨成在万历八年(1580)曾担任南京工部尚书，十一年(1583)转南京礼部尚书，十六年(1587)转南京吏部尚书，十七年(1589)转南京兵部尚书。就这样简单的履历，在《弇山堂别集》里也是分散记录的。

明朝的南京六部尚书，地位虽隆重，但毫无实权，但其中有个例外，南京兵部尚书是有实权的。除了有"操练军马，抚恤人民，禁戢盗贼，振举庶务"之职外，还有"参赞机务"的隆重地位，因为大明朝的南方防务，要南京兵部尚书拿主意，责任不小。这个权限，是宣德帝定下的。也因为这个原因，南京兵部尚书无形中成了南京陪都六部九卿的领袖人物。

杨成虽贵为南京兵部尚书，但整个万历朝，在这个位置上都做不长。据《弇山堂别集》卷五十记载，从万历二年(1574)至万历

十七年(1589)的十六年间,担任这一职务的官员达十四名,大致一人轮做一年。这个现象是万历年间独有的。杨成是万历十七年的南京兵部尚书,他做了多久?一年?二年?万历十八年(1590)谁是南京兵部尚书?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没有写下去,因为王世贞那年去世了。他比杨成小了五岁,又比杨成早逝了十年。

杨成总是做南京的官,也没什么政绩,属于清闲人物。修《明史》的看你没什么好写,当然也收不进列传,这怪不得史家。就像笔者现在写杨成的小传,觉得颇为吃力。

到了清顺治年间,同为苏州人的汪琬对杨成也不甚了解,他在《跋汉书扬雄传》中提到杨成,但也只知道些大概,表示要"俟再考云"。到雍正年间编写《江南通志》,有关杨成的文字多一点了,有一百来字,但依然简略,看不真切。杨成不是一个没能耐的人,他的身后寂寞,与一个重要的权势人物有关系,个中道理,下面慢慢揭开。

先说说杨成的先祖,此人不得不说,因为实在有名。

杨成祖籍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先祖是北宋著名理学家杨时,字中立,号龟山,卒谥文靖。胡瑗撰《杨文靖公墓志铭》说,福建杨氏出于弘农望族,与隋文帝杨坚、越国公杨素是同姓同乡。唐末战乱,避地闽中,因家焉。弘农郡居河南、陕西交界,地处商洛间黄河南岸,历来是军事要地。商洛子弟能征善战,天下闻名,韩世忠、李自成都是这个地区的人物,不想还出了个大学者。

杨时于熙宁九年(1076)中进士,年仅二十三岁,少年得志,授官汀州司户参军,他没有接受这个职务,却跑到河南,先后拜程颢、程颐为师,成为程门四先生之一。"程门立雪"的故事,说的就是他。

杨时修学，隐居在湖北龟山，杜门不仕者十年。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而来，向他讨教，称他为龟山先生。连朝鲜国王也听说他的名声，向北宋使臣打听“龟山安在”?

杨时曾担任浏阳、馀杭、萧山三县的县令，累迁至国子祭酒。宋高宗南渡后，担任工部侍郎兼侍读，以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因此长年生活在杭州。杨时的子孙于明朝初年移居苏州娄门外官渎里一个叫娄庄的地方。官渎里，这个地名至今尚在，是苏沪铁路上的一个四等小站。

《宋史纪事本末》曾记载一个小故事，说杨时老家南剑州有一个叫罗从彦的，在博罗县当主簿，听说杨时专攻程氏之学，非常有成就，十分羡慕，就赶到萧山去请教。其结果是“见时三日，即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后来，这位罗从彦也成了程学大家，为“南剑三先生”之一。

惜字如金的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铭文”，在公元1135年下，记录了三位国家级人物的去世。金太宗卒，仅用四个字。宋徽宗卒，用十个字。杨时卒，用了十三个字，还专门提到，有《龟山集》等传世。强调了他的学术著作和成果。这是历代帝王所不及的。

晚明著名的东林书院，就是杨时于政和元年（1111）创建的。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高攀龙移址无锡城南，重修东林书院，以主持清议为己任。天启五年（1626）十二月，魏忠贤矫诏颁示天下，取缔东林书院，禁锢东林诸君子，生者削籍，死者追夺。高攀龙于是另建道南祠，祭祀杨时。“道南”两字也有出处，当年程颢送别杨时，曾说了一句话：“吾道南矣。”

苏州也有一所道南书院，在虎丘二山门，又称“三杨祠”，祭祀杨时、杨成和杨廷枢，是杨家的家祠。

说完杨时，该说杨成了。上文说到，乾隆前，关于杨成的记载很少，但修于乾隆年间的《元和县志》上却有杨成的大段文字，约有五百字。于是我们知道，杨成，字汝大，一字震崖。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十五岁时，中二甲二十五名进士，授工部营缮司主事，迁都水司郎中。在《元和县志》里，杨成似乎是极其完美的。譬如，杨成在掌管卢沟桥及三大殿修理工程中，对工程造价控制得很好，裁减冗费数十万两，为此还得罪了内臣，被指为"此强项郎也"。三大殿工程完成后，杨成被提拔为浙江副使。这个副使，应该是按察副使。杨成在浙江"平反冤狱，人称神明"，也是一片褒奖声。嘉靖帝去世后，隆庆帝继位，杨成被发表为四川参政，相当于副省长。

杨成在四川的政绩，也是可圈可点。驻地成都的蜀端王很傲慢，监司等官员要见他，规矩很重，其恭敬程度，远远超越了地方官员参见藩王的礼节。杨成不干，据礼力争，端王也无可奈何。杨成还将端王侵占的山林陂泽，全部发还老百姓。这位宝贝端王，是朱元璋第十一个儿子朱椿的第十一代子孙，叫朱宣圻。嘉靖四十年（1561）袭封，万历四十年（1612）去世，在位五十一年，在诸藩王中算是长寿的了，也许辈份比隆庆皇上还高，他摆摆老资格，也是可以想见的。

藩王僭越，是中央政府的大忌，杨成揪住蜀端王的这条小辫子，才能顺便将端王侵占的田地发还民家。所以，杨成在处理这件事上，显得很聪明。也许就因为这些微功，杨成被提拔为广西布政使。明朝的布政使是一省之长，这一点，与清朝不一样。清朝的布政使仅仅管理钱粮，是巡抚的帮手，称为藩台。

新任广西布政使要进京觐见，接受皇帝的召见和训话。按老规矩，地方官员要从小金库中提一笔钱为杨成治装。杨成说："金也，焉用故事。"他不肯这样做，这就很不容易。杨成不仅拒绝了一笔钱，


明兵部尚書謚莊簡楊公成
捍潦奏績
禱雨應時
濟危救困
念切民依

还拒绝了一个潜规则。对于后者,其实更难。

万历元年(1573),杨成召为应天府尹,相当于南京市长。明朝实行两京制,这是朱元璋立下的规矩制度。洪武三年(1370)八月,朱元璋下诏:“以金陵、大梁为南、北京,于春秋往来,巡狩驻守。播告天下,使知朕意。至于立宗社,建宫室,定朝市,南京既创置矣,北京其令有司次第举行。”(吕毖《明朝小史》)南京本是首都,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南京成为陪都,其地位与北京是一样的。在南京做官,其品秩与北京也是一样的。杨成做了两年南京市长,万历二年(1574)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

杨成在江西的作为,受到史家的称赞。那么,杨成做了些什么呢?据《苏州府志》记载,大致有这么三件事。第一件,江西大旱,饬有司发粟赈民,解决吃饭问题。第二件,针对湓城、昭武一线的低洼地区,筑堤堰,蓄泄兼用,并打通支港以杀水势,水患遂除。第三件,剿除江楚巨盗李大鸾,平定积盗叶隆盛,散其党千人。对此,《桃坞百咏》的作者凌泗也说:“庄简政绩,以抚江西为最。”庄简,是杨成的谥号。

但笔者认为《苏州府志》的记载有问题。第一、第二件赈灾和兴建水利等事,姑且不论。最令人怀疑的是第三件。杨成是万历二年(1574)岁末上任江西巡抚的,仅仅过了一年多一点,到万历四年(1576)三月二十二日,就有圣旨下,任命潘季驯接任江西巡抚。此时,潘季驯正在河道总督任上,为了鼓励他就任,朝廷许以原职位不动。这种种现象说明什么?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朝廷对杨成剿除李大鸾为首的农民造反不满意,急于换人。

李大鸾等人造反,人数并不多,最兴旺时也只有百十号人。起先只是干些打家劫舍的营生,得些金银罗段布匹衣物之类。后来搞

大了，抢金银，还抢女人，杀人放火也经常发生，遭殃的首先是官宦人家，男人在外做官，家里女人却被抢了，成了压寨夫人，舆论哗然，社会危害极大。李大鸾渐成气候，演变成政治武装，“李大鸾僭称都督，竖起黄旗，书写姓号，头戴金顶大帽，身穿红缎，倚摺坐镇寨中，出入骑马。调度众贼，分投地方劫掠财宝，回寨交纳，俱听大鸾分赏”（潘季驯《潘司空奏疏》卷七）。

潘季驯是万历四年（1576）七月初六日到任的。到任后，他看到了什么？据《飞报宁州贼情疏》，他向朝廷报告说：“看得前贼不劫财，不虏人，与往日寇盗不同。……且声言报冤。”李大鸾有什么冤屈要报？原来杨成在宁州围剿中，李大鸾、杨凤鸾逃逸，而擒获了李大鸾的母亲艾氏、妻子萧氏及父亲李显芬，拘押在南昌府。李显芬瘐死，艾氏、萧氏被官卖为奴。李大鸾等见在江西难以安身，遁往湖南。

杨成没能在江西堵住、剿除李大鸾，反而连累了湖南，引起朝廷的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杨成调出江西。但杨成在剿除李大鸾中，也不是一点事没做。早在万历二年十二月他到江西不久，就指令分巡南昌兵备道移文湖广的上江防道，实行两省合剿战略。他的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因此，朝廷将杨成调出江西，也没有为难他，回北京，任工部侍郎。

万历五年（1577）十月，李大鸾被捕获，主其事者是潘季驯，与杨成无关。《苏州府志》称“巨盗杨凤鸾、李大鸾等蔓起，延江楚。成会楚抚夹剿，擒其魁”，显然是溢美了。

潘季驯对付李大鸾，明显比杨成高明。他没有把明军与农民对立起来，反而公布政策。凡是与李大鸾等首要分子脱离关系，洗手不干的，一律不追究。对追捕失职的州县巡捕、把总等官，黜革降

调。然后组织明军与土军联防,守住关隘卡口,以逸待劳,终于收到效果。李大鸾无处藏身,装扮成看风水的算命先生,在一个叫安乡黄坳店的地方买酒吃饭时,被当地里正、保长认出,于是被擒。

潘季驯是一代名臣,既是军事谋略家,又是张居正时代治黄水利专家。这位浙江湖州人很厉害,当张居正去世后,家属遭受迫害,长子张敬修被迫自尽时,只有潘季驯抗争的上疏最为激楚,是一条真汉子。杨成与他比较,确实差了一截。

李大鸾死了,他的老搭档杨凤鸾比他死得更早,于万历三年(1575)十一月在庐源洞被杨成擒获遇害。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笔者怀疑他们本是夫妻。只是官方记录将他们视为"流贼",杨凤鸾是男是女?他们是不是夫妻?没人在意。

上文说到,杨成的身后寂寞,与一个重要的权势人物有关系。这个人就是张居正,他是湖广江陵人,人称张江陵,万历元年(1573)至十年(1582)的内阁首辅,一代名相。海瑞评论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国榷》卷七十一),可谓一语中的。张居正处理军国大事,眼光独到,手段泼辣,但处理小枝小节的事,却不免小肚鸡肠。他与上饶的县令陈适有过隙,很想给他双小鞋穿穿。正好上饶的王府被盗了一颗印,张居正想借机惩治陈适,就把这事交给江西巡抚杨成处置。不想杨成回复得很干脆,说:"杀一条人命,以取媚一个人,这种事情我不干。"

在政治上,杨成显然与张居正不是一路人。所以,杨成会做出"屡失江陵意"的事来。但《元和县志》举的这个例子也有很大的漏洞。张居正并没有借杨成之刀,杀陈适之头的意思,只是"欲坐适罪",想给陈适一点苦头。王府里丢了一颗印,充其量是桩治安事件,

会闹出杀头的事来吗？一点可能性都没有。所以，杨成的回答看似理直气壮，却是不着边际，大有作秀的嫌疑。我怀疑这话是张居正死后，杨成的吹牛。张居正在世，谁敢说个“不”字呢？

看来杨成只能离开江西了，张居正主政的中央政府不会容忍一个经常唱反调的杨成坐镇江西。杨成被安置回工部当侍郎，回工部是顺理顺章的事，他早先就是从工部出来的，当过工部主事、郎中，声誉还不错。再说工部侍郎与江西巡抚的级别是一样的，正三品，属于平调，大家都心安理得。杨成在北京的工部衙门大概呆了将近四年，于万历八年（1580）调南京，升任南京工部尚书，正二品。虽然升了官，却是退居二线。

杨成觉得仕途无望，于是申请退休，悠然林下。不想万历十年（1582），瓦爿翻身，五十七岁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突然身亡。万历帝本不喜欢他，于是弹劾者纷起，次年追夺官爵，又次年抄家，籍没家产，上演了一场政治迫害的闹剧，并重新起用在张居正年代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官员。杨成本已闲居在家，于万历十一年（1583）受命担任南京礼部尚书，十六年（1588）转南京吏部尚书，十七年（1589）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成为南京陪都政府机构的领袖。

杨成此人官运很好，于此可见一斑。他的好运还在后面，晚年时，他领衔弹劾张鲸，得到江南士大夫的一片赞扬声，完美收官。

张鲸是谁？先要交代一下。

上文说到，杨成于万历十一年（1583）再度出山担任南京礼部尚书时，张鲸也刚刚升迁为总督东厂太监，这个职务的全称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正因为是钦差性质，所以直接受命皇上。它处理的刑狱之事，被称为诏狱，权力很大。东厂在太监系统中的权势仅次于司礼监，司礼监为宦官总管，领导和调遣所有监局

的全部宦官，东厂当然也在司礼监的管辖中。但总督东厂太监有一个特权，他向皇帝报告案情时，贵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也得回避，可见这个位置的重要。

万历十六年（1588）冬，御史何出光弹劾张鲸八项死罪，牵涉两名党羽，一名是锦衣卫提督办事官校左都督刘守有，他是锦衣卫的一把手，刚刚赏了太子太保的头衔，也是万历帝眼中的红人。另一名是鸿胪寺序班邢尚智，鸿胪寺序班是个小角色，仅从九品，为礼仪指导员。但官场上的小人物也可能是大坏蛋。据何出光的揭发，张鲸、刘守有、邢尚智一伙在查抄前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等一干人的家产时，搬运鼠窃，监守自盗，被他们侵吞的金银、睛绿珠宝、帽顶、玉带、新旧钱币、各色蟒衣、纻丝绸绢等，多得无法计算。据御史们估算，真正进国库的，仅为冯保资产的十之一二，其馀都入了他们的囊中。这个数字可能有点夸张，但数量也决不少。万历帝看到这份奏折，十分恼火。万历虽广有天下，也珍爱钱财。冯保手上的这点东西，他还真要。当年查抄张居正、冯保的时候，正值小他五岁的同胞弟弟潞王结婚，他曾经为筹措够得上皇家级别的珠宝而犯愁。对此，万历帝没有犹豫，将刘守有革职，邢尚智监候处决，李登云、张继德烟瘴地面永远充军。独独对张鲸的处置为“策励供事”，译成现代汉语，是“督促勉励，继续做事”。于是舆论哗然，引发了给事中和御史们的一片抗议声，但万历帝有一绝招，留中不发，将这些奏折留在大内，不置可否，臣子们也就无可奈何。据说，这一招还是苏州人申时行教他的。

于是新任吏科给事中李沂上疏，以坊间传闻，指责万历帝受贿。文章写得慷慨激扬：“擢鲸之发，不足数其罪。食鲸之肉，不足报其冤。故京师为之语曰：‘宁逢虎狼，莫逢鲸张。’”万历帝大为震怒，

将李沂下诏狱，以“谤诬君父”为罪名，廷杖六十，斥为民。御批发至内阁，申時行等想将御批留下，中使不可，万历帝特遣司礼监张诚将犯人带出受刑。万历帝的御批写得很通俗：“这厮每欲与张居正、冯保报复，私意不遂，故丑污君父，好生无礼。着拏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了来说，不许纵情卖法。”李沂的遭遇，再次引发臣僚的一片抗疏。这次抗疏就不仅仅是给事中和御史等言官了，而是波及整个官僚层，从北京到南京。北京的就不说了，就说说南方官僚，因为杨成在这个圈子中，看看他有何作为。

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现任刑部尚书李世达表态了，《明史 · 李世达传》说“世达执奏，帝乃屏鲸于外”，好像驱逐张鲸，都是他的功劳。

曾任南京刑部尚书、现任南京吏部尚书的陆光祖也有态度，《明史 · 陆光祖传》说他“率同官劾东厂太监张鲸，且乞宥李沂”。

现任南京兵部尚书吴文华态度也很鲜明，《明史 · 张鲸传》称“南京兵部尚书吴文华率南九卿，请罪鲸而宥言者”。他的奏折写了什么？《明史》没有详载，雍正《福建通志》却收有这份一份上奏，起题写道：“南京兵部等衙门尚书等官吴文华等谨奏”，连写了三个“等”，表明不是个人行为，是集团告状。上奏说：“今以一张鲸而骫三尺之公法，以一张鲸而屈盈庭之公论，窃为皇上惜之。”词语虽然温和，但分量不轻。因为南京兵部尚书为南方的政坛领袖，吴文华代表了江南官僚的政治态度。

还有一位，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杨成。杨成是万历十七年（1589）的南京兵部尚书，与吴文华前后任。杨成在这次政治风波中有何作为？《元和县志》有如下记录：“成率南九卿，三具疏，请御朝讲，请法祖，请建储，请斥罪奄，声震天下。疏入，鲸立赐斥罢。”杨成的三

具疏，应该有三篇上疏，笔者没有找到原文，只是在王世贞的《弇州四部稿》里发现《会劾司礼监张鲸疏》和《披诚献言仰裨圣德圣政疏》，后一篇小注称“系南九卿会上具草”。这篇上疏就是由王世贞操刀，代表着杨成等南九卿的政治态度。

但不管怎么说，在处置张鲸的问题上，整个文官集团获得了空前的一致，包括苏州籍的几位当朝大官，如申时行、杨成、王世贞，还有一位，而且在这次抗议声浪中，声音非常鲜亮，他叫王锡爵，太仓人，人称王阁老。他在申时行的内阁中处于次辅的地位，相当于副相，身份是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他的行事作风与申时行也不一样，申较为柔和，而王的性格刚强负气。王锡爵对李沂被打入诏狱，廷杖六十，公开表示不满。在封建社会，对皇帝表示不满，是需要勇气的，他说：“廷杖非正刑，祖宗虽间一行之，亦未有诏狱、廷杖并加于一人者。故事：惟盗贼大逆，则有打问之旨。今岂可加之言官？”而且，他觉得“以言不见用，引罪乞归”。作为主持朝政的次辅，他觉得很有责任，他还是回家吧。王锡爵的这番言论，受到《明史》的喝彩，“为世所称”。作为一位高官，敢说真话，不容易啊。

而吏科给事中李沂，在这场政治风波中遭受的打击最为惨重，被诏狱，被廷杖，当年十二月案子结了，被斥为民，家居十八年，未召而卒。李沂是湖北嘉鱼县人，字景鲁。他没有海瑞运气好，海瑞骂皇帝，一骂成名，而他终身没有平反。从上任到罢官回家，李沂当这吏科给事中仅一个月。

杨成后来进了沧浪亭的五百名贤祠，说明家乡人对他是认可的。赞词曰：“捍潦奏绩，祷雨应时；济危救困，念切民依。”前两句歌颂他在江西为官，后两句称赞他反罪阉张鲸。凡是反对太监的，苏州人都欢迎。

杨成此人，沉默寡言，一旦说及军国大事，侃侃不阿。年七十申请退休，打了七次报告，才得以批准。明朝人打退休报告，起码打四五次以上，是很正常的，以表达朝廷挽留的意思。如果一打报告，立即批准，其中滋味，当不好受。另外，万历十八年（1590）后，皇上身体就很差，又肥胖，路也走不动，宫里特别为他设计了一种小车，似乎就是轮椅的滥觞。按这样的身体条件，处理军国大事都颇感吃力，审批一份退休报告拖了又拖，就很正常的了。

但杨成晚年依然是很风光的，有四桩事可以说明这一点。第一，退休了，加太子少保衔，名义上，是小皇帝的师傅，颜面上很风光，而且衔牌上又多了一块。第二，退休回家，赐乘传归，就是万历帝恩准可以免费享受公家驿站提供的车马船、住宿、饮食等。第三，杨成死后，得到论祭葬的待遇，就是公家提供一笔丧葬费用，按杨成的级别，大约有四百两银子。第四，谥庄简，崇祀江西名宦及郡乡贤，这也是封建士大夫极看重的。立功、立德、立言，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一生的追求，杨成都有了。

他惟一遗憾，当是《明史》无传，但他有五峰园，于是在默默无闻四百年后的今天，又突然风光起来，于是笔者乱翻古书，凑成上述文字，不嫌疏陋，就教于方家。

接着要写到杨大溁、杨廷枢父子了。杨大溁这人本可以不写，因为他仅是诸生，生活平淡，没有什么波澜，也写不出什么。但此人上有兵部尚书杨成为父，下有复社领袖杨廷枢为儿，不将杨大溁交代明白，下面的文章就不好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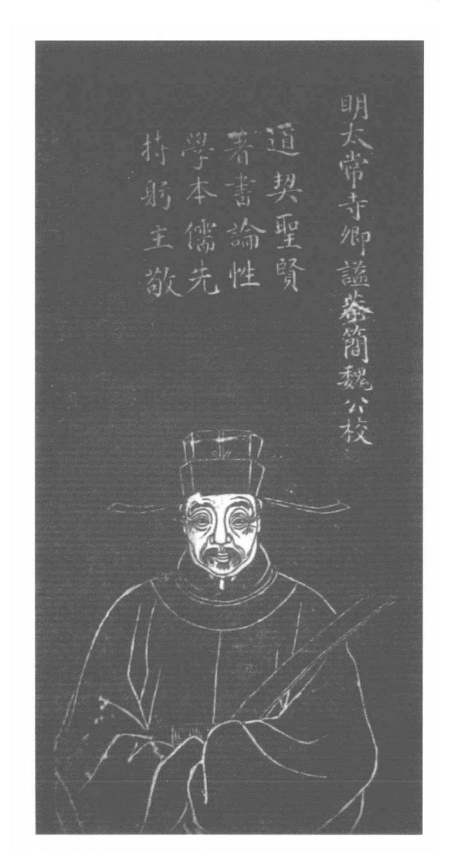
杨成有四个儿子，杨大溁是第几子？生卒年月？均于史无证，但他是万历年间的人，是确定无疑的。据《元和县志》记载，杨大溁

在科举上并不得意，仅为一名县学生，即秀才。大概就因为这个缘故，杨大溁很谦恭，居然养成了走路很慢，还低头看路的习惯，不熟悉他的人以为他脊梁伛偻，是个驼背，而且他经常布衣缊袍，谁也看不出他是位贵公子。

杨大溁的处事低调，还与他的个人修养有关。他崇拜理学大师王敬臣。王敬臣学说的核心是慎独，解释开来是三句话："求诸己而不求诸人，尚行而不尚言，务实而不务虚。"如果做不到这三条，即便身为儒生，也是孔子所批评的所谓小人儒。反之，才是君子儒。这三句话说得很通俗，现代人也一看就明白。特别是第一句，含义很深刻，切中时弊。我们常常说，求人不如求己，大概就是由此演绎而来的。

影响杨大溁更大的背景是，嘉靖、万历间苏州出现了一批涵盖哲学、地理等新兴学科的学术大家，令人刮目相看。王敬臣名气很大，东南一带称为其弟子的，就有四百多人。他是魏校的弟子，魏校也是苏州人，居住在葑门庄渠，人称魏庄渠，名气更大，学术领域也更宽泛。譬如，魏校对国家地理就很有研究，他说："大地之脉，咸祖昆仑。而南北二络最大大河出昆仑东北墟，屈而东南至积石，始入中国，此天下大界水也。"这种文字，显示出晚明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气势、大视野。梁启超说："我最爱晚明学者虎虎有生气。他们里头很有些人，用极勇锐的努力，想做大规模的创造。即以对于明史一事而论，我觉得他们的气魄，比现代所谓学者们高得多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斯言当是。

魏校是嘉靖中期的国子监祭酒，他这种透彻的地理知识显然与科举无关，但影响极大。王敬臣作为他的弟子，传承了他的衣钵而成为万历年间的大学问家。王敬臣住在吴县兵马司桥东的一条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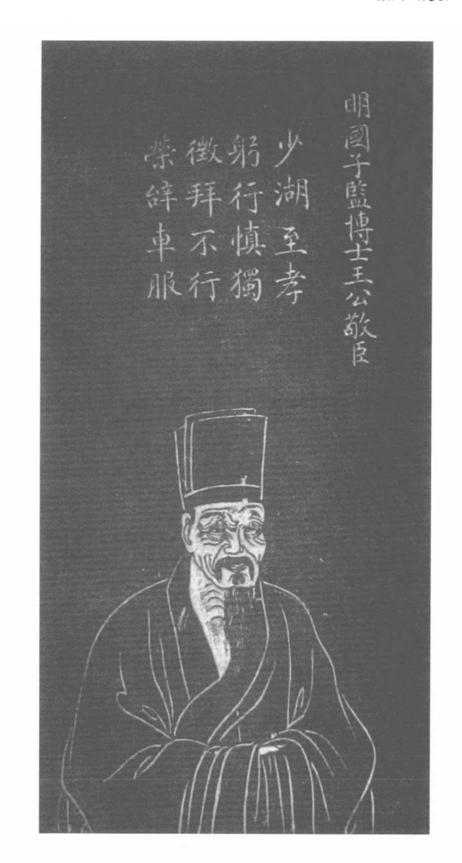

明太常寺卿謚恭簡魏公校
道契聖賢
著書論性
學本儒先
持躬主敬

名小巷里。因为他住在这里，大儒巷由此得名。他的祠堂，在护龙街大关庙侧。魏校的两个女婿也非常杰出，一位是晚明著名学者、文学家归有光，人称震川先生，昆山人；另一位是杰出的军事历史学家郑若曾，也是昆山人，著有《江南经略》、《筹海图编》等著作，在抗倭斗争和重建海防方面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两位女婿，同时也是魏校的得意门生。

王敬臣与杨大潆一样，科场也极不得意，他是岁贡生，在秀才的这个级别中，算是待遇最好的，每年有些许膏火钱，可以补贴家用，虽然不多，也聊胜于无。但王敬臣终于因为名声大，于万历十四年（1586）被南京礼部尚书袁洪愈推荐授予国子监博士，相当于国立大学的教授，谁知王敬臣这老头还推辞不干。朝廷于是下诏，以所授官致仕。这样的处置方法，还是很得体的。巡按御史甘士价看出其中有点不对劲，也觉得朝廷给的官太小。于是再次上疏，建议朝廷给他翰林之职。甘士价的上疏说得有点气急败坏。他说，我们怎么能看着王敬臣这样的真儒困于流庶，像草木一样腐烂呢？他还说，天下像王敬臣这样的真儒，也许不止他一个，但荐举了他，朝中大臣就知道应该荐举什么人了。这对于加强圣治，好处岂是浅浅？

这位巡按御史的见解很高明，他提出了如何对待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性问题。明廷内阁以万历帝的名义批准了甘士价的上疏，诏请有关部门对王敬臣“时加优礼”，直至他八十五岁去世。

杨大潆还会去考什么科举吗？还会去博取功名吗？不会了。王敬臣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榜样，而且太老师魏校说了，“必不以一第为荣。盖不荣进取，即忘名位。忘名位，即忘世界。能忘世界，始是千古真正英雄，始作得千古真正事业”（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八）。这话从国家最高学府校长魏校嘴中说出来的，非同一般。


明國子監博士王公敬臣
少湖至孝
躬行慎獨
徵拜不行
榮辭車服

杨大溁死后，吴人私谥端孝先生，“端孝”两字，大概可以概括其一生。他家庭之小孝做得好，其社会之大孝做得更是惊天地、泣鬼神。下面慢慢写来。

先说家事。综合《江南通志》和《元和县志》上的记载。人们称赞杨大溁为孝子，大致有三点。第一点，是说他事亲诚孝，父母去世时，哀毁骨立；生母去世时，哭得像孩子一样。这个还算不上什么。第二点，杨大溁这人不贪财。兄弟四人析产，独取其薄，拿最差的一份，故几个弟弟“事伯兄如父”。第三点，老二和老四去世得早，杨大溁把几个侄女抚养长大，嫁出去。杨大溁孝子、孝悌、孝友都做得很好，于是赢得乡邦的夸奖。

再说大孝。

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大明王朝，多灾多难。全国各地水、旱、蝗灾频繁，饥荒瘟疫严重。先是北方地区，去冬无雪，人春以后久旱不雨。至六月，京畿各府发生饥荒，河南、山东等处一片蝗灾。南方地区，三月，江西大水，到七月，又大旱。临近的湖广又是大水成灾，福建泉州洪水过后发生瘟疫。是年，灾情波及南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江西、湖广、福建、广东等省。

在大灾面前，地方官员向朝廷请求的赈灾报告都石沉大海。相反，朝廷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辽东军饷不足，每亩加赋银三厘五毫。万历四十七年(1619)，每亩再加辽饷银三厘五毫。万历四十八年(1620)，每亩再加辽饷银二厘。连续三年，连续三次，累计每亩加银九厘，全国共增收辽饷银五百二十万两，成为岁额。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了。乾隆帝读《明史》，也不无感慨地说，明之亡，本亡于神宗。

大明朝的农本经济十分脆弱。受灾当年，南直隶的淮北、镇江、

苏州、松江等传统产粮区就发生饥荒。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情况更甚。一直延续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都没有缓解的迹象。当年七月,万历帝死了,扔下一个烂摊子。八月二十三日,时任南京国子监博士的杨嗣昌向新皇帝报告说,臣在南京,就听说淮北居民已吃尽了草根树皮,为了抢几根豆箕菱秆,女人们甚至拚命。此番渡江后,看到灶户在抢食稻,饥民在抢漕粮,所在纷纭。一入镇江,斗米百钱,渐至苏、松,增长至百三四十而犹未已。商船盼不到关米,店铺几于罢市。这个杨嗣昌不是寻常人等,值得交代一下,十六年后的崇祯九年(1636),他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管理兵部,参机务,全力以赴对付农民军。

苏州在这次大饥荒中究竟死了多少人?《江南通志》说"民死无算",《元和县志》说"死亡相枕藉"。这两年中,以杨大溁个人的力量,买地掩骼,收拾的尸骨,将近一万具。在封建社会中,这种善举,绝对是大孝。因此苏州人尊他为端孝先生,恰如其分。

天启六年(1626),杨大溁做了一桩意味深长的事,将万历年间一座叫桃花庵的小庙改建为准提庵。上文说到,杨大溁青年时代从王敬臣游,王敬臣又是魏校的弟子,但这个学派对佛教是排斥的,魏校本人就是一个表现相当激烈的毁佛主义者。魏校曾经捶碎六祖遗钵,还拆了无数寺院。因此,万历年间有个叫徐燉的布衣,在他的《徐氏笔精》中骂他"后嗣乏绝",诅咒他断子绝孙。喜欢拆庙的还不止魏校一人,还有一位叫聂豹的,官做得比魏校还大,贵为兵部尚书,此人也毁寺无数,一查子孙,也是光溜溜的,无嗣,《徐氏笔精》也就特别幸灾乐祸。

魏校和聂豹有没有子孙,笔者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魏校是

明儒中的江左学派，聂豹属江右学派（王守仁为首），但不管是江左江右，明代先进知识分子都在思想观念上表露出“违世背俗，凝然特立”（罗洪先《祭魏庄渠先生文》）的精神。精神不能被奴役，而拆庙就是一种实践。在这种认识层面的感应下，杨大溁怎么会去修一座准提庵呢？

准提，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清净，乃梵文译音。杨大溁晚年为图一清净世界，于是修庵，这完全可理解。另一种解释，为密宗六观音之一，称准提观音，又称准提佛母。准提佛母有三目十八臂，坐像，形象非常美好。佛家称修持此法行者，凡事一切殊胜，无不如意，能降伏一切恶魔。可见此法功德无边。佛家又称每一灌顶修持准提法之人，必增二十一年之寿命，长短悉自知。如是，则杨大溁的健康可能出问题了。他希望奉祀准提观音，以期延年益寿，却没有实现，他只活了五十九岁，勉强算中寿。与本文涉及到的诸位苏州人相比，王世贞六十四岁，归有光六十五岁，王锡爵七十六岁，申时行七十九岁，杨成七十九岁，都比他高，平均寿命七十三岁。

据说，杨大溁去世的时候，衣冠肃然，以手指心而逝。这样的死，大概是佛家的，宁静的，虔诚的，无忧的，等待的，超然的。

《五亩园小志》说，杨大溁将桃花庵改建为准提庵，在疏浚池塘时，得唐寅《桃花庵歌》石刻，祝允明所书庵额，于是就在准提庵中供奉唐、祝两公及文徵明像，供人瞻仰。到了清顺治年间，松江名医沈明生增构长宁池、蓉镜亭、梦墨楼、六如亭。康熙时，江苏巡抚宋荦增葺才子亭。嘉庆五年（1800），吴县知县唐仲冕增葺桃花仙馆、梦墨亭。这位唐知县自认是唐寅的本家，为唐寅做了不少的好事。到同治年间，又有一位叫唐翰题的吴县知县重修了准提庵。唐翰题是浙江嘉兴人，鉴赏家、书画家。

下来要写到杨廷枢了。杨廷枢,字维斗,乃杨大溁之子、杨成之孙。杨廷枢生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死于清顺治四年(1647),明亡清兴这一段天崩地裂的剧变,他正好碰上了。

明朝的万历帝惰于朝政,天启帝更是荒于朝政,天高皇帝远,这些事与我们苏州何干呢?魏忠贤、锦衣卫、镇抚司、东厂、旗尉,这些名字,都在遥远的北京,而历史事实恰恰相反,晚明党争最激烈的一幕却是从苏州拉开的,史家称"苏州民变"。

杨廷枢在中国历史上的首次亮相,是从拯救周顺昌开始的。那么,周顺昌是何许人呢?

《明史》有周顺昌传,其字景文,号蓼洲,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他的第一个职务是福州府推官,相当于副市长,分管治安。周顺昌在福州很有作为,居然抓捕了税监高宷的爪牙,并且不予宽恕。高宷暗中发动民变,劫持了巡抚袁一骥的儿子和佥事吕纯如。有人提议,用周顺昌将吕纯如换出来,周顺昌不答应。从此,吕纯如暗暗见恨周顺昌。

吕纯如也是苏州人,字孟谐,一字益轩,是吴县石湖陈湾人,万历二十一年(1593)进士。周顺昌任福州府推官时,吕纯如为福建按察佥事。说起来,是周顺昌的分管上司。高宷得知周顺昌逮了他的人,到巡抚衙门闹事,吕纯如出来调解,结果被高宷挟持到税监衙门作为人质,并留下话来,须周推官至乃释。但周顺昌不去,巡抚与他说,他也不去。在这样的情况下,吕纯如当然对周顺昌极大的不满。因为在福建官场上,大家都知道税监的人不好对付。福州知府为此还愿意为他说项,取消这项公事,周顺昌也答应了。退而一想,我堂堂一个福州府推官,如果连一个税役也不能搞定,还有什么颜

面呢？于是亲自将这名税役逮到巡抚衙门。

这些细节，《明史》上当然没有，这是文震孟儿子文秉在《先拨志始》中描述的，写得极其生动，摘录如下：

"税监高寀帐下某者，以他事逆抚军，委周公往捕。同官皆难之，太守劳永嘉约与同见辞其事，公诺之矣。既退，自思一衙役不能擒，何颜称司理？遂谢太守，独往执其人以解抚。寀大怒，趣入辕门，与抚大哄。监司吕纯如为和解之。寀执纯如归署，须周推官至乃释。抚以谓公，公不可。寀卒无如何。以是得强项声。"

从逻辑性、生动性、纪实性而言，《先拨志始》写得真好。难怪清末治明史的大家、《明通鉴》作者夏燮称赞此书是记录万历、天启两朝最详备的典籍。

周顺昌在这一事件中，敢于与税监高寀叫板，是条真汉子。但他又不屑得罪福建巡抚袁一骥、监司吕纯如、福州知府劳永嘉等福建高官，有点独来独往，执意孤行。他的这一性格终于酿成晚明苏州的一桩大事变。

高寀此人，仗着钦命钦差，为皇帝收税，也是"理直气壮"。每于市口关隘，上书"圣旨"两字，立马收税，舟车无遗，鸡豚悉算。高寀躬自巡历，所过长吏，望风披靡。太监的坏，其实是皇帝的坏，谁会怕一个裤裆里少一样东西的人？关键是怕皇帝。皇帝的喜怒哀乐，将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举个例子，福建的驿卒出名的骄悍，也是称王称霸的人，但遇到高寀的税役，个个缩了头颈，像死人一样。

再反过来说，高寀此人，也是欺软怕硬。福建澄州令龙国禄，也是位强项吏，不仅不为高寀所屈，还当庭打了高寀手下人的屁股。澄州商人还暗杀了税监的人，往大海里一扔。高寀从此不敢到澄州。举这个例子，为的是说明，在明朝人的意识中，不买太监的账，大有

人在。苏州人津津乐道的文徵明，有三不画的规矩，其中一条，就是不给太监画画。

敢于与太监抗争的，远不止周顺昌一人。但与魏忠贤这样的巨珰叫板，可不是逗着玩的，他手中握着皇命。

天启五年(1625)四月二十四日，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因为弹劾魏忠贤而被逮下诏狱。魏大中是浙江嘉善人，由水路递解经过苏州。正好休假在家的周顺昌出面招待，盘桓舟中，与之同卧起三天，并承诺将季女许配给魏大中的孙子。旗尉屡次催促上路，周顺昌光火了，怒目而瞋："你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归语忠贤，我故吏部郎周顺昌也。"接下来的一个动作，《明史》上说："因戟手呼忠贤名，骂不绝口。""戟手"是什么意思？乃是伸出食指和中指，指点对方，其形如戟，故称"戟手"。人到盛怒时，才会用这样的手势。

史称周顺昌"刚方贞介，嫉恶如仇"。读了上面的文字，觉得这评语是恰当的。但这一情状，也有很多的疑点。

其一，魏大中是钦犯，路过苏州。按照明朝官场的潜规矩，周顺昌仅以吏部郎官的身份，要请魏大中吃顿饭，以尽地主之谊，恐怕难以羁留，尚需再花点银子，才能办到。但如果连着盘桓三天，就有点特殊了。

其二，已经三天了，旗尉催着赶路，也在情理之中。这又涉及明朝的规矩，犯人上路，途径的州县衙门都要签押的。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走，都有时间上的查考，滞留过长，不好交代。周顺昌凭什么就要翻脸呢？从苏州到北京，有水路，有陆路，行程五十馀天。这一路上，犯人都是上枷的，这端茶送水之类，尚需旗尉照应。这一骂，对魏大中有什么好？有这样饯行的吗？魏大中被逮至京后，受尽酷

刑。临断气前,狱卒用藁席将魏大中卷起,倒竖于地。三天后解开,眼睛肿得像车轮一般。魏大中死后,其尸体还被喂狗。所以,其儿魏学洢在整理其父的年谱中沮丧地写到:“及缔姻事,蓼洲(周顺昌)筲而先君之祸遂益烈。”并连用了两个“于乎痛哉”,心中自有说不出的苦。

其三,魏忠贤固然该骂?但骂了魏忠贤,图一时痛快,于事无补,反而显得十分幼稚。当时魏忠贤权势熏天,这一骂,代价很大。据《先拨志始》,押解魏大中的缇骑回北京后,尽以实告,魏忠贤大怒。于是御史倪文秀弹劾周顺昌与罪臣婚,并有贪污等罪状,诏令削夺。被罢了官。天启六年(1626)二月,魏忠贤欲杀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黄尊素等六人,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向魏忠贤提供空白疏状,另一苏州老乡吕純如参与设计,最终以李实的名义诬劾苏松巡抚周起元等贪污十万金,用于讲学经费。其中,周顺昌贪污三千金,于是就有逮捕周顺昌的诏书下。

纵观周顺昌之举,是不是有点草率?他的行为为什么这样夸张?答案有了。

据黄煜所撰《碧血录》记载,阉党的《天鉴点将录》,将熹宗一朝的正人君子全网罗进去了,却独独没有周顺昌的名字。他觉得是一种耻辱,“此度辽有不与之耻也”,他不仅要成为东林党的一分子,而且要成为东林党中极其灿烂的一分子。因此,在行为上格外地超越。这就是周顺昌之所以痛骂魏忠贤的思想根源。还有一个例证,苏松巡抚周起元被罢官,周顺昌写了一篇文章送他,将阉党专权骂了一通。继任者毛一鹭是魏忠贤的干儿子,称二十孩儿。毛一鹭上任,周顺昌将这篇文章作为见面礼送给他,把毛一鹭恨得咬牙切齿。周顺昌处处与阉党作对,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还说过,当竖起脊梁

明吏部貟外郎 諡忠介周公順昌

緹騎到門
邦人赴義
身殞名存
清忠風世

骨，做一个生铁铸就的人。

但他个人的生死度外，差点将整个苏州都搭将进去。

周顺昌之被逮，在天启六年(1626)三月。吴县知县陈文瑞接到捕文，大吃一惊。他是周顺昌的学生，于是连夜赶到周家，抚床大哭。关于这个细节，应当有点说明。陈文瑞连夜赶去，不仅仅因为有师生之谊，也是例行公事。因为北京下来逮人，东厂校尉自己并不动手，而是“檄所司征逮者”，地方上先将犯人收住。因此，吴县知县连夜赶去，主要不是报讯，而是逮人。按司法规矩，知县大人要率“兵快掩捕”，出其不意，连家属见一面都是不许可的。江阴知县逮缪昌期，就是这么干的。

当夜，周顺昌被收监吴县县衙，等待开读圣旨。一等，等了好几天。为什么？东厂校尉在等待贿赂。譬如，江阴缪昌期的家属就凑了三千金，缪昌期也拿不出这些钱，暗中有常州知府曾樱资助，东厂校尉还嫌少。周顺昌出身贫寒，家里穷，哪里有银子？在这时候，谁能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是为本文主人公杨大溁、杨廷枢父子。《元和县志》记道：“缇骑逮周顺昌，并坐赃。大溁置籍为劝输。”起初，苏州人虽然很想为周顺昌出力，但心里害怕，不敢冒犯官府。见到杨大溁一家一家的劝输，都说：“乃公尚尔，吾属敢后？”

周顺昌为人不错，凡是有人受到冤屈，或涉及乡里利益的事，常常出面力挺，与官府交涉。因此，当周顺昌被逮，众咸愤怒，号冤者塞道。至开读日，周顺昌一身囚服，出吴县县衙(在今古吴路)至西察院(今观前街西察院场)，一郡罢市，不期而集者数万人，百姓夹道执香相送，哭声干云，涌往按察使衙门。《东林列传》说，蓼洲先生之逮，则举国若狂，整个苏州都震动了。

当天，西察院气象森严，东厂校尉身穿绯衣，怒目上视，龙亭里

供着皇帝圣旨,地上罗列着捉人械具。苏松巡抚毛一鹭立在左边,巡按御史徐吉立在右边,等待吴县知县将犯人送来。苏州的三学(苏州府学、吴县县学、长洲县县学)诸生也聚集来了,有五六百人之多,为首的学生领袖为杨廷枢、王节、刘羽仪、文震亨等五人,面谒巡抚毛一鹭、巡按徐吉说,人情如此,明公难道不考虑历史怎么写吗?为什么不据实上报呢?毛一鹭不耐烦地说,诸生读孔子的书,知君臣大义。诏书在,就是君父在,为何聚众而喧哗如此?一名校尉厉声说:"今日事,与秀才何与?"一边将刑具扔于堂下,大呼:"囚安在?"一边举械将击诸生。

这时,突然有一人从人肩上跃下,直奔堂上,一把揪住举械的校尉,他就是颜佩韦。其馀校尉见状,围上来动手。人丛中又跃出四人,与校尉群殴。瞬息间,万声鼎沸,虽黄童白叟皆攘臂奋勇。这天是下雨天,手上的雨伞,脚上的钉鞋,都成了老百姓的武器,堂上万屐齐掷。堂上的扶栏、阑楯,都成了武器。毛一鹭、徐吉见场面失控,与州县等官避入署内。东厂校尉被当场打死两人,馀皆抱头鼠窜。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江南反矣,尽杀诸缇骑矣。

第二条消息又传出:已劫周顺昌,城门竖反旗,城门白天也关了。

第三条消息再传出:已杀都御史,粮道被阻,粮船被劫。

虽然一时谣言四起,但苏州之变,毕竟闹大了,杀了中央监察部的官员,不是一件小事。杨廷枢在《全吴纪略》中说,魏忠贤得知厂尉被打死,非常愤怒。朝中大臣大都仇恨东林,恨不得借此机会,一网打尽。以"吴民为乱"为理由,发兵尽坑之。消息传出,吴中一日数十惊,都以为死到临头。有移家出城的,有踉跄逃走的,风声鹤唳,殆无宁日。

所有传言也不全是空穴来风：

魏忠贤的态度是“上怒甚，必欲尽诛为乱者”。

内阁首辅顾秉谦的态度是，他不相信几个学生娃会闹出这样大的风波，他对苏松巡抚毛一鹭的上奏批了“漏网渠魁”等语，觉得后面还大有人在。

兵部尚书邵辅忠写信给毛一鹭：“急以文某、姚某入告，少宰虚席以待。”希望他尽快把文震孟、姚希孟拖到案子里，并用侍郎的官位引诱他。但毛一鹭终于没敢上钩。文震孟是文徵明曾孙，天启二年(1522)状元；姚希孟是文震孟外甥，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入翰林。甥舅两人志趣相同，都是清流人物。

太仆寺少卿徐如珂是苏州人，在朝廷上反复抗辩，并以全家百口性命立下字据，力保吴民不反。对能影响朝政的首辅顾秉谦，软硬兼施，威胁他，一旦苏州被屠城，苏州人必不会放过你。顾秉谦是昆山人，一番话听得他汗毛凛凛。魏忠贤其实也很怕苏州乱，他曾说过：“财赋尽在江南，彼为变，奈何？”阉党也知道，苏州是国家钱粮重地，苏州一旦乱了，天启帝心里发毛，恐怕真要翻脸了。魏忠贤还责怪崔呈秀：“你教我尽逮五人(周顺昌、高攀龙、李应昇、黄尊素、周宗建)，今日激变，奈何？”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听说民变，急得闭门痛哭，连眼睛也哭肿了。

这时，恰恰发生了京师大地震，时在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即公元1626年5月30日早晨。先是预震，屋脊上的鸱吻坠落，砸死魏忠贤身边的两个小太监，而魏忠贤居然无事。大震随之而至，数万间房屋被毁，乾清宫大殿摇动，御案、御座皆被掀倒，死伤两万馀人。接连又引发了王恭厂火药爆炸，皇家象房里的大象受惊逃出，在北京城横冲直撞，踩死人无数。东自顺承门大街，北至刑部街，长三里，

方圆十三里的地方被炸翻。石驸马大街一座千斤重的大石狮子飞出顺承门外。

古人对地震等异常灾变很迷信,认为是天象示警。天启帝认为是自己当政不端引起的,下"罪己诏",魏忠贤也从此生有戒心。"苏州民变"最后被从宽发落,与此有莫大关系。颜佩韦等五人处斩,杨廷枢等五名生员仅受到黜革的处分,馀皆不问。

东厂缇骑从此也不敢南下了。

但魏忠贤没有放过徐如珂。天启六年(1626)九月,徐如珂先是外放南京工部侍郎,接着被罢官。租船回苏州时,曾遭遇刺客。到苏州仅三月,中毒死亡,传说是阉党下的毒。另有一说是,徐如珂不堪精神压力,仰药自杀。

顾秉谦的结局也值得交代一下。崇祯帝登基后,顾秉谦定性为交结近侍,流放三年,削职为民。昆山老百姓恨其不死,一把火烧了他家,东西抢光。年已八十的他,仓皇逃入一艘渔船,才捞回一命。后向朝廷献出四万两银子,才同意他寄居在别县。关于这个事情要再说几句,其一,此事的幕后策划是张溥。其二,在封建社会,不准回桑梓,被开除"族籍",是非常严厉的处分。顾秉谦失去了"昆山籍",连累祖宗八代都找不到自己的家,这是大不孝,也是奇耻大辱。现在说这个事,好像无足轻重,但在封建社会,是一种道德准则。另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顾秉谦的子孙可能因流寓而无法在居住地进学,无法在居住地参加科举考试。对于官宦家庭来说,这几乎无法忍受。

《明史》说,自天启四年(1625)十二月至六年(1626)九月,凡倾害忠直,皆秉谦票拟。《三朝要典》之作,秉谦为总裁。真是罪有应得。

杨廷枢在“苏州民变”中名闻天下，又几遭不测，差点丢了性命，是徐如珂的力挽狂澜，才使事变有了极大转机，所以杨廷枢要写《全吴纪略》，全者，就是保全；吴者，吴中也。好在天启帝寿命不长，仅过了一年，天启七年（1627），他就驾崩了，魏忠贤倒台，杨廷枢即于崇祯元年（1628）平反，恢复学籍，获得恩贡的身份，是秀才中地位比较高的一种，并于崇祯三年（1630）举江南乡试第一名，像唐寅一样，成为一名解元。

崇祯三年乡试，苏州出了一批有名的举人，除杨廷枢外，还有张溥、吴伟业、陈子龙、吴昌时、郑敷教等，后来都成为复社的重要骨干。杨廷枢考中举人后，一直背运，屡上春官不第。在科举的道路上，进士是一块非常重要的敲门砖，少了这块砖，仕途无望，只能勉强做个乡绅。

杨廷枢大概属于正人君子这一类，人望很高。《东林列传》称赞他“人品端方，足迹不至公庭，亦不妄发一函，学者尊之如泰山北斗，朝野望之亦如景星凤凰”。当时，苏州的杨廷枢、徐汧，太仓的张溥、张采，都特别有名，士人尊称为“皋里”、“吴趋”、“西铭”、“南郭”四先生而不名。天启五年（1625），四先生在沧浪亭组织应社，其最初目的仅仅是切磋学问，应付科举考试，猎取功名。但周顺昌事件的发生，将杨廷枢等逼上政治前沿。但他仅是个举人，书包没有翻身，做官没有资本，虽有雄心壮志，却手无缚鸡之力。继而，杨廷枢积极参与了张溥、张采等组织的复社。复社从传统上说是继承东林党的，但复社的政治意图非常明确，它绝不仅仅是评议朝政，它要左右朝政。复社后来集巨资以作为运动朝廷的经费，每股万金，甚而连阮大铖也参了股。阉党入股的还不止阮大铖一个，还有一位冯铨，魏忠贤时期的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是魏忠贤的重要党

羽。可见为了挤进权力中心,复社实施的政治谋略已无所不用其极。诸如买通田妃,买通太监,买通东厂这些事,复社都做过。崇祯十四年(1641),将宜兴的周延儒推上首辅的高位,都是复社的绝招,具体操办者,乃是吏部郎中吴昌时。两年后,周延儒被赐自尽,吴昌时被杀,证明复社走的也不是若辈所标榜的那样光明正大。杨廷枢在复社不是主要角色,但又时时能看到他的影子。譬如,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在驱逐阮大铖的《留都防乱公揭》上,有杨廷枢的签名,虽然他并不主张将这份原先准备上奏给皇帝看的人民来信公开发表。又如崇祯十六年(1643),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史称南明,阮大铖出任兵部侍郎,首先要杀的五人中,也有杨廷枢。可见杨廷枢并未寂寞。杨廷枢大概在这个时候就逃入吴县西部山区了,许多史籍都说是清兵南下后,杨廷枢躲到山里去的。但这种说法十分可疑,清兵与杨廷枢没有利害关系。真正仇恨杨廷枢复社诸人,是阮大铖,阮有杀人动机。于是,我们找到这样的史料,阮大铖曾布置镇抚司逮治杨廷枢,凡是在《留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一个不放过。阮大铖为他们罗织的罪名极其阴险,是另立潞王罪。就是反对福王在南京继位,准备另立中央。这是要杀头的重罪,镇抚司的出动也在情理中了。于是杨廷枢避入苏州西郊山中,三年不入城市,就是这个道理。一度还传说杨廷枢剃发为僧,但这个传说首先被《东林列传》否认,因为《东林列传》有个编辑凡例,凡出家当和尚、道士的,即不收入,如方以智、陈贞慧,属明末四公子,当了和尚,就不收入了。陈贞慧也在《留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被阮大铖逮住,在镇抚司大牢里吃了大苦头,因受刑而昏死十次。其馀签名诸人,金坛周镳、太湖雷縯祚被赐死于狱中,宣城沈寿民变换姓名,贵池吴应箕逃亡,无锡顾杲下了镇抚司。因此,杨廷枢逃入山中,非常理智。

对阮大铖与杨廷枢之间的恩恩怨怨，想再说两句。崇祯二年（1629）定阉党逆案，阮大铖遭到废斥，此后，他避居南京达十七年之久。期间，阮也曾痛陈错悔，与复社诸人套近乎，但杨廷枢等始终没有予以"给出路"的政策。阮大铖这十七年活得咬牙切齿，时时在等待再起的机会。崇祯八年（1635），顾杲、杨廷枢等复社中坚作《留都防乱揭》，再次驱逐阮大铖，更加深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人事恩怨。明末，知识分子之间的亲疏离析，党同伐异，加快了明朝江山的覆灭。

清顺治二年（1645）乙酉之变，清军攻占南京。杨廷枢携妻费氏及女避匿洞庭山中。女名观慧，二十多岁了，乃前妻所生。妻费氏，是十年前娶的。时唐王聿键在杭州即位，还遥封杨廷枢为翰林院检讨兼兵科给事中。

关于杨廷枢最后的日子，说法很多，简述如下：

其一，当时太湖里有支游击队，以白布缠头，称白头军，起兵反清。愿借杨廷枢的名气以号召。杨廷枢问，粮食从何而来？对方答，取之于民，不患无粮。杨廷枢说，如果这样，就和强盗没有两样了。何义之有？当局听到这一消息，害怕杨廷枢"入湖为患"，于是追捕杨廷枢。

其二，杨廷枢的门生、长洲秀才戴之隽策动降清的前苏松提督吴胜兆反正，联络太湖中的义军和四方缙绅，准备起事。但吴胜兆是个一点城府也没有的蠢才，尚未动手，先被清兵逮住，陈子龙、侯岐曾、夏完淳等精英先后牺牲，杨廷枢也被捕杀。

其三，杨廷枢参加了吴易的起义。吴易是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国变后，投奔扬州史可法，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兼监军。顺治二年（1645）四月，他率督水军到江南筹集粮草，当船过长江，就传来扬州失守、史可法阵亡的消息，于是，率军在吴江及东太湖坚持抗

皇清賜謚節愍明兵部尚書長興伯吳公易

南都職方
見危授命
草橋門外
一身甘殉

清，保卫家乡。据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记载，留都变后，江南起义诸军以吴易军最大，有楼船数百艘，声势很大，江湖义旅都听他号令，其中就有杨廷枢。曾一度准备攻占南京，因绍兴失手而被执，在杭州草桥门就义。《研堂见闻杂录》的作者认识吴易，称赞他“一夫跳梁，湖海鼎沸；螳臂御轮，足见其勇”，是英雄好汉一流人物。吴易的抗清一直坚持到顺治三年（1646），西至长兴，南至海盐，东南至金山卫，都是他的势力范围，其核心区域在黎里、芦墟、嘉善一带。他甚至在长白荡设立帅府，在汾湖设立点将台，三次攻进吴江县城，一次斩敌三千馀人，缴获战舰五百馀艘，衣甲兵器无数。明隆武帝大受鼓舞，封吴易为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晋忠义伯。鲁王监国，封他为长兴伯兼浙直总督。因此说，吴易的抗清活动不是草台班，具有官方背景，这一点，对杨廷枢有吸引力的。杨廷枢最后死在芦墟，不是没有原因的。芦墟，是吴易的根据地。

关于杨廷枢的死，《明史》说得比较简略：“当事者执廷枢，好言慰之。廷枢谩骂不已，杀之芦墟泗洲寺。”这位当事者，就是江南巡抚土国宝。

土国宝，乃悍匪出身，苏州人对他十分仇恨，为什么？其中有一因果。当剃发令下，苏城骚乱，城中居民与城外明军残部里应外合起事，有数万人之众，先是劫狱，然后将抚台、察院、府台、长洲县和吴县五衙门，一把火烧了。都督李延龄不想屠城，巡抚土国宝主张屠城，于是李延龄想出一个主意，拈阄分兵。其实两阄写的都是东南，因为东南人少，西北人多。土国宝拈阄后，从盘门血洗到饮马桥而止。此事见《平吴事略》。李延龄做了这桩功德无量的事，苏州人在山塘给他建了一座生祠，并立“德崇宇宙”坊，以志不朽。但《研堂见闻杂录》的记载于此大不一样，说：“李侍郎欲屠城民，军门土

国宝力争之。先期出示,使居民速移避祸。至十六日,以三十六骑,自北察院杀而南,及葑门。老稚无孑遗,而苏城始定。”照此看来,想屠城的反而是李延龄,倒是土国宝走走形式。故《研堂见闻杂录》认为,大兵初下,土公颇有德政。后来土国宝离任,苏州人也建了一座生祠,就在李公祠之右。顺治十年(1653),史学家谈迁游览虎丘时,还看到半塘新建的土国宝祠。

其实,说李延龄和土国宝都曾有恩德于苏人,大是强奸民意,至少明末死难的苏州人,会从棺材里爬出来吐一口吐沫。这都是苟延残喘的奴隶们编造出来骗骗自己的。一个手上拿着屠刀,一个只有支撑头颅的脖子,两者之间怎么会有恩德呢?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说,土国宝抚吴,实鲜善政,只知道刮地皮,捞了一大笔钱,在扬州买房子,后被御史弹劾,皇命下,处以极刑。土国宝得到消息,以弓弦自尽,自我了断,死在朱明寺的楼上,即今苏州军分区机关驻地。

再来看《明史》所言杨廷枢之死:“当事者执廷枢,好言慰之。”土国宝说了什么好言呢?原来是土国宝不想杀他,只要他答应剃发,就可免他一死。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但杨廷枢是复社中枢,将气节和名义看得比生命还重,他当然选择死。杨廷枢回答:“头可断,发不可断。”“为人臣者,国存则与俱存,国亡则与俱亡。今国既亡矣,吾不死何为?”土国宝劝之再三,终不屈。清军的巴将军大怒,命斩之。临刑,杨廷枢仰天叹曰:“吾得死所矣。”即死于芦墟镇泗洲寺永安桥旁。同时受刑而死的,还有夏完淳、徐尔谷、侯岐曾、顾咸正父子三人等起事英雄。后人景仰杨廷枢的高风亮节,将泗洲寺改称杨公寺。

但《明史》是清朝人写的,对那些事总有所忌讳。明末范石夫《朋旧尺牍》记录的杨廷枢事迹,远比《明史》要壮烈得多。说他临死前,

"备极箠楚,体无完肤。临刑仰天长啸,连呼'大明'。即头已落,而'大'字尚有声可听,真与文山先后一揆矣"。范石夫是长洲人,文正公后裔,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与杨廷枢是同一地方、同时代人。他的记录的可信性应该更高一点。他对杨廷枢十分推崇,他觉得天地间没有了杨廷枢这样的人,"宇宙成何气色"。杨廷枢死后,门人迮绍原收其尸,葬于虎丘山南麓十房庄(今称硕房庄),私谥忠文,因其所居皋里,又称皋里先生。

行文至此,杨家诸人都写到了,文章也该结束了。最后将杨廷枢的儿孙交代一下。明亡时,杨廷枢的儿子杨无咎才十多岁,国破家亡,穷得常常连野菜也吃不上。经历了这场变故,杨无咎终身心静而淡定,杜门隐居,活过八十多岁,与徐枋、朱用纯称"吴中三高士"。徐枋临死时,将孤孙相托,两代世交,十分感人。想当年杨廷枢与徐枋之父徐汧,乃是密友。徐汧住在吴趋坊周五郎巷,家有二株园,花木之盛,堪与范家园争胜,杨廷枢也常在二株园读书会友。杨无咎的小儿子叫杨绳武,学问很好,朱彝尊来苏州,常常与之讨论经义。杨绳武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中二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父亲死后,就再没有出去做官,于雍正年间主讲杭州敷文书院,袁枚是他的学生。后主讲南京钟山书院,曾甄拔历史地理学家齐召南等,均为一时俊杰。乾隆十四年(1749)回到苏州居住,年七十六而卒。杨绳武的儿子叫杨庆孙,为石埭县教谕。杨庆孙的儿子叫杨一鸿,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举人。杨家这一脉就交代到这里为止。

杨廷枢殉节时身穿的一袭血衣,杨家一直收藏着,此事被钱泳写入《履园丛话》。


皇清處士楊公元咎
至情至性
不忝其先
幽人貞吉
吾無間然

文震孟　文震亨　姜埰　姜垓
附记：文洪　文林　文彭　文元发　姚希孟　黄道周

读书人读到状元，总是读出头了。做官做到宰相，也算做到头了。文震孟是苏州为数不多的状元宰相，他活得怎么样？且慢慢道来。

明代苏州文家，都云是书香门第。这是因为文震孟曾祖文徵明，乃一代大画家，名气实在大。但文家先祖却并不从文，却是从武的。元朝时，文家有个叫文俊卿的，官至镇远大将军管军都元帅，佩金虎符，镇守武昌。文俊卿的长子文定远帮助朱元璋平汉，赐名天龙，官至终荆山左护卫千户。文俊卿的次子叫文定聪，曾随妻父湖广都指挥驻防苏州。文定聪的儿子文惠之所以移居苏州，成为吴人，与文定聪的这段经历大有关系。也有说文惠到苏州，是来做招女婿的，但招女婿应该姓女家的姓，轮不上姓文。因此，这个说法只能姑且听之。

文惠的儿子叫文洪，宣德元年（1426）生，字功大，又作公大。成化元年（1465）中举人，文家由武转文，应该是从他开始的。文洪

中举后，却屡试屡北。后来文洪的儿子文林也中了举，于是父子俩一起参加成化八年（1472）会试。结果，文林成进士，文洪止步于会试副榜。会试又称礼部试，合格的称为贡士。一旦成了贡士，就可以金榜题名了，因为殿试只是确定等第名次的考试，定一甲、二甲、三甲而已，做官的身份已经有了。文洪是会试副榜，属于备取名单。一旦皇帝心血来潮，从副榜中挑出几份看得上眼的卷子，恩赐参加殿试，也是有的，但这样的机会不多。文洪生活在宣德、成化年间，正是明朝经济的恢复期，用人的地方很多，故文洪最终以会试副榜的资格被任命为涞水县学教谕。教谕掌管一县的教育，正八品，类同县教育局长。但明中期，学生没有现在这样普及，虽说管理一县的生员，但像涞水这样的地方，按定额，县学只有二十名学生，只准少，不准多。教谕做些什么？最大的事无非是考试与祭祀，真正的教育倒是不管的。教谕的收入不高，油水不多，日子虽然清淡，但大小也是公务员系列，衣食无忧。

文洪做了三年涞水教谕退休，成化十五年（1479）去世，年五十五岁。因为儿子文林有出息，朝廷赠他南京太仆寺丞。次子文森也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成进士，朝廷再赠他南京太仆寺少卿。当然，这是虚衔，牌位上好看而已。文洪前后三妻，陈氏、顾氏、吕氏，三个女人为他生了三子一女。他一生最大的成功是生了两个得意儿子，一门两进士，这是极不容易的。

长子文林生于正统十年（1445），字宗儒，号交木。二十七岁成进士后，先是任温州永嘉县知县，后改博平县知县，很有政绩，升任南京太仆寺丞。太仆寺管什么？职能是管理马政。马的饲养、选种、配种、草场等，都属太仆寺之责。明朝的驿站很发达，驿站要用马，故驿站归兵部管理。皇家也要用马，有专门的御马监。但饲养指导，

却属太仆寺。明朝有三个太仆寺,北京太仆寺管全国,南京太仆寺管南直隶,晚明又设辽东太仆寺,掌管对辽作战的用马。文林调任太仆寺丞,是从六品,比知县高半级,所以是升官。

但南京太仆寺,并不在南京,而是在滁州,与南京隔江相望。太仆寺的前身为群牧监,是朱元璋创建的,办事机构设在滁州,后改称太仆寺,依然在滁州。直至永乐帝迁都北京,滁州的太仆寺改称南京太仆寺,衙门依然在滁州,《明一统志》说:"南京太仆寺在滁州城外西南三里,洪武六年建。"滁州以北,许多州县都设有牧马草场,太仆寺设在皖北,明显是为管理方便。

文林在南京太仆寺任上,前后建言时政十四事,"当道奏为例",就是说,曾被当局视作上奏的范文。经查,查到一篇文林呈送兵部的报告。报告说,南直隶牧马草场,多被势豪之家侵占,要行踏勘处置,以备马政急用。这是成化二十三年(1487)事,这篇报告收在《名臣经济录》里,说明是一篇足以资考的经世之作。

文林在南京太仆寺任上,还有一事,也很有趣。他向南京吏部申报请给已故父亲文洪、已故母亲陈氏、已故继母顾氏、及现在的继母吕氏以敕命。经南京吏部同意,送呈南京兵部,再送呈北京吏部验封清吏司。北京吏部吃不准了,还没有接到过请封父母及二继母的报告的,于是上奏弘治皇帝。弘治批示:原本就没有封继母的规定的。后来允许封一人,已是加恩了。文林申请的敕命,按现行规定给他,钦此。按这个圣旨,陈氏、顾氏可封,而吕氏不能封。后世有些文章说到文家先祖的事,说吕氏也被封恭人,不知何据。一般来说,对这样的小事,皇帝已有旨了,不可能再下旨更改。更何况,文林、文森兄弟对明朝官场的影响力不大,再为此上奏,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可能是后世摇笔杆子的杜撰出来的。

明温州知府文公林
温州治術
首及田疇
令順民心
若水之流



文林在弘治十年(1497)调温州知府,十二年(1499)卒于任上,年仅五十五岁。纵观文林一生,其为人为官都不错。他任温州知府,是因为温州乡绅惦记他,觉得他当永嘉知县时,“发奸摘伏,人服其明”,因而荐举他的。从这八个字,大致可看出温州的治安出问题,故有力者请文林再莅温州。文林死后,“箧中无一温物,士民多哀诔之”。(《国朝献徵录》卷八十五)

文林为官二十七年,仅从知县升为知府,晋升速度也实在太慢了。为什么?大致有两个原因。其一,他身体太差。查阅他的简历,在南京太仆寺任上,至少干了十年,十年而得不到升迁,原因是他曾“告病归”。其二,老爸文洪继母太多。多一个老人去世,多一个丁艰。父母去世,丁艰三年,双亲就是六年。继母去世,虽然丁艰仅需一年。但一旦丁艰,将仕途中断,对做官而言,非常不利。

告病和丁艰都没有工资的。就这一点而言,文林的经济不会太宽裕,这一点,温州人也看到了。故当他死后,“家无馀财,士民厚赙葬仪”,其子文徵明坚辞不受,温州人特为建却金亭。

文林的弟弟文森,生于天顺八年(1464),字宗岩,号白湖。中进士后,先是纂修《宪宗皇帝实录》,后任浙江道监察御史,累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十年(1515),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当是时,南中盗贼蜂起,攻剽府县,文森控制不住局势,托疾避去,就提前退休了,接替他的,是历史上著名的王守仁。文森在家闲居十年,于嘉靖四年(1525)去世。文森的官虽然做得比文林大,但声望远远不如乃兄,《明史》无传,连《江南通志》也没提到他。但文森有一事可说,苏州的文山寺,却是他创建的。

文徵明是文林的儿子。关于文徵明,就不多说了,知道的人太多,不需要笔者在此饶舌。从文徵明这一脉下来,有文彭、文起元、



文震孟。先略为说说文彭。

文彭生于弘治十年(1497),字寿承,号三桥,别号渔阳子。以贡生廷试第一,初任嘉兴县训导,补授顺天府学训导,升国子监学录,终南京国子监助教。关于“贡生廷试”想解释一下,明清两朝,府州县都设有官学,府学就读叫府学生,州学就读叫州学生,县学就读叫县学生,都称为生员,即秀才。那贡生是怎么回事呢?贡生是各省选拔出来到国子监读书的生员,一般大省仅五六名,小省更少,入学前,先要集中考试。考两场,其中一场在三大殿,故称廷试。廷试成绩好的,授以教职,其馀入监继续深造。文彭是贡生廷试第一,被授顺天府学训导,是正常顺序。这样的机会,在清乾隆年间就被取消,贡生全部入国子监学习,三年后分配,年轻的做小京官,年长的授教职。文彭少承家学,善真行,草书尤工,他写的草隶,咄咄逼其父。文彭最拿手的活,乃是篆刻,超卓古今,人争宝之,后人奉为科律。他卒于万历元年(1573),留有《印史》等著作。

文彭次子文元发,生于嘉靖八年(1529),字子悱,号湘南,晚号清凉居士。隆庆二年(1568)恩贡,万历六年(1578)选授浦江知县,时已四十九岁。当时清理丈量鱼鳞图册,文元发都亲到现场,有舞弊者立即处置法办,田赋为之一清。上官遇到有疑难的案子,常常交他办理。大概做官做得怕了,后来升迁他为卫辉府同知,他不就而归。苏州民间有一句俗语,“做官莫做小,做小多烦恼”,文元发是不是这样的心情呢?文元发卒于万历三十年(1602),乡人私谥端靖。可见无论乡谊和乡情,文元发都处得不错。

文元发为文震孟之父。文震孟之母,乃吴郡彭氏。外公彭年也是蛮有意思的人,嗜读书,六经诸子,史记两汉,古金石,无不探研。诗综盛唐,书宗欧柳,而独独不喜习举子业。吴中士大夫称彭年与

文徵明为天下模楷。彭年还是位酒中仙，仰慕他的人，只要请他喝酒，他都去。家中贫困，没有什么积蓄，卖文所得，常常变成酒资。苏州知府聘他担任府学的教授，建议他参加乡试，一搏功名，他都一笑了之。

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文震孟出生，初名从鼎，字文起，号湛持。文震孟童年时代过得不坏。父亲文元发在天池山竺坞里筑室建庐，使文震孟有一个十分宁静的读书环境。文元发在苏州城里另有一处大宅子，地处宝林寺东，题名药圃(今艺圃)，而附近居民将文家的这块地方称为文衙弄。衙并不是衙门的意思，而是大宅子，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 · 自桃花坞至文衙弄》里说："我起初以为凡是官署，方可以当得一个衙字，因此那种官厅，都称之为衙门。谁知从前却不然，凡是一个大宅子，都可以称之为衙。"大宅子都是大墙门，常常是官宦人家，意思也是相近的。

苏州人对文元发不大熟悉，习惯把药圃归于文震孟名下，以为文震孟是崇祯五十相之一，其身份与园子是相称的。其实不然，药圃并非文震孟所置。汪琬《文文肃公传》说："至于贵显，其第宅犹仍诸生时所居从，未尝拓地一弓，建屋一椽也。"照此看来，文震孟二十一岁前为诸生，那个时候就住在药圃了。这个年龄段，还很难创家立业，故药圃只能是文元发主持买下并修建的。这个观点，魏嘉瓒先生在《苏州古典园林史》中有详尽的阐述，但他将文震孟说成是"乡试解元"，显然是错了。

文元发好像很有几个钱。两座大房子以及大房子里的屋肚肠，都要真金白银去买。另外，文震孟十进礼部试，从中举到进士及第，耗时近三十年，儿子不养爹，孙子吃阿爷，都需要金钱的支撑。就

家庭而言，绝对是大投入，对一名做了没几年的浦江知县来说，难了点。

文震孟是天启二年（1622）状元。明清科举考试，一甲只有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这是官方规定的，不是俗称。同样是取得进士资格，一甲称赐进士及第，二甲称赐进士出身，三甲称赐同进士出身，也略有区分。曾国藩是三甲，同进士出身，终其一生，引为耻辱。但这是明清的规矩，分得很细。宋朝人就简单多了，一甲二甲进士，都叫进士及第。这次会试，小皇帝朱由校还是蛮重视的，这是天启帝即位后的第一次会试，特命两名大学士作正副总裁，共录取进士四百零九名，这个数字是创纪录的，表达了皇帝的恩典。文震孟中得状元后，心情自然很好，有《胪唱纪恩》诗云："紫烟浮动蔚蓝天，定有祥云捧日边。国士怀惭叨宠遇，家声遥接仰名贤。光生御笔龙章焕，色映宫罗凤彩鲜。报主正从今日始，雄文谁拟勒燕然。"

当年冬十月，身为翰林院修撰的文震孟就上了一本，题为《勤政讲学疏》，写得非常好，大致意思是：现在四方多事，国家没有一年不担心丧权失地，城市被攻陷，将领被杀。正是大小臣工卧薪尝胆之日，决不能因循守旧、粉饰太平。陛下你不论寒暑，每天天不亮就上朝，不能说不勤政，但是每天由鸿胪寺官员引见，跪拜起立，与傀儡登场有什么两样呢？请按祖宗留下的制度，点到六部六科，则六部六科依次报告，由陛下和辅臣当面裁决。如果上朝仅仅是揭帖一纸，长跪一诺，北面一揖，那国家养我们这些文武官员，器宇轩昂地围着金玉腰带，做什么呢？再就是皇帝的经筵、日讲，也不应是官员的照本宣科，像一个乡下的私塾老师一样。祖宗之朝，君臣相对如家人父子，从军国重事，到坊间的种种隐蔽，奸诈无所藏，左右臣子

也不敢蒙蔽。如果臣下把你当成一尊神，上下拱手，所有的事情都按老规矩办理，那要我们这些人做什么？陛下既与群臣不接触，朝夕相处的，无非是中涓之辈，那你不知道帝王的宏远规划，将危如山海啊。现在，正直的大臣连连去职，有的杜门谢客，内阁大学士也纷纷要求退休。这样下去，唐宋末年的悲剧就可能重演了。

中涓，这个词，在字面上，是亲近的侍从官。但又可以指门房、清理卫生的贱人。

十月十八日，文震孟的这篇上疏递进去，被魏忠贤压下来。拖到二十五日，天启帝正好看木偶戏的机会，将这篇上疏递上去，并告诉天启帝："新状元文震孟书中所称傀儡，就是这偶人。用这个来比喻你，绝对不能饶恕他。"天启帝问："为什么这样比我？"魏忠贤回答："他见你身材短小，你上金殿，都是奴辈们扶持着走，故作这样的比喻。这种人不杀，无以示天下。"天启帝尽管昏庸，但不许臣子看不起他，点头首肯。

三天后的二十八日，魏忠贤传出圣旨："新进士文震孟出位妄言，藐视朕躬，与杖八十。"这天，正好首辅叶向高告假，次辅韩爌急了，据理力争，请皇帝收回成命。打新科状元的屁股，真是斯文扫地，庙堂蒙羞。最后虽然免了廷杖，依然受到贬秩外调的处分。文震孟也不赴调，直接回了苏州。在苏州人的心目中，文震孟是个大忠臣。当时就流传出一首歌谣，这样唱道："求忠臣，须孝子。翳为谁？文文起。"文起，是文震孟的字。

文震孟回苏州后，过得也极不舒心。周顺昌的被逮，姚希孟的被罢官，时局的大变迁，都使文震孟生活在心惊肉跳中。他曾预先告别家人，只要缇骑一到，就自裁了断。天启六年(1626)，太仓进士顾同寅等作《步天歌》，被兵马司缉获。魏忠贤以此为罪名，将文震

孟削职,斥为民。

魏忠贤早就看着文震孟不顺眼。

天启二年(1622),刑部尚书王纪因为上疏弹劾阁臣沈漼交结宦官魏忠贤而去职。老夫妻很幽了一默,居然骑了两头驴子,背着行李出都门而去,朝论哗然。新任翰林院修撰文震孟上疏为他说话,王纪骑着驴出都,你们说他快于驰驿;王纪破帽蒙头,你们又说荣于蟒玉。这算什么话呢?

王纪的上疏被称之为惊天地、泣鬼神。即便是用木头刻出来的君主,也当点头称是,为什么竟不能打动君主的心。真是人之将死,最高明的医生也束手无策了。王纪还是有点福气的,天启四年(1624)后,魏忠贤最为嚣张的年代,他已经死了。否则,也逃不过皮肉之苦。

文震孟回到苏州后,与为人正直的苏松巡抚周起元成为密友。当魏忠贤之流十分肆虐,国事日非的时候,官僚阶层出现三种人。一种是下跪式的无耻之徒,做帮凶。第二种是洁身自好式的,惹不起,还躲不起?选择退休、退职、告老、告病回乡。第三种,乃是像周起元一样,与杨涟、左光斗诸人奋起反击,不惜白骨含冤、黄泉茹痛。周起元不仅与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庙堂论战,还揭露福建税监高寀的种种不法事。文震孟说:"珰势方张,巧者以缄口为知几,卑者以阿附卸祸。公道何由而明,良心何由而挽。"称赞周起元"公真铁汉哉"。

周起元被削职回籍,文震孟有诗相赠。文震孟的诗一时找不到,周起元的依韵奉酬四首却收在《周忠愍奏疏》中,有"独有邦人抛不下,荒年老稚最关情"之句,他们的私交是相当好的。

因此,当阉党编写《点将录》时,毫不犹豫,将文震孟列为东林党一百零八将,名为"圣手书生文震孟"。如果天启帝不去世,文震


明大學士謚文肅文公震孟
吳中三孟
文位最隆
繩愆糾繆
古大臣風

孟早晚会被魏忠贤一伙收拾。

天启帝之死，本出于一起事故。天启六年（1626）八月，他与小太监在西苑划船戏游，恰恰在水之最深处，一阵风来，将船掀翻，他与太监均落水，两太监淹死，他虽被救起，却受溺成病。拖了一年，日渐浮肿，终于无治，于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六日崩于懋勤殿，年仅二十三岁，在位七年。

懋勤殿是紫禁城中朝东的庑殿，好像并不适合居住。天启皇帝怎么会住在这里？查明人吕毖所辑《明宫史》有记载："懋勤殿，天启造地坑于此，恒临御之。"原来如此，可见小皇帝很时尚。地坑，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地暖，冬天灌暖气，夏天输冷气。据说，苏州拙政园的鸳鸯厅也有这装置，只是年代久远，已经不能辅用。

有些书上说，天启帝的爱好是做木匠活，其实不确。木作有大木、小木之分，大木造房子，小木做家具，但熹宗所喜欢的却是制作工艺小件。王士禛《池北偶谈》说："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去手，雕镂精绝。"放在现代，是工艺大师一流人物，可惜当了皇帝。

天启帝生了三个儿子，但没有一个活下来。他去世后，皇位由同父异母的弟弟朱由检继承，年号崇祯。崇祯帝初登位，颇有拨乱反正的新气象，魏忠贤及其党羽被清算，文震孟也在崇祯元年（1628）复职，任翰林院侍读，改左中允，充日讲官。他在讲课时十分严谨，经常将儒家教条与现实政务对照串讲，在讲到"君使臣以礼"一章时，使崇祯帝有所感悟，当天就放出被关押的尚书乔允升和侍郎胡世赏。在讲到"为人上者，奈何不敬"时，崇祯帝正翘着二郎腿，文震孟一边眼盯着崇祯帝的脚，一边说："为人君者可不敬哉？为人君者可不敬哉？"崇祯帝顿时领悟，悄悄地用衣袖遮住脚，

然后慢慢放下。

这是《明史·文震孟传》的说法。文震孟长子文秉在《烈皇小识》中也写到了这个情节,很有点不一样。这个问题先搁一搁,等会再说。

尚书乔允升和侍郎胡世赏为什么被关押?原来是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二十六日夜间,刑部大牢发生越狱,犯人全部逃逸。第二天早上,城门不开,北京城里大搜捕。发生这样的大事故,刑部尚书乔允升和左侍郎胡世赏难逃其咎,当然要下锦衣卫狱,崇祯帝的处置并无不当。《明史·乔允升传》说到了这事:"二年冬,我大清兵薄都城,狱囚刘仲金等百七十人破械出,欲逾城,被获。帝震怒,下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赏、提牢主事敖继荣狱,欲置之死。"文震孟的说教,崇祯帝听不听?听的。但仔细辨辨味道,不大对劲。《烈皇小识》说,三月初十日,文震孟进讲"定公问君使臣"章,反复规讽,讲毕,"上传讲官暂留,久之,殿门皆闭。诸讲官退至东阁,则圣谕已宣付阁中,释允升、世赏于狱"。这时,大家才明白,为什么要把讲官留下来,原来是让大家看看,崇祯帝听从了教诲,立竿见形。但问题又来了。崇祯皇帝既然决定放人,为什么要搞得这么恐怖?又是久之,又是关闭殿门呢。人是放出来了,但有一条件,"寓所听勘",也就是呆在家里听候处分。崇祯帝最终如何处置这三人呢?在一片质疑声中,判处尚书乔允升绞刑,姑念他年岁大了,与提牢主事敖继荣一样,戍边。左侍郎胡世赏赎杖为民,屁股就不打了,当老百姓去吧。乔允升到戍所不久,就死了。他是一个端方廉直的人,刑部犯人越狱,他应负领导责任,但不是死罪。因此,天下人都觉着可惜。

崇祯帝此人,脾气特别坏,特别不好侍候。副都御史易应昌,因为反对判乔允升死罪,居然下诏狱,被判死刑。处理易应昌案子的

刑部郎中因为预审判轻了，被廷杖。与易应昌持相同看法的佥都御史高宏图、大理寺卿金世俊被降级。大理少卿周邦基以下官员被罚俸。易应昌最后以死囚的身份，发配边卫。可见崇祯帝是如何对待与他意见相左的大臣的。

再说崇祯帝翘二郎腿的事。《明史》上既这么说，但《烈皇小识》说的大不一样，并非是翘翘二郎腿，而是将脚搁在桌子上，"一日，上御讲筵，足加千台楞上，意有惰容。先臣适进讲《尚书》，讲至'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因以目视御膝，上即以袍袖隐之，徐徐放下"。将脚搁到桌上，比翘二郎腿，放肆多了。《明史》有意为崇祯帝遮遮掩掩，不知是何居心？

文震孟敢于揭皇帝的短，不管怎么说，都得有点胆量的，当时朝野都称文震孟是"真讲官"，这三字评语，文震孟是当得住的，虽然他很有点书生意气。

崇祯三年(1630)，内阁中曾经确定魏忠贤逆案的几位大佬韩爌、李标、钱龙锡相继去职，朝廷里同情阉党的势力有所抬头，以吏部尚书王永光为首的更是企图任用逆案中人。文震孟十分恼怒，上书皇帝说，天下有无才误事之君子，必无怀忠报国之小人。今有平生无耻惨杀名贤之吕纯如，也在寻找奥援，想平反。但文震孟的这篇疏，被王永光抓住一个漏洞，说文震孟为之抱不平的，其中一人是姚希孟的学生，而姚希孟是文震孟的外甥，因此文震孟有私心。崇祯帝向来多疑，觉得文震孟此奏既是小题大做，又是别有用意。于是下旨："文某不得任情牵诋。"而王永光反而得到温旨宽慰。文震孟因此疏不称旨，觉得呆在京里也无趣，就想调出京城，或者到南京，做翰林院掌院之类的闲官。朝廷顺水推舟，命文震孟奉使出都，去册封进贤王及益府世子妃。事完后，文震孟便再次弃

官，回到苏州。

崇祯五年(1632)，文震孟在家，又被崇祯帝惦记，提拔为右庶子，第三次进京做官。久之，又升任少詹事。崇祯八年(1635)七月，皇上未经征求群臣意见，特别选拔文震孟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说明崇祯帝非常信任他。当时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叫曹化淳，仰慕文震孟的为人，曾经托人传言过来，倘然能循例往来，朝廷上的事当尽力关照。但文震孟与他的曾祖父文徵明一样，对太监深恶痛绝，绝不交往。留下话说："尽大太监之力，能使我不做宰相？我不做宰相，于我有什么损伤？而我的名帖一旦送进去，这种耻辱将一生都洗不净了。"曹化淳得此消息，以为奇耻大辱。后来，文震孟被首辅温体仁所排挤，仅仅三个月，就被斥退。其间，曹化淳与温体仁呼吸相应，推波助澜，出了不少力。文震孟的顿失圣眷，与这两人一里一外的合作，大有关系。其实，曹化淳这个人，与魏忠贤之流是大有区别的，在大太监中不能算太坏。

明代士大夫有一个很不好的惯性，总认为自己很清高，不屑与裤裆中少了一样东西的宦官们打交道，而无视明朝的政治框架中，文官集团和太监集团早已是一种客观存在。张居正之所以能名列一代名相，就是他突破了这个界限，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合作得非常成功，权力畅通，造就了万历初年经济的极度繁荣，边境安宁，军队的储备粮可供十年，国家储备的金钱达四百多万，而在万历之前，年年透支。

事后，文震孟儿子文秉说："先父乃孤行一意如此，欲久居揆席，得乎？"从这一点而言，文震孟真不宜做宰相。广而言之，庙堂之下，有良民、莠民、刁民，都是人民。庙堂之上，有左派、中间派和右派，都是同僚。做宰相的，都要听听他们的意见，都要保护和调整

他们的利益。这才是宰相应该做的。

文震孟三起三落，内心极不痛快。回到苏州仅半年，外甥姚希孟又病亡，心情真是糟透了。没多久，崇祯九年（1636）文震孟也去世了。按理说，文震孟是“落职闲住”，仍然具备做官的身份，丧葬费至少应该给的，但崇祯帝竟不同意抚恤，可见君臣之间闹得很僵。时隔三年，崇祯帝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分，才下诏官复原职。时隔六年，才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赐祭葬，官一子。士大夫十分看重的谥号，崇祯帝并没有给他。我们今天称他为文文肃，这“文肃”两字，是一生的评价，还是福王时追谥的。

文震孟有两子。长子文秉，字孙符，诸生，号大若山人、竹坞遗民。明亡后，隐居竺坞丙舍，杜门著书终其身，有《烈皇小识》、《先拨志始》，乃是记录晚明历史的重要资料。次子文乘，字应符，廪生，于清顺治三年（1646）以密结太湖义师进行抗清活动而被执，他也不辩解，徐徐说：“不敢辱我父，愿就死。”年仅二十八岁。妻子周氏，是周顺昌之女，同时遇难。

行文至此，文震孟这一章，算是写完了，虽显草率，但功夫下了不少。尚有点事，要交代一下。

民国人物李根源对文文肃先生评价很高，他与章太炎讨论明清两代苏州的杰出人物，觉得武功当推韩雍，韩雍是成化年间的右都御史、两广总督；文臣当推文震孟，为人正气不阿。

苏州虎丘原有三贤寺，祭祀文震孟、姚希孟、陈仁锡三名经筵日讲官。姚希孟是文震孟外甥，崇祯二年（1629）的日讲官。陈仁锡是文震孟的同榜探花，授编修，因不肯为魏忠贤写铁券文而削职为民，崇祯中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他是天启、崇祯两朝的经筵讲官。关于陈仁锡有段小故事，崇祯帝的周皇后，少年时曾跟陈仁锡

学习过《资治通鉴》,与陈仁锡很熟,有一次她对崇祯帝说:“此吾家探花也。”崇祯帝回答:“既是汝家翰林,莫想得阁老。”周皇后碰了一个硬钉子。崇祯帝此人,疑心病重,对抑制外戚势力入侵朝堂,十分在意。

经筵讲官和日讲官在制度上也有些差别。经筵十分隆重,有一套礼仪和排场,而日讲则比较简单。举个简单的例子,给皇上讲课后,照例要留饭,经筵和日讲都安排四菜三汤,但经筵有茶食、水果、点心,而日讲是没有的。再找个不十分恰当的比方,经筵是专题讲座,而日讲是文化补课,大致如此。明朝的经筵日讲官,可以借题发挥政见,攻击对手,地位举足轻重,是官僚派系争夺的重要阵地。文震孟没有把握好这样的机会,是有点可惜的。

另据《文氏族谱》说,文震孟生而奇伟,眉稜上指,目光射人,与世传文天祥画像很像。苏州文家一直将文天祥视为一脉先祖,文天祥曾建节吴门,是文家的骄傲。魏忠贤为什么最终没有对文震孟痛下杀手,怕也是顾忌文震孟为文氏后人,据《石匮书后集》说,当次辅韓爌与魏忠贤发生激烈争论时,讲官郑以伟插话说:“文震孟家世忠孝,即宋文丞相的后裔,怎么可能用木偶来指拟皇上呢!”魏忠贤一听,连忙问:“谁为文丞相?不会是三忠祠供奉的神吗?”众讲官回答:“是啊。”

文震孟终于没有吃到板子,也没有削职,仅受到降秩调用的处分。恐怕与魏忠贤的被震撼有关。北京东直门外大通桥的三忠祠,是京城一处重要的祠庙,祭祀诸葛亮、岳飞、文天祥,而大通桥又是漕运的终点站,京城里谁人不知?

文震孟墓在天池山北竺坞,而《大清一统志》则记文震孟墓在石湖行春桥右,也不知孰是孰非。

文震孟弟文震亨，字启美，也是一位杰出人物。据《江苏艺文志 · 苏州卷》说，他是天启五年（1625）的恩贡，选授陇州判，改武英殿中书舍人。恩贡是贡生的一种。明清两代学校制度，中央政府的学校叫国子监，国子监的学生从哪里来？由地方推荐，称为贡生。贡生入国子监，即为监生，又称贡监。贡监又分为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五种。恩贡，乃因国家有庆典或新皇帝登基而设。天启五年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事呢？那年，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榜东林党人姓名示天下，熊廷弼传首九边，魏忠贤兴大狱，杀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君子。那是晚明最黑暗的年代之一。即使有恩贡，文震亨也不会得到，因为就在这一年，他的外甥姚希孟被削籍罢官，哥哥文震孟被闲住，家里有两位黑帮，怎么可能被荐举为恩贡呢？

天启六年（162）三月，魏忠贤东厂校尉在苏州逮周顺昌，苏州一府两县生员闹事，五名学生领袖中，就有文震亨，苏松巡抚毛一鹭给朝廷的报告中，也指文震亨为民变之首。这至少说明，天启六年时，文震亨还是一名诸生。《江苏艺文志 · 苏州卷》弄错了。

文震亨很可能是崇祯初的恩贡，这个推断？由杨廷枢得到印证。据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记载，杨廷枢在周顺昌事件后，被剥夺诸生身份，崇祯帝即位，“始复学，拔入贡举。崇祯三年乡试第一”。文震亨与杨廷枢同为当时学生领袖，同被黜，既然杨廷枢被贡，文震亨更可能被贡，因为他的身份比杨廷枢高得多。崇祯元年，拨乱反正，文震亨的哥哥文震孟、外甥姚希孟不仅复职，而且升官，都担任皇帝的日讲官，做皇帝的老师，十分的显赫耀眼。所以，文震亨于崇祯元年被贡，或是恩贡、或是拔贡，应该是囊中取物。查《江南通志》和《续文献通考》，都没有文震亨“天启五年恩贡，选授陇州判”


皇清賜謚節愍明中書舍人文公震亨
善画工詩
停雲賢嗣
隐於陽城
没能遂志

的记录。《江南通志》称“由贡生官武英殿中书”,《续文献通考》称“崇祯中,官武英殿中书舍人”。

崇祯九年(1636),姚希孟、文震孟先后去世。翌年,文震亨到了北京,出任武英殿中书舍人,这是从七品的官,品级卑微,比知县还小半级。大致以贡生授官,都在这个级别上。武英殿中书舍人做些什么?《明史·职官志》说:“奉旨篆写册宝、图书、册页。”

武英殿在清初康熙年代曾开设修书处,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十分有名。所以,有些学者就误认为文震亨做武英殿中书舍人的差使,是协理校正书籍事务,其实不然。武英殿在明代,与文华殿一样,都是皇帝的办公室,批阅奏章,召见臣僚。大致来说,文华殿会见群臣的功能更多一点,崇祯皇帝就常常在文华殿平台与群臣商量国是,上文写到的经筵与日讲,也在文华殿举行,并在文华门赐宴。而武英殿,比文华殿更私密一点,更像是崇祯皇帝的内书房。在武英殿召见,多少有点特别恩宠的意思。崇祯十一年,从前线召回兵部左侍郎、宣大山西总督卢象昇,问战和方略,在武英殿。卢象昇是崇祯皇帝极为倚重的将领,曾三赐尚方宝剑,总督天下援兵。卢象昇死后,吴三桂、曹变蛟脱颖而出。崇祯十六年,皇帝召见吴、曹两将,赐宴武英殿,也体现了一种格外的礼遇。

崇祯八年十月,皇帝下罪已诏,减膳撤乐,没有重大典礼,穿青衣素服,以表示与前线将士同甘苦,并搬到武英殿居住。武英殿本可以住人,据道光进士丁柔克所著《柳弧》记载:“武英殿内有客氏大浴盆在内”。客氏,是天启皇帝的奶娘,魏忠贤的相好。客氏住得,可见生活设施是具备的。在崇祯年代,武英殿因为皇帝入住而成为内廷政治中心。文震亨任武英殿中书舍人,主要职责是什么?据说是“以善琴供奉”(《长物志》提要),但这种说法颇有可疑。武英殿

不是皇帝的卡拉OK,文震亨也不是乐师,供奉什么？在明代,乐师属于贱籍,国家不可能用一个中书舍人的编制来供奉这码事。另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记道:“先帝制颂琴二千张,命启美(文震亨字)为之名。”这更是隔靴搔痒,瞎子摸象。查阅了文秉撰《烈皇小识》才明白:原来新天子继位,不能用旧琴的,要改弦更张,另造一百张新琴,这是祖上留下来的老规矩。每张花费五百两银子,做得十分讲究,金的弦线,玉的琴轴。但是有了好的音质却没有好的曲谱,崇祯皇帝很为此而遗憾,想制新曲,而找不到这方面的专家。这时,文震亨恰恰以恩贡人选陇州判,上北京吏部报到,中书杨崇善也是苏州人,特邀请至家,请文震亨制了新曲送进宫去。崇祯皇帝看了称好。于是下旨:“文震亨着改授中书舍人,武英殿供事。”由此可见,文震亨是既能写词,又能谱曲的玩家。

文震亨任武英殿中书舍人,真是人尽其才。他是画家,“书画咸有家风”,能画画,就与武英殿的制度相符。文震亨曾应崇祯帝的要求,将全国的边疆关隘画在武英殿的屏风上,这可能是一幅边关形势图,具有军事地图的作用。文震亨在武英殿前后三年,做得蛮开心,崇祯帝还为文震亨手书诗联,文震亨将它带回苏州,十分荣耀,真是“擎归邸舍宾朋羡,挂向山堂魑魅惊”(《经锄堂集》卷二)。

想不到崇祯十三年(1460),文震亨吃了一场无名官司,因黄道周案件下了诏狱。黄道周与文震孟是同榜进士,天启间任翰林院编修和经筵展书官,因为经筵展书官要跪着展书,黄道周不愿意,借了奔丧的理由,就告假呆在家里,读书自娱,一直到崇祯二年(1629)才重新起用。黄道周与文震孟一样,指责朝政不留情面,故崇祯五年(1632)又罢官,崇祯九年(1636)再被起用。几上几下,但他的脾气不改,他对周延儒、温体仁等人把持朝政极为不满,对文震孟蹇直

一生，十分惋惜。称赞文震孟、姚希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那年，选拔内阁辅臣，引发了黄道周与崇祯帝之间的一场辩论，崇祯帝指责黄道周："一生学问，止成佞口耳。"黄道周回答："忠佞不分，何以致治？"因为这场辩论，黄道周被连降六级，从詹事府少詹事降至江西按察司照磨。崇祯帝亲自将处分诏书写出来，张贴在朝堂上。事情稍稍平息，江西巡抚解学龙又不合时宜地向朝廷力荐黄道周，对黄推崇备至，觉得黄道周是个宰相级的人物。崇祯帝愤怒之极，认为这是结党乱政，遂追究党羽，将亦师亦友的文震亨等七八人全部打入诏狱，黄道周发配广西辰州卫。但这次下狱，虽然延续了一年多，却没有吃到什么苦头，下狱的官员与审讯者对骂，有的官员在狱中笺注《楚辞》，有的写了两部诗集，黄道周自己抄了《孝经》一百二十本，还另有著述。这种待遇，与天启年代大不一样了。

一年后，崇祯帝有所醒悟，对辅臣抱怨经筵讲官没有学问，于是黄道周以"原官起用"，文震亨拔出萝卜带出泥，奉命到蓟州劳军，然后回乡省亲。文震亨这一走，就没能再回北京。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进紫禁城，崇祯自杀，明朝灭亡。

顺治二年（1645），清军入苏州，文震亨避居阳城湖，当年就去世了。关于他的死，有七种不同说法，魏嘉瓒先生在《苏州古典园林史》中将其一一列出。一是据文震亨弥甥顾苓《武英殿中书舍人致仕文公行状》说："辟地阳城湖滨，呕血数日卒。"二是钱谦益《列朝诗集》说："逾年请告归，遇乱而卒。"三是陈田《明诗纪事》说："国变后投水死。"四是彭蕴璨《历代画史汇传》说："顺治乙酉绝粒死，年六十有一。"五是伍绍棠《长物志跋》说："殉节死。"六是民国《吴县志》说："寓阳城，忧愤发病死。"七是陈植综合诸说："明弘光二年（1645）五月，清兵攻陷南京，六月攻占苏州城，他避地阳澄湖畔，

闻剃发令下，投河自杀，家人虽将其救起，但终于绝食六日，呕血而死。”（《明末文震亨氏的造园学说》）

文震亨自尽后，他的儿子文果带着崇祯帝的御赐诗逃出苏州。叶奕苞《经锄堂集》卷二有《文果十笏庵拜观崇祯皇帝御书》，诗云：“一自苏台走麋鹿，十口伶仃身窜逐。可怜车厩废平津，何有牙签与玉轴。蒙恩感激负之趋，百死一生少坦途。与君拜观疑在梦，摩挲双眼泪俱枯。”网上搜检了一下，发现仅征有十笏庵，不知是耶否耶。按诗意，好像叶奕苞和文果一起逃难，一起观看崇祯帝的诗联，否则文字不会这样细腻清晰。

叶奕苞此人要表一表，他是明末清初昆山戏曲家、金石学家和方志学者。他虽为诸生，但学问极好。他怀有很深的遗民情结，他写的《经锄堂集》，乾隆朝被列为禁书。他还有一位堂哥叶方蔼，乃顺治十六年（1659）一甲三名进士，也就是奏销案中“探花不值一文钱”的主人公。

文果后来当了和尚，法名轮庵。文果是秀才出身，文果以后，苏州文家就湮没无闻了。文家祖上自文洪成化元年（1465）中举，诗书传家，历两百年，至明清易代之际，家门凌替，子孙堕为社会下层，茫茫人海，不知所终。这是魏嘉瓒先生写苏州文氏得出的结论，十分感人。

文震亨写的《长物志》，至今广泛流传，书分述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共十二卷。取这书名，是因为文震亨认为此类“小小闲事长物，将来有滥觞而不可知者，聊以是编堤防之”（沈春泽《长物志序》）当享受精致生活成为一种时尚时，普及和提升这一文化素养的著作因运而生，其中不乏精品，如董其昌的《筠轩清秘录》，李渔的《闲情偶寄》等。文震

亨长年从事书画创作，具有很高的审美、收藏、鉴赏能力，如他在《长物志》中阐述的园林建筑设计、布置陈设的一些见解和趣味，高人一等，奕奕自有一种隽气。至今，文氏故园“艺圃”之所以被专家学者啧啧称赞，源于文震孟、文震亨兄弟的造园思想在其中得到充分的展示，它以飘逸清雅的文人气息，在苏州园林中别树一帜。

文衙前的文氏旧园终究荒废了。明末清初，此园被山东莱阳人姜埰购得。其中因果，大可一说。

姜埰，字如农。他是崇祯四年(1631)进士，做过密云知县，后迁仪征。仪征产盐，巡盐御史照例把发证、验收之类的杂事都交地方官管理，因此在仪征当知县，是个肥缺。盐商也从盈利中拨出一块来孝敬上官，但姜埰从来不收受，并厉声斥去。故姜埰为官，声誉不错，十年后升礼部给事中。姜埰此人，在言官这个位置上，因曾与崇祯帝有过一段相当激烈的对抗，因而《明史》便有其传。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崇祯十四年(1641)，在东林党运作下，周延儒再登首辅高位，确实也做了一些好事，譬如，凡兵残岁荒之地，减当年两税；苏松常嘉湖遭水灾，同意用明年的夏麦代漕粮；增加生员的录取名额；召还被贬谪的言官；一批具有声望的官员登上重要岗位；给已故的文震孟、姚希孟等，追授官职等，获得朝野的一片喝彩。

周延儒起用了一批所谓清流人物，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有贤士大夫，也有不肖之徒，于是朝论蜂起。得不到推荐提拔的官员心有怨恨，称周延儒看中的二十四位官员，为二十四气，如与苏州有关的几个人，吴伟业为望气，徐汧为油气，瞿式耜为秽气，其实是心中有气。对这种无稽之谈，崇祯帝并不在意，为此发布戒谕，希望臣下同心同德。姜埰不知，以为崇祯帝先入为主，于是仓促上疏，指责崇祯


明禮科給事中私謚貞毅先生姜公埰
直言極諫
嚴氣正性
薶骨敬亭
不忘君命

帝怎么怎么，其实崇祯帝正信任周延儒，曾说过“朕以天下听先生”，并不为“二十四气”这种谣言所动。然后崇祯帝被姜埰冤枉，心中十分恼火，以“诘问诏旨、藐玩特甚”的罪名，将他打入诏狱。

从事情的前因后果来看，倒是姜埰错在先，引起崇祯帝采取极端手段。姜埰下狱后，崇祯帝下密旨，命锦衣卫帅骆养性秘密杀之，但骆养性不敢奉诏。后姜埰受廷杖一百，打得皮开肉绽，昏死过去，其弟姜垓用一泡尿，将他灌醒，直吃了不少苦头。按理，廷杖后，处罚结束，这段官司算是了了。但姜埰依然被关进牢里，可见崇祯帝对他恨之入骨。崇祯十五年（1642），京城里发生瘟疫，刑部大牢的犯人允许取保回家，姜埰出狱后，大宴宾客，被人打小报告，又被关了进去。崇祯十六年（1643），清兵略山东，姜埰家乡莱阳被破，父亲殉难，全家死了二十馀口。弟弟姜垓是行人司行人，疏请代兄坐牢，让哥哥姜埰回家归葬，崇祯帝不准。姜垓无奈，只好只身赶去老家，料理好后事后，与老娘一起投奔苏州。

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京城形势日见吃紧。姜埰终于被释放，发配宣州卫。犯人尚在路上，崇祯帝就已吊死煤山。福王在南京立国，赦免了姜埰的罪名，并官复原职。但姜埰死了父亲，重孝在身，丁父艰，没有上任，与姜垓在苏州会合。先住在上津桥吴氏家，后移居山塘，再后来姜氏兄弟从周茂兰手中买下药圃。买药圃的事，与官居右庶子、充日讲官、在苏州闲住的徐汧有关。为什么？原来徐汧是姜垓的房师，姜垓是徐汧的门下士。崇祯十三年（1640），徐汧分较礼部试，姜垓的卷子就是经徐汧阅卷荐为进士的。

徐汧是海内著名的清流人物。天启五年（1625），魏大中被逮过苏州，徐汧筹了一笔钱送给他作盘缠。周顺昌被逮时，缇骑横索钱财，也是徐汧和杨廷枢合力筹款操办的。故徐杨两位名闻天下。

却说文震孟的长子文秉，明亡后，不想进城，隐居在天池山竺坞老宅，文衙弄药圃因无人居住而日渐荒落，于是交文震亨的儿女亲家周茂兰管理，周茂兰是周顺昌的儿子。周徐两家有非常之谊，姜埰、姜垓两兄弟要买药圃，自然十分顺当。这桩房产交易时，徐汧是不是尚在世上，有点说不清。因为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南京被清兵铁骑攻克的消息传到苏州，徐汧跳虎丘新塘桥殉节。

但姜垓与徐枋之间也甚为相得。

姜垓到苏州后，衣食无定，因为阮大铖出任南明弘光帝的兵部侍郎后，一直在追捕他。姜垓不得不变姓名，时时逃匿，处处隐居，甚至远避宁波。《御选明诗》收姜垓《法螺庵秋居同徐枋作》一首，诗云："寂寞重阳后，秋林晚更花。月高沙宿雁，风劲树翻鸦。卷幔丹梯远，悬灯竹院斜。定知愁病日，坐稳胜还家。"诗作于崇祯十七年（1644）秋，时崇祯帝已死，弘光小朝廷在南京宣布接管政权，阮大铖正在耀武扬威之时。姜垓却正东避西躲，大概有点惶恐不安。从诗题来看，他与徐枋在一起，地点是法螺庵。我疑心这地方可能就是赵宧光寒山别墅故地的法螺寺，那是非常僻静的地方。一查，果然。赵宧光出资修建时，叫法螺寺，后改名法螺庵，又名空空庵。

弘光小朝廷是短寿的。到第二年的四月底，史可法扬州失守，五月十一日，福王逃出南京。南京老百姓气昏，先一把火将马士英父子的房子烧了，接着烧了阮大铖。阮大铖家里养着不少歌姬，一时星散，走得精光。这时，姜垓已不需要东躲西藏了，他不仅不逃，而且在南京作烟花之行，他要放松放松自己了。余怀《板桥杂记》说："莱阳姜如须，游于李十娘家，渔于色，昵不出户。"明末的南京妓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东林巨子，复社名流，都是青楼的嘉宾，旧院的贵客。政治上失意的萧瑟心情，在这里寻求温柔的抚慰；安邦

定国的锦绣文章，换成耳鬓厮磨的浅斟低唱。“福慧儿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明朝人在这件事上，可一点也不含糊的，可爱得很。

为什么姜阮之间会发生这番恩怨，首先当然是政治分歧，他们是两路人。其次发生在一个小小的接触点上。姜垓中进士后，分配在行人司。行人司这个衙门很冷僻，也很小，编制四十人，职能是皇帝的跑腿，所以叫行人。大凡颁布诏书、册封宗室、宣抚外邦，乃至赏赐、慰问、赈济、祭祀，都属于他们的差使。衙门虽小，却具有钦差性质，没有圣旨不得派遣。行人司的品级虽然不高，一把手也仅七品，但行人司的官员，都是进士出身，非常特别。在明朝官场上，行人司是个受人尊敬的衙门。

姜垓分配到行人司后，发现官署中的题名碑上，有阉党崔呈秀、阮大铖的名字与魏大中并列，立请削去这两人姓名。姜垓的原疏，笔者没有查到，崔呈秀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授行人，却查到了。但崔阮两人是崇祯帝钦定的逆案中人。崔呈秀是首逆魏忠贤同谋，第一等大罪，死罪；阮大铖为交结近侍又次等，依律三年徒刑，不得为官。从历史观点来看，崔阮两人做过行人司行人，其名字镌刻在题名碑上，也无不妨。但从政治观点上看，就难以接受，这种心态，不仅中国人有，外国人也这样，不足为怪。

阮大铖听说此事后，十分不快。此公长期受压抑，受奚落，报复的心思很重，是个政治畸形儿，或曰政治变态。复社诸生顾杲等一百四十人揭帖攻讦他，他个个想杀。最后，这一百四十人，有的杀身以成仁，有的隐居以求志，但活得都心惊肉跳。因此，阮大铖要将姜垓置于死地而后快。姜垓寿命不长，顺治十年（1653）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九岁，门人私谥贞文先生。

姜埰因为错怪崇祯帝，至死对他心怀歉疚。他从北京回来后，

明行人司私謚貞文先生姜公垓

萊陽二姜
弟寬從兄
友恭之誼
百世同傾

就披上僧袍，当了和尚，法名智潜，号壹志。在自己经营的园子里，特地造了一间房子，就叫敬亭山房，还刻了一方印，文曰“宣州老兵”，念念不忘自己尚是充军发配的身份。姜埰寿长，在药圃生活了将近三十年。康熙十二年（1673）临终时，关照儿子安节、实节说：“敬亭山，是我发配的地方。这是先皇帝下的命令，我依然是一个囚犯啊。我死后，一定要把我葬在宣城敬亭山下。”据《大清一统志》记载，姜埰墓确实在宣城县北敬亭山。

姜埰留下《赴戍宣州卫》一诗，写得十分沉重，诗曰：“垂死承恩遣，天威咫尺间。荷戈荒徼去，收骨瘴江还。衮职犹思补，龙颜竟绝攀。桥陵千滴泪，独在敬亭山。”姜埰的所作所为，在当时感动了中国。黄宗羲称赞他“可谓仁之尽义之至也”。江苏巡抚汤斌为姜氏兄弟立祠于虎丘古鹤涧，称莱阳二姜先生祠。

陆肯堂　陆润庠　陆嵩　陆懋修
附记：陈元龙　黄梦麟　归允肃　张之洞

阊门内下塘10号，是清康熙间陆肯堂故居。

陆肯堂，字邃升、邃深，一字澹成。顺治七年(1650)生，康熙三十五年(1696)因病云世，年仅四十七岁。读了陆肯堂的履历，惟一感受是健康是多么重要。他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会元、状元，这是非常荣耀的。康熙帝继统以来，苏州的文运起了一波小高潮。在陆肯堂之前，苏州已经有两名会元连捷状元了，一是康熙九年(1670)的韩菼，一是康熙十二年(1673)的彭定求。乾隆以后，大清朝仅有两人超过他们，一是桂林的陈继昌，一是苏州的钱棨，他们不仅是会状，而且是乡试解元。但陆肯堂这个状元，有点特殊。按照清初的规矩，三月会试，四月发榜，五月初殿试。殿试后三日，皇帝亲临中和殿，由读卷官依次读卷，卷子读好，由皇帝钦定名次。但读卷有个大毛病，有方言口音的差异，有朗读能力的差异，读的本身就是创作。读得好，往往高第；读得不好，名落孙山。康熙二十四年(1685)乙丑科，这个老办法被改了，命将前十名卷子拟好名次，

贴好黄签书进呈，然后由皇上调整前后。此前，陆肯堂的会试卷子康熙帝看过，御批曰："朕未习时文，览其大概，此卷时文格局醇正，二场工稳，三场议论好。犹恐未妥，卿等细加斟酌。"虽然话说得谦虚，但已经有旨意了，当然钦定陆肯堂为会元。只要殿试不出差错，这个状元就是陆肯堂的了。都说状元是天子门生，陆肯堂这个门生是货真价实钦定的。有了康熙帝这句话，陆肯堂的前途不可估量。

陆肯堂是清代第十八位状元。其先祖世居浙江平湖，传说经营丝绸生意的。明代时，有位祖先从平湖迁居归安双林镇。据《吴郡陆氏世谱》记载，双林陆氏的子孙分为两支，一支到了桃花坞，后迁到齐门外；另一支由浒墅关迁到都亭里下塘。都亭里下塘这一脉就是陆肯堂的祖先。陆肯堂祖父叫陆延楫，学历是庠生。陆肯堂父亲陆衮，字山补，张伯行《翰林侍读陆公肯堂墓表》说他"性倜傥，多大略"，大概是个性格豪爽又不乏计谋的人，这样的描述，倒很像是生意场上人。他们两人都没有实现读书做官的理想。

陆肯堂是家中独子，自小悟性极好，又很勤奋，有"日诵数千言，耳目所接，一过不复忘"的超强记忆力。由于读书多，思路敏捷，写文章出手快，"为文信笔而成"。有人形容说，陆肯堂的文思，就像万斛之泉，按都按不住。他二十岁时，补为博士弟子员，这是借用汉朝的古称，其实就是补为县学的学生，有一件蓝衫可穿，俗称秀才，也算有了功名。二十七岁时，选为岁贡，岁贡是五贡之一，身份比举人低一档，比秀才高二档，可以直接参加乡试，至三十一岁中举。从他科举的经历看，不算特别的快，还说不上少年得志。但陆肯堂中举的档次很高，属于前五名，又称"五经魁"。明代乡试要考五经，五经即《诗经》、《周易》、《尚书》、《礼记》、《春秋》五大专业，考生可以任选一项，如唐寅选考的就是《诗经》。清初沿袭明制，也考五经，后来

改了，但康熙时代依然沿用明朝的老办法。因此，陆肯堂的荣膺五经魁，其实是某单项的第一名。究竟是那一项，不得而知了。陆肯堂中举后，一发而不可制，仅过了四年，就于三十五岁时高中状元，勤奋和运气，都达到了极致。

康熙二十四年（1685）会试，还有一项重大变化，首场考试考四书的试题，由康熙帝亲自命题，一是“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出自《论语·颜渊第十二》）；二是“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出自《中庸·右第二十九章》）；三是“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出自《孟子·尽心章句下》）。康熙帝还说，今后顺天乡试的四书命题，也由他来出。他自己出的题目，肯定很有心得，评定文章的优劣高下，也就会更有感觉。

这一科的榜眼是陈元龙，探花是黄梦麟。这两个人物，顺便介绍一下，也很有意思的。

陈元龙，字乾斋，浙江海宁盐官人，以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做皇帝的秘书，次年充日讲起居注官，是为皇帝的辅导老师兼史官，不久被弹劾而罢官。康熙三十年（1691）复任，曾随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巡幸塞北江南。随后一路顺风，康熙五十年（1711），广西巡抚。五十七年（1718），工部尚书转礼部尚书。胤禛即位，对父皇喜欢的重臣明褒暗降，命陈元龙奉守景陵（康熙帝陵墓），陈元龙当然不乐意。为此，雍正帝还特下一旨，写得很滑稽，假戏真做，旨曰：“陈元龙系年老一品大员，朕念景陵紧要重地，特行遣往，伊当乐于行走，乃反不乐往，若似罪谪者，到处怨望。此等之人，虽加恩亦不知感，其应得封典荫生，俱不必给。”雍

正七年(1729),再玩了一次猫捉老鼠,授陈元龙为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身份相当于宰相,也就是俗称的“阁老”了。这时,陈元龙已年近八十。接着,雍正帝查出陈元龙在广西巡抚任内亏空二十一万二千两银子,责令他五年内赔偿。后来又查出这些亏空有账可查,都用在赈济灾民、兴修水利、广建谷仓上,而且都有上奏,经户部备案。因此下旨,恩免赔偿。雍正十一年(1733),终于同意陈元龙退休,而且还是“勉从其请”,为了表示皇上的宠爱,还加衔太子太傅,以原官致仕。但雍正帝不忘再踢一脚,命他的儿子、翰林院编修陈邦直一并退休,希望他“随归侍养”,理由说得很充分。

康熙帝对陈元龙十分宠信,四十四年(1705)南巡,曾到陈元龙家,陈家的爱日堂,也是康熙帝赐。后来乾隆帝继位,又一反雍正帝的做法,凡是康熙帝喜欢的大臣,他处处施恩。乾隆帝六次南巡,四次到海宁,住在陈家安澜园中。如今,安澜园已修复对外开放,前几年,笔者去过。作为康乾两位皇帝五次驻跸之地,安澜园给人的印象是静谧的,简朴的,谦恭的,值得一看。

陈家在海宁开有当铺,当炎炎夏日,贴出告示,凡抵押蚊帐的,当值在半铢至三铢者,免资本钱发还;到了大冬天,也参照蚊帐的办法,将当值不高的絮布衾袄发还,惠及穷人。陈元龙做官时,曾拿出俸金买田千亩,送给海宁县学。因此,海宁士绅都觉得陈家是善有善报。这两件事,被清初诗人、孔尚任的好友金埴记录在《不下带编》中。《不下带编》是部未刊稿,其手稿被明史专家谢国桢先生所收藏,于1980年交中华书局出版。

这一科探花黄梦麟,字观芝,号匏斋,康熙四年(1665)生,常州溧阳人。黄梦麟非常聪明,诗文在当时享有盛名。他做过会试同考官,与修《三朝国史》和《大清一统志》,与陈元龙一样,也是日讲起


皇清少詹事歸公允肅
公在朝廷
正人動色
置身青雲
盟心白日

居注官，是皇上的近臣。黄梦麟此人，对做官兴致不大，"孝友恬退，假归遂不复出"，本来是请假的，这一去就不来了。在清朝，不贪恋官位的大有人在，与今天的孜孜以求相比，那是大不一样的。

陆肯堂高中状元后，例授翰林院修撰，康熙二十六年（1687）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按照明朝以来的惯例，陆肯堂作为上一科的一甲一名，应该担任下一科的顺天乡试正考官，但这个成例被常熟的归允肃打破了，因为事先公布主考名字，容易出现科场舞弊。归允肃是康熙十八年（1679）状元，循例担任康熙二十年（1681）的顺天乡试正考官，他知道其中的流弊，就再三告诫同僚，要为国家选取真才，倘若营私利，通关节，将甘受妻孥戳辱之惨，必膺子孙灭绝之报。榜发，落第者大哗，几乎兴大狱。刑部尚书魏象枢带了红毡毯亲临归允肃门前行礼，庆幸国家得人，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但从此以后，新科殿撰主顺天乡试的老规矩，废止不用了。

陆肯堂在江西也干得不错，所得尽知名人士，时人皆称其公正严明。考试结束，陆肯堂特地拜谒了庐山的白鹿书院。这次拜谒，不仅仅是见识见识一所名校，而是另有意思。原来，就在去年，康熙帝赐白鹿书院御书《心经》一卷，以及《十三经》、《二十一史》各一部，书院特地新建了一座御书阁，既到江西，不顺便去看看，对皇上是大不敬了。陆肯堂参观书院后，留下了一首长诗，题目是《江西试事毕，过庐山白鹿洞，谒礼圣殿，敬瞻御笔"学达性天"匾额，复登御书阁，观颁贮经史，恭纪长歌》，诗题很长，其用意很明显，是写给皇上看的。

自从平息三藩之乱后，康熙帝似乎把大部分精力都投放在思想文化领域上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驾临曲阜，写了两方匾，一方"万世师表"，一方"学达性天"。"万世师表"一匾挂在大成殿上。

次年，又诏令“万世师表”四字颁行天下学宫。同时，全国各地的著名书院都受赐“学达性天”一匾，如长沙岳麓书院、徽州紫阳书院、宁远的濂书院、衡阳石鼓书院，以及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邵雍、朱熹的祠堂，还有朱熹的讲学处武夷精舍等。这时，大家明白了，康熙帝正在开展一场思想教化运动。私下里，大家都在议论康熙帝说过的一句话：“汉人难治。”

起初，康熙帝为政治需要，推崇程朱理学，尊朱熹为孔门十哲，一大批理学家被置身高位，如李光地，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魏象枢，刑部尚书；熊赐履，礼部尚书。程朱理学的理论家张伯行，也仕途顺畅，从江苏巡抚直做到礼部尚书。他与陆肯堂是同榜，比陆小一岁，其撰述有百种之多。陆肯堂被康熙称赞“学问好、人品也好”，当然也是杰出的理学家。只是他寿短，影响也小。康熙帝到中晚年时，已站稳脚跟，就觉得以前竭力吹捧程朱理学，有点做得过头了。如果满朝文武的精神楷模都是汉人，那皇帝干什么呢？他觉得，这世上，只有皇帝自己才是“以治天下国家之道，存之于心。”于是，看着熊赐履、汤斌、李光地等理学名臣都不顺眼了，还经常下旨骂一通。苏州人特有好感的汤斌，其个人修养，称“本朝理学名节第一”，去世前受到不公正待遇，被降七级留用。汤斌死了，康熙勉强同意以尚书的礼仪下葬，但谥号不给。此事一直到乾隆皇帝手里，才予以更正。乾隆元年，特谥“文正”。当然，这是后话了。

陆肯堂的品行世有公论，他“天性孝友，笃于仁义”，如抚养异母弟妹，使之成人。姊妹出嫁，他必定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如果女婿贫穷，力不能娶者，则扫馆迎之。对生活匮乏的宗室乡邻，时有调剂。因此，苏州人认为，他的德望才学无愧于状元的称号。当陆肯堂因病打算乞归乡里时，康熙帝遣内阁学士前来探视，又留在京治

病，不幸于三十五年(1696)死于任上。他著有《陆氏人物考》、《怀鸥舫诗存》等。张伯行为他写的《翰林侍读陆公肯堂墓表》，是研究陆肯堂的重要文献。

陆肯堂幼年，住在都亭里下塘。中状元后，在崇真宫桥下塘买了一处住宅。这两处下塘，其实是连在一起的，现在统称阊门内下塘。这座宅子规模宏大，分中、西、东三部，后门直通桃花坞。这座大宅子，后来为陆家子孙世居，陆润庠也住这里，于是就成了两代状元府。《苏州名人故居》称这座房子为怀鸥舫，其实不确，怀鸥舫仅是陆肯堂的斋馆。怀鸥舫落成时，陆肯堂招同人雅集为贺，查慎行也在邀请之列，他留下了一首诗《陆澹成侍讲新葺书斋名怀鸥舫，招同人雅集分赋》，诗云："江湖宛在小窗前，便欲从君借榻眠。梦作白鸥归未得，鲈乡亭外水如烟。"查慎行与陆肯堂同岁，但他出道晚，康熙三十二年(1693)方才中举，陆肯堂则已是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了。按理，查慎行与陆肯堂凑不到一起，但陆肯堂曾师从朱彝尊，而查慎行与朱彝尊是中表兄弟，他们之间的文字往来，可能就是这个缘故。查慎行后来在科举上一直不顺利，但名气甚大，康熙帝于四十二年(1703)赐他进士出身。这一年，陆肯堂长子陆秉鉴成进士，两人又成了同年。

据陆肯堂第十世孙陆咸先生介绍，陆肯堂对后代有三条遗训，一是"僧道无缘"，不做佛事，不做道场，和尚尼姑道士不得入门；二是不吃牛肉；三是不置田产。这三条，后代一直遵守着。这三条遗训，前两条比较容易理解。那个时代读书人信的是儒教，自然与"僧道无缘"。中国以农业立国，牛助人耕田，不应该吃牛肉。至于第三条，陆肯堂为什么不允许子孙后代买田呢？陆咸为此请教了几位前辈，得到的回答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买田就是与皇帝争利，很危险。

陆家子孙始终遵守着这条遗训，从康熙时代的陆肯堂到同治年间的陆润庠，陆家都不置田产。不置田产吃什么？读书做官是一条出路，另一条出路更淡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陆肯堂之后，陆家出了三代儒医，他们是陆文、陆嵩、陆懋修。

同治十三年（1874），阊门内下塘陆宅又出了一位状元陆润庠，他是清朝的第一百零一位状元。陆润庠与陆肯堂相隔五代一百九十七年。苏州科举盛行，但一门两状元的，就苏州古城而言，陆家之前，仅有葑门彭家。彭定求，康熙十五年（1676）状元；彭启丰，雍正五年（1727）状元，且都是会元兼状元。顾颉刚说："苏州状元之多，足见苏州地主家庭训练子弟适应科举制度之才能，其技术性在全国为最高。"科举制度，其实就是封建时代的应试教育。

陆润庠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字凤石，号云洒，元和人。祖父陆嵩，字希孙，号方山，是名贡生，游幕多年，任镇江府学训导。父亲陆懋修，字九芝，号江左下工、林屋山人，元和县廪生。道光年间，陆懋修夫妇随父亲寓居镇江府学，生下了陆润庠。

陆嵩见抱了孙子，十分高兴，因为生在镇江府学，于是就为孙子起名润庠，镇江古称润州，庠为学校。镇江府学内有宋代熊克的《凤石图赞》，陆嵩的书斋也叫凤石，于是以凤石为字。陆润庠读书很聪明，四岁时就能辨别四声。同治九年（1870），二十九岁的陆润庠成为元和县的优贡生。自同治三年（1864）起，仿照顺天乡试的办法，廷试优贡生，一等者可分省安排知县录用，二等者可安排教职录用，三等者可安排训导选用。每名优贡生，只准参加一次廷试。这个政策一推出，就受到优贡生的欢迎，相率赴京参加朝考。陆润庠也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录用为知县。这要作点说明，所谓录用，只是获得

候补知县的资格。按清朝科举考试的规矩，只有进士出身授为知县，即授即补，称为“老虎班”。优贡生资格的陆润庠自然得不到任命，但能获得参加考试的津贴。对学生和各级考试予以津贴，这是前清教育制度中特别可爱的地方。如陆润庠父亲陆懋修是元和县的廪生，全称廪膳生，由国家提供伙食补贴，每年四两银子，虽然不多，聊胜于无。另外，凡参加院试、府试、县试这类常规考试，以及书院的作文比赛，只要获得高分，都有一定的膏火费，类似奖金。这些措施，对成绩优秀的寒士是极大的帮助。

陆润庠的学习生涯就是靠这些零星小钱维持的，实在周转不灵时，才动用一点积蓄。最难熬的时光，应该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咸丰三年(1853)，洪秀全建都南京，他祖父的训导做不成了，避乱到青浦金泽镇，于咸丰十年(1860)去世。父亲每年四两银子的进账也没有了，但他懂岐黄之术，随父移居金泽后，在乡间行医，但这三指生涯又能挣回几个钱？陆润庠青年时代的清贫是可以想见的。

同治十一年(1872)，三十一岁的陆润庠上北京谋生，应聘为家庭教师，行李无着，向亲友处借贷，十叩柴扉九不开，饱尝了人间冷暖。北京这家人家极好，劝陆润庠参加顺天乡试，并愿意资助。这里要补叙一下，按陆润庠的籍贯，只能在南京参加应天乡试，这是一条死规定，否则就是冒籍，而冒籍是一条大罪名，因为各省举人的名额是定数的，容不得别省的士子来占用。但顺天乡试不在此例，因为北京的官员多，家在北京，子弟也在北京读书，虽然不是北京籍贯，但也能参加顺天乡试。这样又不免侵犯本地子弟的利益，于是顺天乡试又规定，别省的乡试只产生一名解元，顺天乡试有两名解元。第一名解元一定是直隶省户籍，第二名解元取外省籍的人，为了有所区别，第二名解元称为“南元”。按照陆润庠的条件，他是元

和县的优贡，又考中了候补知县，具备了官员身份，应该可以报考顺天乡试。另外，顺天乡试录取的名额多，也吸引南方士子去北京碰碰运气，譬如南通状元张謇，参加江南乡试多次，都不中，于是就捐了监生应顺天乡试，结果得中南元。

三十一岁的陆润庠，本是苦滋滋地到北京去谋生，想不到发生了人生的大转折。他三十二岁中举，三十三岁大魁天下，比他的七世祖陆肯堂中状元还小了两岁，真是喜从天降。《姑苏小志》对陆润庠状元喜报到苏州，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泥金报到崇真宫桥旧宅，状元夫人某氏正携米箩菜篮在河边淘米洗菜也，惊喜发狂，堕入河中，渔船救起。三县知事已拱立道旁，口称状元夫人，以彩舆恭迎往藩署中小住，旧宅则督饬工匠修理。封翁（指陆懋修）适往木渎镇看病去，巡抚吴公放船往寻迓矣。亲友咸集都亭桥，途为之塞，争馈财物，世态炎凉如同戏剧。"

陆润庠考中状元，当时有个传说。说是当时上呈请慈禧御批的名单上，内定状元本是另外一个人，但此人字写得差，慈禧看了不舒服，翻到陆润庠的卷子，一手馆阁体写得工稳端庄、雍容有度，就点陆润庠做了状元。这个传说未必有根据，但流传很广，以致后来陆润庠以书家著名。他在苏州留下的墨迹较多，今拙政园里十八曼陀罗花馆的堂额，款署"陆润庠书于鄙寓小怀鸥舫"，又为远香堂撰的五十二字长联，联云："旧雨集名园，风前煮茗，琴酒留题，诸公回望燕云，应喜清游同茂苑；德星临吴会，花外停旌，桑麻闲课，笑我徒寻鸿雪，竟无佳句续梅村。"一说联为临安朱福清撰，陆润庠书，旧联已毁，今存者为萧娴补书。留园五峰仙馆的五十八字长联，比远香堂联更胜一筹，联云："读书取正，读易取变，读骚取幽，读庄取达，读汉文取坚，最有味卷中岁月；与菊同野，与梅同疏，与莲同洁，与兰

同芳,与海棠同韵,定自称花里神仙。”虎丘月驾轩一联,也非同一般,当称高人手笔,联曰:“在山泉清,出山泉浊;陆居非屋,水居非舟。”哲理味很浓,读来不觉令人思索一番。

陆润庠一生,做了四十年的官。翻开它的传,全是官衔。他是同治十三年(1873)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这一年,同治帝就死了。因此,陆润庠的官宦活动全在光绪、宣统间,他是眼睁睁地看着这幢大厦慢慢地倾倒的。一般来说,从一名状元慢慢历练,最终进入权力中心,至少需要十年光景,洪钧就是这样。但陆润庠的升迁明显滞后,光绪初年,他以翰林院修撰的身份典湖南、陕西乡试。光绪八年(1882),入值南书房,擢为翰林院侍读,出为山东学政。光绪十三年(1887),丁父忧。光绪十八年(1892),服阕,升任国子监祭酒,典试江西。光绪二十年(1894),又以母疾,请假归养。这一蹉跎,二十年光景过去了,官仅从四品。但这回,陆润庠在苏州没白呆。光绪二十四年(1898)从苏州回到北京,就擢为内阁学士,署理工部侍郎。

给陆润庠好运的,是他在苏州期间,负责筹建了苏纶纺纱局和苏经纺丝局。

甲午战争结束,签订“马关条约”,除割让台湾、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外,还将苏州青旸地租借给日本。消息传到苏州后,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张之洞急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国工商生计从此尽矣。”他警告说,日本先进的工业技术,将彻底破坏中国经济的整体性,尤其会给苏州带来莫大的灾难。要求立即投资建设现代化的丝织工厂,强固苏州经济,以利于与苏州的日本工厂竞争。光绪帝同意了张之洞的想法,并要求各地尽快制定“马关条约”以后的补救办法。张之洞得到光绪帝上谕后,强制挪用苏州商家为甲午战争集资的战争军费,共计六十万两,加上地方财政的二十三万两,

成立了苏州商务局苏经苏纶股份有限公司。筹建苏纶纺纱局和苏经纺丝局,共花了一百万两,它的设备是当时最先进的,由英国道勃生公司1896年生产的全套纺纱机器。具体操作这项事宜的总办苏州商务,就是在家养亲的前国子监祭酒陆润庠。

建厂初期,当然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因此,陆润庠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协调集资商家六十万两的利息和他们的情绪,二是保证棉纱质量和经济效益。但这时张之洞调走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上谕:"刘坤一着回两江总督本任,张之洞着回湖广总督本任。"刘坤一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上奏说,集资商家中,"有请给还借款,不愿入股者;亦有请收还借款,自行集股纺纱缫丝,不愿由商务局转借者"。反正投资者不相信官商能赚钱。到六月二十八日,刘坤一上奏中有"经办绅士陆润庠一力肩持,不辞劳怨"诸语,可见张之洞离任后,陆润庠的安抚协调工作是做得到位的。关于产品质量,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十八日《官书局汇报》说:"该绅(指陆润庠)将两厂事宜悉心筹划,次第经营,得以逐渐就绪,所出丝纱,足与上海有名厂相埒。"官商双方对陆润庠都是满意的。一年后,陆润庠丁忧后调京,立刻升迁为内阁学士,署理工部侍郎,从二品。

接着,陆润庠又抓住一次机会,终于使陆润庠在晚清政坛上处于不败之地。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和光绪帝避到西安。当时,陆润庠正主讲上海蕊珠书院,闻讯后,驱车三千里赶赴西安行在。这次,陆润庠不再是署理了,立授礼部右侍郎,充经筵讲官,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成为从一品的大员了。从西安回来,更是风光,因随从两宫扈跸有功,赏穿黄马褂,赐紫禁城骑马,赏穿戴素貂褂。终光绪朝,任吏部尚书,参预政务大臣。至宣统元

年(1909),授协办大学士,转体仁阁大学士。消息传出,在京的苏州人聚集长元吴会馆宴请陆润庠,厅堂中央高悬"状元宰相"牌匾,盛况空前。这是陆润庠一生最为荣耀的时候,他实现了一个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从状元到宰相。明年,进东阁大学士。辛亥革命后,溥仪赏他太保衔,戴双眼花翎。这些都是前清官阶的最高荣誉,他都得到了。因此,清朝灭亡,他是口眼不闭的,"忧郁内结于胸而外不露。"临死前,他"竟日危坐,瞑目不言,亦不食,数日而逝",是在1915年6月16日。他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是长达七百九十一卷的《德宗景皇帝实录稿本》。陆氏后人在石幢弄缸甏河头为他建了一所祠堂,春秋祭祀。

最后,将陆润庠的祖父陆嵩、父亲陆懋修再补述几句。

陆嵩是镇江府学训导,训导是府、县教职中级别最低的一档,清贫闲散而薪水微薄。但陆嵩并非儒弱的书呆子。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英军进入长江,两江总督牛鉴闻风逃遁,镇江陷落,陆嵩召集江洲子弟,抗击英军侵略者,随同清军收复了镇江城。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逼近镇江,陆嵩又召集南乡九十九个村的义民,设法保护逃难到乡下的镇江难民,使老稚妇女皆得晏然忘流离之苦。此后,陆嵩为避战乱,带着全家移居青浦金泽镇,以行医为生计。过去的知识分子,在钻研四书五经的同时,也会接触一些医药著作,能开开方子,不算绝活。一旦在科举的路上走不通,便可转而行医为生。陆润庠祖上陆文、陆嵩、陆懋修三代,在科举上都不出线,于是愈加钻研医道,这也是时势造成的。加之陆润庠中了状元后,将三人的医书整理刊印,于是就有三代儒医之说。

陆懋修,年轻时也试图在科举上有所出息,由县廪生而恩贡生,

再跨一步,就是举人了,但终困踬场屋,于是弃儒从医。他师从海门袁雪斋及他的外祖父王朴庄。王朴庄,名丙,唯亭人,乾隆间的吴中名医,伤寒专家。陆润庠考中状元后,陆懋修常年住在北京从事医学研究,长达三十馀年,至老不倦。他的《世补斋医书》正集三十三卷,刊于光绪十年(1884);他校勘的续集二十五卷,由陆润庠刊于宣统二年(1910)。1999年,北京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了《陆懋修医学全书》,共四十馀万字。陆懋修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另一贡献,就是用训诂、考据等方法来研究中国医学经典,著有《内经难字音义》等,乃是儒医兼通的代表作。

谢家福　谢元庆　谢庭芝　谢安生
附记：潘曾沂　余治　柳商贤　金楷理

谢家福，生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字绥之，号望炊，吴县人。同治七年（1868）才补为苏州府学博士弟子员，时年已二十一岁了。怎么说，也不算早了。这只能怨时势不好。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咸丰、同治年间度过的。咸丰三年（1858），他六岁时，太平军建都南京，江南大乱。咸丰帝下诏，南方八省科举全停，这一停连停了四届，耽搁了读书人十二年光阴，这是江南士子的厄运。

咸丰十年（1860），谢家福十四岁，太平军占领苏州。谢景宣等《绥之府君行状》说："府君羁于贼，越二旬馀，得脱出阊门，遇先大夫于众安桥，迎先祖母于乡，避居黄埭。"他成了太平军的俘虏，被关押了二十来天，好不容易从阊门逃脱，在众安桥找到父亲，再逃难到黄埭。父亲遭此惊吓，郁愤成疾，死在乡下。没办法，求助亲友，总算将父亲葬回跨塘高浜祖茔。翌年，随祖母流泊上海，靠祖母做针线生活。

谢家福父亲谢元庆，字蕙庭。同治《苏州府志》记道："道光中，

吴门以好善乐施著声远近者，首功甫，次蕙庭。"蕙庭就是谢元庆。功甫是潘曾沂。潘曾沂人称潘大少爷，是四朝元老、状元宰相潘世恩长子。他嘉庆二十一年（1816）中举人，报捐内阁中书，并于道光元年（1821）赴京上任。但他不乐意这种低级官吏的生活，做到道光四年（1824），就借口照顾祖父而请假回籍，从此绝意仕途。居乡二十馀年，行善不倦。他咸丰二年（1852）病逝时，各色人等都赶来为他哭灵，无愧是苏州著名的"大善人"。潘曾沂在北京为官时，曾组织挚友成立宣南诗社。他住在宣南坊，这个诗社就是以他家命名的。林则徐是宣南诗社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潘曾沂的密友。林则徐丁忧后两次上京，都在苏州逗留，与潘曾沂会晤。道光二十年（1840），林则徐长子林汝周还暂住苏州，很可能就住在钮家巷潘家。

谢元庆和潘曾沂同为苏州慈善界的头面人物，他们还是亲戚，《绥之府君行状》称是"中表昆弟行"。谢元庆是一代名医，著有《良方集腋》，顾名思义，是他收集整理的应验良方，书刊道光二十二年（1842），对穷乡僻壤的人来说，可以自选方药，十分方便。咸丰二年（1852）再版，又增加了一些内容，易名为《良方集腋合璧》，在光绪年间又多次重刊，很受欢迎。199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还因它的实用性，点校出版了这部著作，薄薄一册，定价二元八角五分。

谢元庆作为仅次于潘曾沂的慈善家，手上应该有几个钱的，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他在苏州有专门的诊所兼住房，叫志德堂。潘曾沂收养弃婴，有的寄育在谢元庆家，可见谢家是有点规模的。他本是走方郎中出身，潘曾沂有一联赠他。云："一生行脚衲，斯世走方医。"赞扬他为慈善事业而奔走，也有点调侃他的意思。据《孟蒔谱刻稿》记载，"道光己酉，吴中涝，元庆稽贫户于城内外，得四百馀户，计口给米，月斗五升，鳏寡孤独加钱五百，名门寒士及废疾者，米

如数,钱倍之,婚丧习业别有助。……平时禁淫书,创乡约,恤产保婴,设局收废盲,担粥食饿丐,善举未易悉数。尤喜担药囊米卷,仆仆委巷间,救人贫病”。故潘曾沂说他是“行脚衲”、“走方医”,一点不错。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占领苏州,有事了。

谢元庆是慈善家,又是医生,是战乱时最紧缺的人才,因此而为太平军所用,也是情理之中。余治《谢君蕙庭传》云:“庚申四月,贼陷省城,尚寓志德堂赈给贫民,贼欲给公, ……公于义不可,遂遁居黄埭。”按庚申,即咸丰十年。省城即苏州,江苏三大宪,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均驻苏州,是为省府。柳商贤《谢君蕙庭传》云:“庚申四月,省垣不守,君以赈故陷贼中,后逸出。”谢家福《行述》自然也说到了这事:“庚申年四月,贼氛渐逼, ……比城陷,尚寓志德堂赈给贫民,不遑迁避,致及于难。出堂匿陈叟家,贼欲杀陈,府君德陈留养,请身代,贼义而两释之。后因救缢,为贼见,欲给府君治收埋事,府君义不可,冒死夜遁”。故《绥之府君行状》说的“府君羁于贼,越二旬馀”,可以读懂了。谢家福一个十四岁的小屁孩,有什么值得羁的?其实被羁的并不是谢家福,而是他的父亲谢元庆。他是有名的慈善家,处置尸体的事,他是专家。另外,他是医生,又是军队的急需人才。因此,谢元庆很值得太平军看护着,防他逃走。

谢元庆在太平军中做了些什么?没人知晓。只是根据当时情况,无非是治病收尸之类的事。一百多年过去了,又有谁能知道。想不到1966年7月,沧浪区房屋修建工人在翻修吴衙场42号老宅时,从第三进大厅正中匾额上方的翻轩重檐隔层内,发现了一件外裹丝绵的黄纸包,内有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1863)三月至五月军中文件三十三件,其中包括一张治疗皮肤病所用的处方。这张处方

与谢元庆《良方集腋合璧》记载的一方，仅一味之差，参照谢元庆曾在太平军中羁縻二十多天的经历，很可能就是谢元庆的手笔。因为谢元庆是名医，他治好了这位将官的皮肤病，或正在治疗之中，都可能出现处方被珍藏的情况。这位将官是谁？是“太平天国开朝勋臣、见天天军主将、佽天义吴习玖”。

谢元庆后来终于逃出苏州城，到了黄埭，《绥之府君行状》只说：“先大父蒿目时艰，遭家惨变，愤郁成疾。”对他曾参与了太平军医疗事务只字未提，潘曾莹《谢君蕙庭家传》对此事也不提及，显然是有所忌讳。太平天国失败后，在记载到亲友与太平军的瓜葛时，必然多方掩饰，这是基于一种自我保护，非常可以理解。

余治和柳商贤曾经为谢元庆写《谢君蕙庭传》，对此两人，要补上一笔。

余治，无锡人，字翼廷，号莲村，又号晦斋、寄云山人，晚署木锋先生。五应乡试不中，同治五年（1866）充广方言馆监督，十三年(1874)病卒于苏州，门人私谥孝惠先生。其著作繁富，有《尊小学斋集》等。余治长谢家福三十八岁，曾两度为其师，一次是在其童年时代，《绥之府君行状》称其“髫龄奉先大父命，问业于余莲村先生讳治”，另一次是在广方言馆。

柳商贤，吴县横金人，字质卿，号蘧庵。曾师从冯桂芬。同治九年（1870）举人，官浙江宁海知县。卸任后，购得木渎遂初园，但没住多久，就去世了。宁海士绅为他请祀名臣祠，可见官声不错。柳商贤著有《蘧庵诗钞》、《蘧庵文钞》等，所辑《横金志》为苏州地方名志。

谢家福于同治七年（1868）补为博士弟子员后，人生居然从此

就顺畅起来了。同治八年(1869)应聘为江苏舆图局职员,董理江北舆图。他进入舆图局,使他大开眼界,后来负责分校各国舆图,使他萌生了学习外语的冲动,他觉得中外交涉,纷纭沓起,而应对这种变化,需要自己有才干。主意拿定,当年就报考了上海广方言馆。这是一所由江苏巡抚李鸿章于同治二年(1863)奏准开办,冯桂芬出任院监的外国语学校,办学经费由江苏海关支付。按照招生简章,年龄本限定十四岁以下,但因为无人报考,始放宽到二十岁以下。谢家福二十四岁入学,也算是异数了。我疑心谢家福能超龄入学,与余治的暗中帮衬大有关系,余治是他的启蒙师,又是广方言馆的监督,是可以助一臂之力的。广方言馆待遇优厚,免费住宿,每天发给一钱银子的伙食费,一月就是三两银子,另加膏火费每月半两银子。这样的收入,大致可以养活八口之家,但依然没人报考。当时读书人,把科举考试视为正途,而凡与西洋两字有关的,均属"旁门左道",为人所不齿。哪怕是当钦差,出洋当外交官,也被视为畏途。

谢家福进广方言馆是在同治十年(1871),这时的广方言馆已划归江南制造局管理,他的老师是江南制造局译员、德籍美国人金楷理。金楷理是晚清中国外交界的传奇式人物,他本是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同治五年(1866)来华,先到宁波,后在杭州。但他传教活动很不爽,新设的布道所常常被仇恨洋人的中国人摧毁,心灰意乱的金楷理就选择到上海,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并受聘在广方言馆教授外语。

李鸿章选聘外国教习真舍得花钱,广方言馆聘用两名西籍老师,年薪一千五百两银子。但这个报酬也未必很离谱,光绪三十年(1904),端方当江苏巡抚的时候,包天笑应聘为山东青州府中学堂的监督,月薪白银五十两,恰恰是一只大元宝,搅得包天笑心中窃

喜。李鸿章用金楷理真是用对了，他至少懂四种语言，母语德语及英语、拉丁语和汉语，这是因为西方教廷非常注重传教士的语言养成能力。金楷理翻译西书，需要与中国同事合作。由他口述成蹩脚汉语，然后由中国同事将这蹩脚汉语整理成符合中国知识分子阅读习惯的书面语。晚清翻译界，都是这么干的。金楷理在广方言馆的职务是德语教授，因此谢家福至少应该懂点德语的。金楷理后来时来运转，先是为上海兵备道通事，后又随徐景澄出使法、德、意、荷、奥等国，并升任中国驻柏林和圣彼得堡使馆参赞，成为晚清外交的正式在编官员。金楷理在处理外交事务中处处护着中国政府，令德国政府对他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因为他是德籍美国人。中国的驻外官员对金楷理的工作都十分认可，光绪二年（1876），清政府授予金楷理四品衔。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金楷理已是二品衔总领事级外交官。他与华蘅芳、李凤苞等江南制造局同仁合译的《绘地法原》、《海战指要》、《西国近事汇编》等，不仅是晚清外交的重要参考书，而且是畅销书。

有这样的人物当老师，既是一种资本，也是一种骄傲。广方言馆毕业后，谢家福被上海道冯焌光委派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做口译笔录，他有《交涉新案》、《通商简要》、《兵事纪略》等七部译著，其中《和约汇钞》经朋友推荐录副印行。

光绪二年（1876）后，谢家福即以民间身份投身于赈灾慈善实业。光绪三年（1877）的山东大饥，四年（1878）的河南旱灾，五年（1879）的山西旱灾，六年（1880）的直隶水灾，八年（1882）的安徽水灾，九年（1883）的直隶、山东告灾，十三年（1887）的河南郑州决口，十五年（1889）的苏州七县水灾，十九年（1893）的山西告灾，次次勘灾，无役不从。最多的一次掩埋骸骨一万二千具，最多的一次

捐银二百五十二万两有奇。光绪帝七次传旨嘉奖,恩准建造“乐善好施”坊。

苏州名门望族,历来有做善事的传统。譬如潘曾沂去世时,众人哭他,“今而后,缓急将谁告也?生谁为之养?死谁为之葬?孤而贫者谁为之择师而教督之也”?慈善家既管生,又管死,还管教育。但一般慈善家脱离不了自身活动的半径,仅仅在本乡本土经营,是地方上的善人,他们的救济和做善事,是从道德层面上出发的施舍。而谢家福不同,他做的是慈善事业,就不局限于在本乡本土,而是将赈灾救济活动扩展到整个中国北方。从本质上说,谢家福属于洋务派慈善家,他的身后,已经很少见到苏州绅士的身形,而积极参与运作、给予经济支撑的,是一批具备救国梦想的仁人志士,如李金镛、熊其英等。他救济的不仅仅是灾民的缺衣少食,而是大清的安危。谢家福奔波十几年,他的所作所为,与洋务救国的宗旨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谢家福反感人称他“大善人”,他说:“生平最恨人称善者,……区区心中但为中国保自主权,无所谓善事也。”如果说,潘曾沂等苏州绅士的慈善,是爱人爱家;那谢家福的慈善,是爱国。只是他的志向,难为人知,故自谓“食少事烦本不支,平生志意有谁知”(《九月二十四日待死述怀》)。

直隶总督李鸿章不断檄调谢家福赴直隶为官,但他均以母老多病而推辞。他是独子,少年时代很孤独,又遭遇寇乱,全仗着生母呵护,备尽艰苦。自从得了气喘病后,遂不复有仕进之心。光绪帝特赏他国子监学正,视同知府,又以知县补用,以直隶州同知补用,他都没接受。李鸿章委派的招商总局差使,他也辞了,只接受了会办上海电报局和苏州电报局。盛宣怀当邮传部尚书时,任命他为电报总局提调,他接受了。他终身以电报为事业。光绪三年(1877)丁

丑至光绪四年(1878)戊寅,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及陕西五省发生的“丁戊奇荒”,对他印象太深了。这次饥荒,上亿人受灾,至少一千万人饿死。救灾中,电报这一传递快捷的新技术,发挥了惊人的成绩。上海陈家木桥电报总局成为救灾的指挥中心,汇报灾情,递解赈款,就像鼓槌敲鼓,一敲一个声音,非常便捷。从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到十五年(1889)正月为止,通过电报总局解往豫皖两省的赈款共计五十一万两,与朝廷允拨两省的赈灾款项持平。可见,谢家福主持的民间赈灾力量非常强大。光绪三年的这次赈灾活动,谢家福和李金镛以收养孤儿为主,故有“孩赈”之称,历时五个月,拯救了数千孤儿的生命。

李鸿章、盛宣怀等人又适时为其造势,对赈灾主将纷纷授予官职。李金镛,被先后授予湖北开采煤铁总局总办、吉林知府、长春厅通判;经元善,被授主事加员外郎衔等,使民间义赈转化为国家赈灾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有趣的是,谢家福在上海的办事处,挂着“苏州桃花坞赈寓”或“桃坞筹赈公寓”的牌子。光绪十八年(1892),他又借桃花坞原正道书院故址开办苏州电报传习所,人称“苏堂”。“苏堂”是晚清培养电报人才的三大学堂之一,三年间培训电报值机生(报务员)八百馀人。谢家福对桃花坞真是很有感情。

谢家福非常关注贫苦子弟的教育。桃花坞五亩园除有电报传习所外,还有两所他创办的学堂,一是儒孤学堂,一是中西学堂。前者收“儒家幼孤子弟之无力读书者”。中西学堂是根据盛宣怀德提议创办的,设英文、数学、各国史鉴、舆地、格物等课程。盛宣怀觉得,苏州是省城,开风气之先,特别需要用现代知识进行教育。桃花坞中西学堂,是继上海、天津后,全国第三所中西学堂,实际也就成为儒孤学堂的高级班。这所学堂三月筹建,到重阳节,谢家福就病倒

了，咯血十馀口。十月招生，谢家福不放心，三次扶病到堂，亲为校阅。到十一月初七日，他弥留之时，口授遗嘱，语不涉私，对这三所学校，一一关照，并以积银八千两及祖传遗田四百亩的得息，专门用作合族的赡养补助和子弟读书之用。遗嘱记录好，复读一遍，谢家福才在遗嘱的首尾落笔签字。当甲午战争失败后，谢家福顿足拊膺，忧愤交集，日夜思虑，觉得救中国的惟一途径是教育，因此在病危之时，仍不忘学校，他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

谢家福为桃花坞还做了两件事，一是重修五亩园，二是编印《五亩园小志》。

五亩园，语出《孟子 · 梁惠王章句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故五亩园是士大夫追求的理想境地，并非真有此园，也并非真是五亩之地。桃花坞五亩园，相传 "汉张长史治桑于此"，北宋时，梅宣义于此建园，苏轼《寄题梅宣义园亭》有 "仙人子真后，还隐吴市门。不惜十年力，治此五亩园" 之咏，苏轼喜欢用 "五亩园" 这个典故，如《司马君实独乐园》有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有 "嗟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异鹊》有 "家有五亩园，么凤集桐花" 等等。想不到，梅宣义的这个 "五亩园" 却给坐实了。五亩园内有谢家的祖产，他曾祖父怡堂公曾居住于此，有来燕堂诸构。谢家福修复五亩园后，悬一联云："五亩已成终老计，微官敢有济时心"，寄托了他的心迹。他居家之日少，处园之日多，他本想是优游林下的。

谢家福对桃花坞的另一个贡献，编印了《五亩园小志》。他非常热心家乡的文化事业，有《望炊楼丛书》七种三十卷、《燐血丛书》

四卷等。《燐血丛书》收笔记、日记三十多种，荟集了太平军据苏时期的珍贵文献。《望炊楼丛书》收《吴中旧事》、《平江记事》、《烬馀录》、《五亩园小志题咏合刻》、《邓尉探梅诗》五种，均为重要的苏州地方文献，初刊于光绪十六年（1890），1924年，苏州文学山房据原版重印。

谢家福于光绪二十二年（1876）十一月初八去世，享年五十岁。其子谢景宣等撰《绥之府君行述》，由盛宣怀填讳，对逝者来说，自然恩荣无比。

谢家福的侄子谢庭芝，与谢家福同岁，也是苏州电报局最早的创办人。盛宣怀任命谢庭芝担任此职，并非是谢家福的关系，而是因为谢庭芝也是义赈活动中的重要人物。谢家福有子，均未得永年，族人以谢庭芝次子谢安生为其嗣孙。谢庭芝的长子谢正叔，后来两任苏州电报局局长，谢安生则继承了五亩园园产。五亩园废弃后，部分建筑移作昆剧传习所，另一部分移作殡仪馆。

费树蔚　费念慈　费巩
附记：吴大澂

费树蔚，字仲深，号韦斋，因服膺黄梨洲而又号愿梨、左梨，祖籍吴江同里，光绪十年(1884)生于苏州，1935年卒，享年五十一岁。费树蔚的社会关系很复杂，他是柳亚子外祖父费延庆的嗣子，与柳亚子谊属舅甥，但两人仅差三岁。费树蔚自幼有经世之志，读书过目不忘，人称神童，被湖南巡抚吴大澂看中，将季女吴本静嫁给了他。吴大澂有三个女儿，长女吴本娴嫁给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次女嫁给张之洞的儿子。相比之下，费树蔚的父亲仅是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与袁世凯的直隶总督，张之洞的两江总督差远了。这说明，吴大澂看中的，恰恰是费树蔚的肚才、文才。

吴大澂自己就是一名才子，学问好，诗文佳，精鉴赏，工隶篆。廷试之前，大家都认为本科殿撰不作第二人想，非吴大澂莫属。不料吴大澂忽患痢疾，大泻不止，廷试时精神萎顿，腕力不致，鼎甲遂为洪钧所夺。但左宗棠、曾国荃、李鸿章等中兴名臣都非常照应他，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累官九卿，简放河南巡抚。

但费树蔚的科场运气比吴大澂更差,乡试不第,捐了个六品衔的主事,一度入袁世凯幕府,后参与江苏巡抚程德全的光复之举,1914年任政事堂肃政使。袁世凯复辟帝制,他愤而辞职,回到苏州,出任苏州电气公司董事长。在处理地方事务上,他与张一麐合作,在北洋军阀横行的年代里,利用两人与袁世凯家族的特殊关系,常常解苏城于厄运患难中,为苏州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张一麐字仲仁,费树蔚字仲深,人称“二仲”,苏州人应该记得这两位先辈。

民国以后,管理苏州这座城市的,不是地方长官,而是张一麐、费树蔚、李根源等为代表的地方绅士。这是因为国家执政能力下降,导致地方守牧的政府权威被士绅的社会权威所取代。地方长官想做什么事,先要问问绅士们怎么想。这种情况,全国皆然。幸运的是,苏州绅士知书达理,懂得礼义廉耻,故民国初年经历种种动荡,苏州人一直没吃大苦头,盖源于此。换成外地,土豪劣绅当道,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1923年,因为儿子费巩的婚事,费树蔚买下了桃花坞大街176号费念慈旧居,迎娶袁克定之女袁家棣。袁克定是袁世凯的嫡出长子,有一妻一妾,袁家棣又是袁克定正室夫人吴本娴所生,因此,袁家棣在袁家的地位很高。袁家棣又作为吴大澂的外孙女,嫁回苏州,这桩婚姻怎么说,都是极为称心的。婚礼于1925年举行,极其隆重,妆奁行列长达三四里,送嫁宫灯刻丝成云龙纹,灯架雕有龙首,气象毕竟不一样,从拙政园大门一直排到桃花坞大街。袁家棣出嫁,为何与拙政园有关?原来1920年时,李鸿章侄子、云贵总督李经羲买下了拙政园东部的潘氏旧宅,经修葺,成了一处幽静精致的去处。袁家棣临出嫁前,就借住在拙政园。袁、费联姻,桃花坞费家的声势地位,在当时无人可以超越,堪称名动一时。袁家棣嫁到费家,母亲

吴本娴，婆婆吴本静，乃一母所生的亲姐妹。这种情况，于今天而言，不可思议，也有悖优生优育的理论，但明清时期的豪门婚姻，表亲连姻极为盛行。江南一带，读书人多，做大官的多，豪门大族密集，显得尤为流行。这是社会上层家庭为保持姻亲利益互惠共享而形成一种习俗，所谓门当户对，亲上加亲。

桃花坞大街176号，本是费念慈的故居。一百年前，费念慈是非常出名的人物。他的父亲费学曾，字佑庭，武进人，曾署直隶按察使。费念慈，字屺怀，号西蠡，生于咸丰五年(1855)，卒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是光绪十五年(1889)二甲六名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在科举时代，能博一翰林，这是很高的科名了。他的丈人徐郙比他更利害，是同治元年(1862)状元，光绪朝官至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很为上海人争光。费念慈太太徐原仙，号称才女，对丈夫要求很严。费念慈很怕夫人，虽然他也才华出众，除举业外，能诗能文，工书善画，但只考中翰林，却未中状元，因此大受夫人斥责，使他抬不起头来。费念慈与文廷式、江标齐名，是著名的帝党，后被劾放归，长年居住苏州，问学于曲园老人俞樾。他尤精金石目录之学，擅鉴赏，藏书甚富，题所居为归牧庵。

归牧庵建筑精致典雅，花厅四壁的石刻闻名江南。据费氏后人说，1923年，费树蔚从耦园觅得灵璧石一峰，高九尺，重千斤，置于园中鱼池西假山上，特为建梦墨亭，为园中一景。1950年后，此石被移到网师园。但费氏后人此说不确。1923年，费树蔚买进灵璧石是可信的，因为姻亲袁氏是民国第一家，这点面子要争得的。但1950年此石被移走，就难以置信。因为当时网师园为中共要人居住，好像是李达将军在此养病，没必要移动这方巨石。另外，费氏故园于1940年费树蔚去世后，就易手赵姓，故费氏后人的记忆未必正

确。据南京工学院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的《网师园》称，此石早先在唐寅故居准提庵梦墨亭，1958 年移置于网师园。这个年代应该是正确的，网师园于 1958 年整修后开放。

费树蔚毕竟是苏州名绅，为人做事经得住历史的洗刷。

费树蔚在吴江震泽有祖传田地一千六百馀亩，因为连年遭灾，收成很差，入不敷租。他又不忍心向佃农加租，只得自己卖了家产交租。为此，他连续两次打报告，自清家产，请求归公，而政府不允，他只好继续当这个地主。

1929 年，费树蔚出任信孚银行董事长，在十梓街留下了一个地名"信孚里"。这组建筑群是供给该银行职员居住的，每户建筑面积，分二百九十平方米和一百五十平方米两种，附设卫生间、厨房，就职员而言，属于豪华享受了。

笔者早年对张士诚很有兴趣。当时正值文革后期，学校图书馆古籍部尚未开放，经管理人员默许，将我放进去，再在外面加锁，其狼狈和胆大包天，可以想见。就这样，在尘封的古籍中，终于找到一本《吴王张士诚载记》，书名为费树蔚署，印象十分深刻。"费树蔚"三字，从此刻在脑子里了。费树蔚不大可能来做这学问，大概是资助出版了这部书，可见先生对乡邦文献，极为关注扶持的。

1935 年，费树蔚死于脑溢血。他著有《吴中近人书画集》、《费韦斋诗钞》十四卷、《文钞》一卷，苏州图书馆有藏。

费树蔚先生有三子一女，各有成就。在桃花坞成婚的费家次子费巩，要交代一下。抗战爆发后，杭州浙江大学内迁贵州，受浙大校长竺可桢之请，费巩出任训导长，但有一个条件，不参加国民党和不领取训导长的薪俸。浙大国民党支部负责人张某诱费巩加入国

民党，被费一口拒绝："我决不会像你那样出卖灵魂。"张某威胁说："你这样下去，是要后悔不及的。"仅半年，费巩就被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以放纵共产党活动的罪名，胁迫去职。1945年3月5日凌晨，当他在重庆千厮门搭乘轮船准备赴北碚的重庆大学讲课时，遭绑架失踪。据传，特务将费巩秘密杀害后，将其投入硝镪水池，毁尸灭迹。1978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正式追认费巩为革命烈士，在龙华烈士陵园修建了费巩衣冠冢，浙江大学在校园内建了一座"费巩亭"，以志缅怀。

李模　李吴滋
附　记：祖大寿

一个明朝的御史，曾经住在桃花坞，值不值得现在来写他？李模的资料，留着笔者电脑中已好几个月了。他生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卒于康熙十三年（1674），明末清初。这个时代的人物，本书已经写了好几位了，如杨廷枢、文震孟、文震亨、姜埰、姜垓等，他们在苏州文化历史上的影响力显然比李模大，那么，还要再添上李模吗？

李模，字子木，号灌溪。关于他的籍贯，一说长洲唯亭人，一说太仓。这两种说法都对，李模的先世是太仓的，太仓地处长江出海口，明末倭患，首当其冲，于是移居苏州东郊唯亭。明代时，唯亭是苏州东部娄门至角直之间的重镇，范围很大，将今日苏州工业园区都囊括其中。李模的先世移居唯亭，其实是今日斜塘一个叫龙墩的地方，它北依娄江，东傍沙湖，西偎白荡，南抱吴淞江。谁知倭寇看中苏州城里的财富，沙湖、白荡成为倭寇兵船冲击苏州的必经之路，龙墩也无法安居了，于是在嘉靖间又移居桃花坞。苏州依凭极为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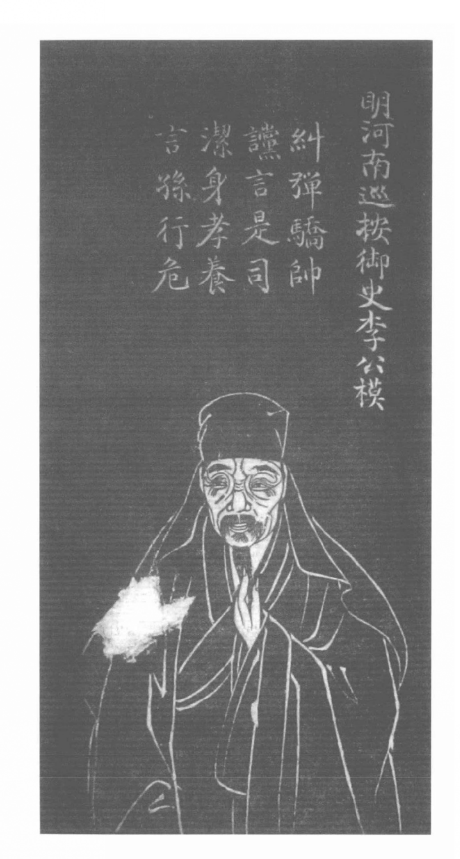
固的城墙,将倭寇挡在城外了。

李模是天启五年(1625)进士,授东莞知县。以新进士授班知县,说明两个信息,一是安置得不算好,东莞毕竟属于边远地区;二是李模的进士,可能是三甲进士,即曾国藩终身引为遗憾的"同进士出身",是进士中的第三等级。

明末的东莞,气象已经不一样了,《广东通志》称是"邑故繁剧"。李模那时也四十岁的人了,发奸摘伏,凛若神明。他处理的案子,条理清楚,没有人上诉。李模在东莞,自我生活的要求很低,饮冰食蘖,十分清苦,正因为这样,他才敢于抑制豪强,决不手软。天启六年(1626)遭灾,米价直线上升,饥民成群结队,进城抢米。李模单骑赶去制止,抓了为首的两人,才遏止了这场风波。事后,李模将自己的薪金拿出来赈灾,又勒令各富户以平价出售粮食,这场风波才渐渐平息。因此,李模在广东称为能臣。

李模在东莞当了五年知县,魏忠贤乱政的这段时光,他远离权力中心,显得风平浪静。大约在崇祯三年(1630),因为政绩卓著,被提拔为云南道监察御史。后丁忧,服阕改浙江道监察御史。崇祯十年(1637)时,他还在浙江道监察御史任上,有《李模请浚吴淞白茆并复设治水部臣疏》为证。其时,应天巡抚为张国维,他是水利专家,任苏抚八年,建苏州九里石塘及长洲至和等塘,平望内外塘,修松江捍海堤,浚镇江及江阴漕渠,并有成绩,还纂修了《吴中水利全书》,于崇祯十一年(1638)刊印,"是书所记,皆其阅历之言,与儒者纸上空谈,固迥不侔矣"(《四库全书总目》)。李模的这篇上疏,就收在这部书里。

《江南通志》说,李模擢御史后,以疏参分守太监陈镇夷,被贬为南京国子监典籍,管理图书档案去了。其后潜居著书,以寿终。李


明河南巡按御史李公模
糾彈驕帥
讜言是司
潔身孝養
言遜行危

模被贬，应该是崇祯十年后，此后，作者没有查到他的官场履历，说明是潜居了。到明亡后，福王在南京继位，李模官复原职，被任命为河南道监察御史。当时福王依仗的军事力量主要是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四将，他们各自拥兵自重，内讧不断，只是苦了史可法，处处做调解工作。福王为了安抚他们，封他们为侯爵、伯爵。李模觉得不妥，他上疏说："这些将领在侍候先帝的时候，未收桑榆之效；现在听命陛下，未彰汗马之绩，方应戴罪，何有勋劳？"李模的这番议论对不对，对的，但没有实际意义。南明政权现在什么都没有，惟有空头帽子，凝聚人心。满朝文武，谁不想步南宋后尘，与满清划江而治，有封爵总比没有好啊。因此，李模的建言，当政者并不喜欢。李模见在福王政权没有奔头，就称病告归。期间，"民有起义者迫之，事卒未就，寄居萧寺，谢绝人事"（范石夫《朋旧尺牍》，见叶廷琯《鸥陂渔话》卷四）。

李模"潜居"在哪里？有两个去处，一是桃花坞，一是斜塘龙墩。桃花坞有密庵旧业，这所房子是父亲李吴滋当年经营的。李吴滋，字伯可，号如谷，又号百谷。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历任崇安、德清、龙溪知县，南京刑部郎中，宝庆、武昌两府知府，终湖广按察副使。居官有政声，而树德于桑梓尤深。李吴滋和李模都入祀沧浪亭五百名贤，这说明苏州士大夫对他们父子俩是认可的。李模有《新扫密庵旧筑》，诗云："昔日深深意，今依幻住身。蓬蒿迷若醒，竹柏故犹新。小得蜘蛛隐，居惟钟磬邻。扫苔迎古佛，竺国备遗民。"可见李模是住在桃花坞，诗说得很清楚，做身穿袈裟的明朝遗民，也印证了范石夫说的"寄居萧寺"。李模在桃花坞写了些什么书，有《碧幢杂识》一卷，《碧幢全集》三十卷。但《碧幢全集》已失传，看不到它的全貌了，幸好《御选明诗》还保留了一首，题为《南思》，诗云：

明湖廣按察副使李公吴滋

委蛇其形
肮髒其名
與道大適
来去分明

“畦丁忽报韭芽春，对对河豚入馔新。笑指芦根看续命，不须子细祝厨人。”按：芦根，有解毒功能。吃河豚，要备好芦根。一旦中毒，煮汁服之即解。子细，即仔细。诗写得很生动，神态必具。

李模另又整理了《烬馀录》，前序写道：“《烬馀录》二卷，城北遗民徐大焯撰。予从金陵徐绍斋所藏册页录副，甲编纪宋初宋末事，乙编纪吴中事。半从先世笔记中录出，足以征信，藏箧有年，冀备修志之用。岂料投忌尚须秘藏，我子孙其珍秘之。大焯，吴县人，元初居桃坞庆云里，即今官库巷。辛卯秋日李模记。”《烬馀录》保存了建炎四年（1130）苏城劫难的历史资料，非常珍贵。由于成稿后，并未付梓，故洪武初卢熊修《苏州府志》、正德中王鏊修《姑苏志》，都没有见到这本书。李模整理《烬馀录》，大概是躲在斜塘龙墩山脚的别业里进行的，因为在清初整理这类文献，即便不会当成反革命，也可能授人话柄。李模心里很清楚，故叮嘱子孙珍藏起来，密不示人。他寿很长，活了八十二岁，其中有二十多年是在斜塘度过的。儿子李炳，字文中，原为秀才，清兵入关后，弃举业，随父亲隐居在龙墩。李模去世后，桃花坞的密庵旧业被改建成李家祠堂，奉香火，颜曰老和尚堂。因为顺治二年（1645），清军下苏州，李模就改穿僧装，成了一名老和尚了。秦云题遗像诗云：“野鹤闲云世岂忘，南都花月付沧桑。英雄飘泊逃禅老，臣主荒唐视国亡。半壁河山惊铁骑，一身衣钵寄金阊。十三陵树悲风雨，湿遍袈裟泪几行。”（凌泗《五亩园志馀》引《伏鸾堂诗剩》）。

清初，从娄门沿东北街一线往西，全部被军方征用、留下的地名有北园、八旗会馆（今苏州博物馆）、西大营门等，都是昔日满营的痕迹。据顾公燮《丹午笔记》记载，满营征用到桃花坞宝城桥，突然中止了。今日后板厂一角，碰也不碰。为什么？原来李模在前明当兵

备道时,曾救过清军苏州驻防军统帅祖大寿的命。因此,祖大寿圈封民房作为兵营,独独不敢征用李模的房子。《丹午笔记》还写了一个小小的细节:“李灌溪模,曾任前明兵备道,时祖尚为微员,有事当刑,幕友劝李救之。李适掷色,曰:‘若此人有福,得全色。’一举而得亦红,因解救得免。祖故以此报之。”祖大寿的小命是李模一粒骰子甩出来的。

蒋灿　蒋深　蒋仙根
附记：杨嗣昌　蒋育馨　蒋垓

明末，原天津兵备道参议蒋灿获谴谪戍福建，不久放归，回到苏州后，没有住娄门外老家，而是迁居到阊门内桃花坞后板厂，杜门养母。

世道变了，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陷洛阳，杀福王朱常洵。张献忠奇袭襄阳，杀襄王朱翊铭，朝野震惊。执掌对农民军作战的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杨嗣昌闻讯后，自觉对不住崇祯帝，绝粒自杀。大明朝是越来越没希望了。

蒋灿，字韬仲，一作弢仲，号雉园，晚号慕皆，娄门外娄关上人。娄关蒋氏也是地方上的绅士一族，蒋灿的祖父蒋二南，就曾于万历九年(1581)出资重建永安桥，蒋氏后人在康熙十九年(1680)又倡议重建。明清时代，对这种修桥铺路、行善积德的事，地方绅士是非常乐意去做的。蒋灿是天启元年(1621)举人，崇祯元年(1628)三甲第一百零一名进士，考授浙江绍兴府馀姚县知县，调上蔡知县，迁兵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擢天津兵备参议。


明山東按察副使蔣公燦
績備通漕
軍資是足
晦迹萊衣
人欽高躅

在天津任上，蒋灿“坐事谪戍福建”，据说与杨嗣昌有关。蒋灿是兵备道，杨嗣昌是兵部尚书，这两人究竟发生了什么纠结，没有记载。蒋灿在天津做了什么？据《江南通志》说，为了保全南浙运京的白粮，分别在丁字沽、杨村、杨柳青筑了三座高台，大概是碉楼、瞭望台一类的军事建筑，作用是捍蔽天津。《五亩园小志》说：“缮城作台，保全粮饷。”意思差不多，加强城防，以保护粮食运输。白粮，是个专用名词。据《明史 · 食货志三》：“苏、松、常、嘉、湖五府，输运内府白熟粳糯米十七万四千余石，内折色八千余石；各府部糙粳米四万四千余石，内折色八千八百余石。令民自运，谓之白粮船。”运白粮，对太湖周边苏、松、常、嘉、湖五府老百姓而言，绝对是个苛政，当初朱元璋定这个规矩，就有点弄松人的意思。因为这块地区，当年都是张士诚的地盘。但明初，南京为首都，毕竟路途不远。从明成祖迁都北京后，这白粮同样运到京城，这路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令民自运，谁运？当然是南方地主，谁轮着谁倒霉。当一次粮长，足以倾家荡产。

蒋灿在天津还做了一件事，即“运长芦盐课”（《江南通志》），这笔长芦盐税为六十万两，加上南直隶解饷十万两，总共七十万两。这笔钱是国家的财政收入，由天津兵备道负责押运，很正常。但笔者疑心，蒋灿的被贬，可能与此有关。

现在考察崇祯年间的国家经济运作，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了保证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开支，杨嗣昌建议对地方上交国库的资金分成两块，一半解京，一半解剿。这个办法在崇祯十年（1637）开始实施，并指定一名户部侍郎担任督饷侍郎。第一位督饷侍郎是傅淑训，总督南北直隶及各省勦饷，建行台于池州。傅淑训丁母忧，接任他的是张伯鲸。但朝堂上对杨嗣昌的做法很有非议，指责他劳师糜饷，

指责他“兵户不相核”,户部居然管不了兵部的开销;指责他兵员不足而溢饷百万。蒋灿会不会也是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

杨嗣昌是个很有想法的人。他曾向崇祯帝建议:“巡抚不用命,立解其兵柄,简一监司代之;总兵不用命,立夺其帅印,简一副将代之。监司副将以下,悉以尚方剑从事。”对执行既定方针,十分强硬。崇祯十二年(1639),他制定的“四正六隅十面网”围剿计划出台,对涉及围剿流寇的十省巡抚制定了岗位责任制,巡抚不用命,立解兵柄。尚方剑也有了。谈迁《国榷》记道:“崇祯十二年九月,命大学士杨嗣昌以原官兼兵部尚书督师,讨流寇,赐尚方剑,宴阁臣于平台后殿。上手觞嗣昌三爵,赐以诗。”拨剿饷五十万予之。杨嗣昌皇命在身,摧枯拉朽,凡与杨嗣昌意志不相符的,必然要受到冲击。蒋灿在这个时候受谴,“坐事谪戍福建”,会不会与这笔七十万两的经费有关?但没有确切的史料来支撑这一推想。这时国库困乏,经费相当紧张。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崇祯十三年(1640),苏州知府陈洪谧、松江知府方岳贡,均因为拖欠国赋而罢官。蒋灿受到的处分是谪戍,相比于罢官,其受罚的程度还重一点,罢官顶多是不干,而谪戍还有劳役的成分。

蒋灿的被放回,大概是杨嗣昌自杀后,也就是崇祯十四年(1641)。他是因杨嗣昌而谪戍的,现在杨嗣昌死了,成了朝廷的罪人,杨的罪责必然受到清算,而曾经遭受杨嗣昌压制的官僚将扬眉吐气。蒋灿没有官复原职,黯然回到苏州。接着母亲去世,蒋灿哭泣过哀,竟致双目失明。

蒋灿父亲蒋育馨,隆庆元年(1567)举人,考选为福建清流知县。他到任后,缮城隍,清浮粮,理学校,很有政声。当地风俗,婢女至老也不令婚配,于是蒋育馨下令,凡年满二十而不嫁,重治父母。不日

间,清流城里出嫁了数千人。清流县地处福建山区,桔槔(龙骨水车)难以使用,蒋育馨指导工匠筑水栈,蓄水灌溉。福建山民有养蛊虫(人工培育毒虫)的习惯,蒋育馨下令捕杀,并将治疗蛊虫的方药张榜公布。他确实为清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有同僚不舒服了,造谣中伤他,他却很坦然,"湖上云山待我久矣",便欣然扛着被褥回家了。年六十二,卒于家。他的五世孙、记名御史蒋含光在城内史家巷建祠祭祀他,配祀蒋灿、蒋若来,人称蒋氏三贤祠。蒋若来是蒋育馨的侄子,明浙江总兵,清兵南下时,其典守金华,力竭自杀,乾隆间谥忠烈。

桃花坞后板厂,虽然不大,却极显赫,本书就有三位传主那里生活过,李模、蒋灿和蒋深。蒋深的个人履历很简单,表字树存,号绣谷、苏斋。工诗,能书画,与徐亮直友善。十九岁时,以国子监生与修《佩文斋书画谱》,四十二岁时又与修《佩文韵府》。曾做过馀庆县知县,终朔州知州。苏州园林史上有个绣谷园,就由他修复,乾嘉时名人争为饯春之会,《五亩园小志》称其"前后池水映带,花药环之,堂中储书数千卷,前人名迹数百册,石刻之精美完好者尤夥"。

康熙三十八年(1699)己卯,蒋深在绣谷园交翠堂举办送春会,常熟大画家王翚也参加了,并作图纪念这次盛会,这幅画现在看不到了,另有一名苏州画家释上睿绘《绣谷送春图》,上有王翚的题跋,魏嘉瓒先生《苏州古典园林史》收有此图。上睿是瑞光寺和尚,后居东禅寺,与惠士奇、张大受等吟诗唱和,后人评价他的画,认为其山水得王翚指授,花鸟得恽寿平真传,人物有唐寅笔意。上睿作《绣谷送春图》已六十五岁,在这个年龄段的作品,艺术上、技法上、思想上都十分成熟了。这次送春会,苏州名流尤侗、姜实节、孙旸、高不骞、徐崧、张大受、顾嗣立、惠周惕、徐昂发等都参加了,《吴门表隐


明福建清流知縣蔣公育馨
化孚閩俗
誠格甘霖
清流棠蔭
遺愛常深

附集》有一份名单。沈德潜也参加了，他年纪最轻，仅二十六岁，还在跟叶燮学诗，排在末位，《吴门表隐附集》的名单上未收。翰林院检讨尤侗，德高望重，坐了首席。

送春，不是民间习俗，记录吴地岁时风情的《清嘉录》、《吴郡岁华纪丽》都不见记载，可见这是诗人的专项。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骨髓中能渗出伤感和怀旧。春天，是娇媚，是豆蔻，是柳前月下，是轻歌曼舞。夏天，则意味着骄阳酷暑，油汗满面。由落英缤纷的残春景象，联想到美人的容颜渐老，春归何处？会令人生出无限伤感。唐人贾岛诗云："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三月晦日赠刘评事》）读了这首诗，让人明白了，原来诗人的送春，是专指三月的最后一天。为了守住春光，贾岛与刘评事相约，晚上也不睡了，只要第二天的晨钟不响，依然是春天时光。贾岛的诗写得真好。全诗没一字说送春，但通篇都是送春。此后，诗人送春，均在三月晦日。譬如，南宋王十朋有《三月晦日与同舍送春于梅溪》，还即席朗诵贾岛的诗。可见后人将送春的发明权是归之于之贾岛的。

蒋深在绣谷园举办送春诗会，也应该在三月晦日。

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送春诗会上，最得意的应是尤侗。康熙帝刚来过，三月十四日驻跸苏州，尤侗向皇上献上《平朔颂》、《万寿诗》，康熙帝则赐御书"鹤栖堂"三字，风光极了。因此，这次送春诗会的首席，非他莫属。尤侗以下诸人，看似功名不高，但都是才气横溢的学者，政治倾向上，也与朝廷走得比较近。

姜实节，五十二岁，艺圃主人，擅长七言绝句，一手篆籀写得极好。

孙旸，七十三岁，吴中名士，顺治间举人，因丁酉科场案受牵连，

与吴兆骞同时谪戍尚宝堡。康熙东巡,孙旸献诗,深加赞赏。大学士宋德宜捐金赎之,得以从关外放还。

高不骞,康熙帝南巡至松江,诏求名士,以布衣召试,授翰林院待诏。

徐崧,诗人,《百城烟水》的作者之一,尤侗为之作序,自然也是这一圈子里人。

顾嗣立,三十四岁,曾预修《佩文韵府》等,五十一年(1712)中进士,授知县,以疾归。所居秀野草堂,水木亭台之胜甲吴中,常召集四方名士,觞咏无虚日,风流文雅照映一时。他是元诗专家,辑有《元诗选》。惠周惕,经学大师,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授密云知县,清军征讨噶尔丹时,军需物资均从密云县走,

惠周惕一介书生,艰于应付,忧急而死,属于因公殉职。

张大受和徐昂发,后来都考中进士,官至学政,但在当年尚是小人物。

六十年后的乾隆二十四年(1759)己卯,蒋深的儿子蒋仙根再次举行送春会,与会者有沈德潜、彭启丰、吴泰来、顾诒禄等。沈德潜、彭启丰不用多说,一是礼部尚书,一是兵部尚书,都是苏州的老名士。吴泰来,木渎遂初园主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顾诒禄,曾修纂《长洲县志》、《元和县志》、《虎丘志》等,对苏州地方文化有极大贡献。王愫为这次送春会绘图,他是太仓诸生,王原祁侄子,侨居苏州,画山水干墨重笔,不加渲染,得元人简澹法,绛笔竹石尤妙,可惜这幅送春图也没有流传下来。

蒋深、蒋仙根父子以绣谷园为平台,在甲子一周,完成名流再举,这是旧时代知识分子极为推崇的异事。因此,孙天寅的《西畴阁记》和顾震涛的《吴门表隐》都将此事记录下来。蒋仙根也是一

马屁精，他是贡生，书法大概也不坏，乾隆十六年（1751）弘历首次南巡，他恭缮御制《盛京赋》献了上去；乾隆二十二年（1759）再举南巡，他缮写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再次进贡，但仅仅得到“文绮之赐”，没有实质性的赏赐。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第三次南巡，就不见蒋仙根的身形，大概他自己也觉得没趣了。

绣谷园在蒋垓手上，就已初具规模了。据蒋垓《绣谷记》说，顺治四年（1647），蒋垓在修园时，挖出一方巨石，隐隐有字画痕迹，于是剜藓剔苔，乃是八分书“绣谷”两字，字径二尺，没有题署。蒋垓暗暗称奇，于是以绣谷名园。蒋垓死后，园曾数易其主，后来，蒋深买回重予修葺。嘉庆年间，园为叶观潮所得。道光年初归南昌谢学崇，后为婺源王凤生所居。最后，园毁于太平军战火中。但乾嘉名人在绣谷园饯春之会的篇咏，流传至今。

舒位　曹沧州　吕毖　金檀　张炳翔　文从简　文伯仁

附记：王昙　孙原湘　刘若愚

将舒位入选本书，因为他有《皋桥今雨集》，舒位，生于乾隆三十年（1765），嘉庆二十年（1815）去世，字立人，小字犀禅，号铁云。清顺天大兴人，现属北京。十四岁，父亲舒翼在广西永福县任贰尹，相当于副县长，舒位随父读书。官舍后有铁云山，因自号铁云山人。母吴人，遂移家吴中。他是乾隆五十三年举人，屡试进士不第，贫困潦倒，游食四方，以幕为生。曾做过黔西道王朝梧的幕府，同至贵州，为他管理文书。

王朝梧是高干子弟。他的父亲王际华，是乾隆十年探花，官至户部尚书，《四库全书》总裁，是乾隆皇帝宠爱的大臣。所以，对他的儿子也格外的加恩，先是授予内阁中书，后又准许一体参加会试。从这恩典中，可以得知，王朝梧连举人都不是。通过会试，王朝梧顺利获得进士的功名，因为有一条资料表明，他成了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不是官，是国家后备干部进修班，但必须具备二甲进士的资格才能入选，在籍学习三年，再授予官职。但只要有了这个身份，在

仕途上将变得顺畅。翰林,是清朝的最高学位,非常隆重。

不是举人的王朝梧,因为皇帝的一句话,成了进士,做了黔西道。道台,四品官,相当于专员,是副省级的待遇。已经是举人的舒位,因为没有一个有权势的好爸爸,只能当幕僚,在别人手下讨口饭吃。以作者的小人之心揣摩,舒位的内心肯定有点不舒服的。

当时广西狆苗造反,清朝政府派云贵总督勒保统兵征讨。舒位随黔西道王朝梧,也在行伍间,任平苗军幕书记。"狆"这个字,带有侮辱性,是清朝政府杜撰出来的,它的本字是"仲"。清朝文书,喜欢将反叛者的名字加"犭"或"氵",以表示非禽即兽,反正不是人类。仲苗是苗族中的一支,历史上聚居在贵阳、安顺、平越、都匀等府。勒保率军将仲苗大营黄砦团团围住后,并没有立即动手,总攻前,由舒位起草了一道文檄,劝谕苗民投降。苗营中识汉字的读了,十分感动,哭拜解散。勒保见了,十分惊讶,从此军中事都找舒位商量。仲苗寨子虽然解散了,但为首的七绺须、韦朝元、王囊仙誓不投降。勒保从云南调来少数民族军队,其中有一个领军者叫龙幺妹的,年十八,美丽善战,矛枪所及,槊一毙十。王囊仙无法招架,被擒回黔西道大营。在舒位的劝说下,王囊仙也表示不再反叛。仲苗之反,就此荡平。勒保见舒位立了如此大功,有心做媒,想把龙幺妹许配给舒位,被舒位婉言拒绝了。巡抚要为舒位叙功,舒位也不要。大家都很佩服他。这时,舒位的父亲已经去世,他一心一意要陪母亲回苏州,好好侍养。朝廷调勒保去四川镇压白莲教军,邀舒位同行,舒位也以母老路远相辞。

舒位性情笃挚,好学不倦,为诗专注才力,每作必出新意。诗与王昙(仲瞿)、孙原湘(子潇)齐名。乾隆年间的国子监祭酒、侍讲学士,同时也是著名诗人的法式善称他们为"吴地三君"。王昙,嘉兴

人，晚年定居苏州，有《烟霞万古楼诗》，近代吴藕汀先生曾为其作插图；孙原湘，常熟人，夫妇均是袁枚弟子，有《天真阁集》；舒位，有《瓶水斋诗集》。1928年，上海文明书店出版了《注音舒铁云、王仲瞿诗》，向小学生推广，说明舒位的诗通俗易懂，格调高尚。舒位通晓音律，能吹笛鼓琴，所作戏曲，人称当行。有《圆圆曲》、《琵琶赚》等词曲杂剧数种。舒位亦善书画，书各体皆工，兼明画理，山水、花鸟、人物、草虫，均师青藤。青藤，即徐渭徐文长也。

他写的《乾嘉诗坛点将录》，仿《东林点将录》，以《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相配，罗列清代诗坛人物。《水浒》梁山泊英雄排坐次，并各有绰号，舒位仿照它，为乾嘉文人在诗坛上排列坐次，将某人与《水浒》中人对号，书其简历，作些许评论，譬如，将袁枚比作及时雨宋江，沈德潜比作晁盖，毕沅比作卢俊义，钱载比作吴用，法式善比作神机军师朱武，阮元比作小旋风柴进，洪亮吉比作花和尚鲁智深等。《乾嘉诗坛点将录》这部书影响深远，近人汪辟疆又模仿舒位之例，写了《光宣诗坛点将录》，钱仲联也步此后尘，有《近百年诗坛点将录》。

《皋桥今雨集》二卷，嘉庆八年(1803)有红杏斋刻本存世。

舒位《清代七百名人传》有传，但将舒位去世写为嘉庆二十六年，明显是误写。嘉庆帝于二十五年去世，当年道光即位，以明年为道光元年。所以，嘉庆二十六年，这个年号是不存在的。

舒位事母至孝，嘉庆二十年(1815)十月，母殁，舒位其时因为家贫，正在湖南贩米，赚点小钱。听到噩耗，戴星而奔，不纳勺饮者弥月，哀衰成疾，同年除夕去世。

吕毖，字贞九，号桴庵。在明末清初这个年代，吕毖实在是个小

人物。他是青浦人，徙居苏州，占籍吴县。年轻时文章写得很好，应府试，知府奇其才，拔置第一，后补为学官弟子员，成为一名秀才。大概就是这个时候，他在桃花坞采香庵后，起了一处房子，题名小桃源，由此来看，他心情很好，内心色彩斑斓。他在小桃源里潜心著述，崇祯十七年（1644）编成《事物初略》三十四卷，但尚未刊印，明朝就灭亡了。他没有出仕清朝，顺治二年（1645）即在昆山马鞍山麓的西乾道院出家，兼修隐形炼虚及辟谷之道，故人称其为辟谷道人。他曾遁居邓尉山妙高峰，筑室朗吟阁。顺治十六年（1659）进陕西，游终南山拜师。回苏后，发现楼居为僧人占居，也不予计较，在灵岩山凿石架木构阁，筑楼三楹，号桴庵。康熙三年（1664）五月望日，手书一诗而逝，年五十四岁。

吕毖著有《桴庵诗稿》、《芦城平话》、《事物初略》、《明宫史》、《明朝小史》等。《桴庵诗稿》久佚。《芦城平话》嘉庆八年（1803）尚存世，乃排比明末诸大案史实，俞正燮曾经读到过，并写了《书芦城平话后》。《事物初略》三十四卷，有浙江巡抚采进本，但《四库全书》没有收入，《四库全书总目》称“是编成于崇祯甲申，杂记事物俚俗语言之所自始，然多剽取《事物纪原》诸书，不足以言考证之学”。笔者怀疑，四库馆臣对吕毖的偏见，源于乾隆帝对吕毖《明宫史》的一篇上谕，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十七日上谕说：

“昨于养心殿存贮各书内，检有《明朝宫史》一书，其中分类叙述宫殿楼台及四时服食宴乐并内监职掌宫闱琐屑之事，卷首称芦城赤隐吕毖校次。其文义猥鄙本无足观，盖明季寺人所为，原不堪采登册府。特是有明一代，秕政多端，总因阉寺擅权，交通执政，如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俱以司礼监秉笔，生杀予夺，任所欲为，遂致阿柄下移，乾纲不振。每阅明代宦官流毒事迹，殊堪痛恨。即如此

书中所称司礼监掌印秉笔等，竟有秩尊，视元辅权重，视总宪之语，以朝廷大政，付之刑馀。俾若辈得以妄窃国柄，奔走天下。卒之，流寇四起，社稷为墟，伊谁之咎乎？着将此书交该总裁等照依原本抄入《四库全书》，以见前明之败亡，实由于宫监之肆横，则其书不足录，而考镜得失，未始不可藉此以为千百世殷鉴。并将此旨，录冠简端，钦此。"

乾隆帝不愧是玩辩证法的高手，一句进，一句出。既然说"文义猥鄙本无足观"，又称"藉此以为千百世殷鉴。"不管乾隆如何诋毁《明宫史》，他终究还是指示将此书收入《四库全书》。乾隆帝专门为此发一道上谕，这种情况也是不多见的，这也充分证明了《明宫史》的价值。四库馆臣仰乾隆帝鼻息，也看不起吕毖，认为他仅是一名草茅之士，怎么可能把宫廷制度记录得这样详细而翔实呢？实在是不可理解。

原来四库馆臣看这道上谕也很粗略，乾隆帝不是说是"明季寺人所为"吗？这个寺人，乃是万历、天启、崇祯三朝的太监刘若愚。汪琬说："崇祯初，以魏忠贤党下狱。若愚自辨颇力，在狱中纂此书。"（《远志之苗序》）在魏忠贤柄政的年代，刘若愚从御马监太监调任位置更为显赫的司礼监太监，掌管文书笔墨之事。刘若愚也小有才能，《明史》说他"善书、好学、有文"。魏忠贤倒台后，崇祯帝追究阉党责任，刘若愚被调出北京，谪充孝陵净军。其后，在查纠苏杭织造李实提供空白印纸陷害高攀龙一案中，刘若愚受到牵连，被处斩监候。刘若愚在大牢中等死，就静下心来，将他在宫中的所见所闻写了下来，成二十三卷，题为《酌中志》。其中从十六卷至二十卷，详细记录了北京宫苑的规模，太监们的职掌，内廷日常生活和饮食、服装、娱乐、嗜好等。吕毖慧眼独具，从《酌中志》选出这部分内容，

略作调整,改名《明宫史》刊行。1980年,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明宫史》时,将刘若愚列为辑著,吕毖列为编次,这是十分正确的。

吕毖还有一部重要著作《明朝小史》。这部著作的历史价值其实不用多说,举几个例子即可。譬如,关于袁宗道,《明朝小史》说:"十四年癸未,内阁大臣申时行等,已拟袁宗道榜眼,杨道宾探花。而宗道卷属大学士许国读,音楚,上不怿,置之二甲第一。"查《明史》卷二百八十八:"宗道,字伯修。万历十四年会试第一,授庶吉士,进编修。"袁宗道是会试第一名,已经内定为榜眼,为什么没有成功?因为殿试时由许国读卷,他是安徽歙县人,地方口音很重,听得嘉靖皇帝不耐烦,三鼎甲不给了,给了个二甲一名了事。安徽古属楚地,从中原人的角度看,讲的是楚方言,所以说,音楚。许国在家乡很有名,留下一座许国牌坊,举国独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殿试读卷,是明朝的老传统,一直延续到康熙年代,在陆肯堂中状元时,这个办法被康熙皇帝取缔了。本书陆肯堂这一章,曾写到这个细节。其中原委,这里就不噜苏了。

关于宣德皇帝喜好蟋蟀,《明朝小史》也有记载:"帝酷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其价腾贵,至十数金。时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妾以为骏马易虫,必异,窃视之,乃跃去。妻惧,自经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经焉。"

因此说,《明朝小史》是很值得读一读的。

吕毖的儿子吕守朴,号云隐,也是道士,居管山静真道院。著有《东原语录》、《复立山房诗》,均佚。

阊门西街59号务本堂,乃清代御医曹沧州故居。

曹沧州,名元恒,字智涵,号沧洲,晚号兰叟、兰雪老人,吴县人,

生于清道光二十九(1849)。曹家世代业医,祖父曹云洲,父亲曹承洲,均精通内外科。曹沧州继承家学,上自《内经》、《伤寒论》,下至清代温病学家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之书,无不精通。治病辨证,审慎精细,用药精妙,多以轻灵取效,对温病有丰富的治疗经验,对治疗烂喉丹痧有独到的方法。他还自制药剂,"连城散"主治外疡初起,红肿焮热;"消坚散"主治外疡顽肿坚硬之症。他向叶桂学习,于贫家则给药送诊,其医术、医德享誉吴中。光绪三十三年(1907),经两江总督端方推荐,他与青浦名医陈莲舫同被征召入京。

陈莲舫,名秉钧,上海朱家角人,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长曹沧州十岁。祖焘,父垣,皆为名医。莲舫幼承世业,有国手之称,四方求治者不远千里而来,有些病家甚至在朱家角寄宿,专程等候陈莲舫治病。

曹沧州、陈莲舫两人于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七进宫,至翌年六月十四日出宫,期间留下的病案,由薛鼎元辑录整理成《各御医诊德宗景皇帝案》,薛鼎元是曹沧州的弟子。曹沧州从北京回来后,比较低调,谢绝诊事,颐养天年。有《曹沧州医案》、《戒烟有效无弊法》、《御医请脉详志》等存世。苏州民间有"三钱萝卜籽,一个红顶子"的传说,说是慈禧太后患了积食之症,京中御医束手无策。曹沧州开出一方,"三钱萝卜籽煎汤饮服",将慈禧的病治好了。慈禧高兴,赏了他一个官做。当然,这是民间传说,说说而已。

曹沧州有一外甥吴子深,十七岁跟舅父学医,后在上海开业,是为沪上名医。他捐资五万大洋,建造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即今工人文化宫内的罗马大楼。

金檀:字星轺,清吴县人。先世从浙江桐乡徙往娄东(今太仓),

后再徙吴郡居之，藏书家，筑《文端楼》于桃花坞，编有《文端楼书目》。金檀自幼就喜欢古籍，凡是经史图籍，都想一睹为快。特别喜欢收藏异书，遇到善本，即便出重价也不计较，如能商借，就借回来手抄。经多年积累，收藏之富，甲于吴中。著有《文端楼集》、《消暑偶录》。雍正六年，自刻《高青邱诗笺注》十八卷，向有盛誉。

金檀之孙名可埰，字心山，吴县诸生，与黄丕烈友善。黄丕烈从其购得文瑞楼遗书数种，嘉庆三年(1798)跋《云溪友议》云："郡中有贫士金心山，余数年前曾识之。既而心山病且死，书贾以其书画之遗弃敝簏者示余。又一日书贾以其家所留书籍求售，余拣得二三册，是其一也。方知心山为星轺孙，藏书之家，渊源有自，宜其残编断简亦多善本矣。"又跋《道馀录》云："此书为金心山所藏，曾住郡中马医科巷。先世富饶，及身贫窭。惜身后荡然，残编断简以及一二画本，俱为贾人取出，间有得者，余悉珍之，重其人也。"先祖金檀文瑞楼在桃花坞，其藏书处为沧蠡阁、壹是堂，则已迁马医科巷矣。

桃花坞还有一位藏书家张炳翔，其字叔鹏，号忍庵，吴县诸生，住桃花坞大街新桥弄口。他专研文字训诂之学，于光绪间刻《鄦学丛书》三集十四种。平生喜藏古书，与陈文述、陈裴之父子和叶廷琯、叶道芬父子为至戚，得其所藏遗稿、遗书凡二百八十馀册，投赠书简一大宗，储以一巨箧。又藏黄丕烈请陆鼎画《梦诗前后二图》，上有石韫玉、潘遵祁、吴云、陈廷桂、吴信中、蒋寅、张吉安、尤春樊、彭希郑、杨达等人题诗。著有《仪鄦庐所藏书目》，王謇为之"参意鉴定"，获见其珍本，经部有卢抱经、吴葵里校周春《尔雅补注》稿本、翁方纲《佩觿》校记；史部有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精抄本、杨大瓢

明文學文公從簡
遯跡寒山
性不苟且
善画工書
一門風雅



《金石志》稿本；子部有胡心耘《石林燕语考异集辨》稿本、《懒真子集证》稿本；集部有金檀旧藏黄巩《后峰集》蓝格颇纸明抄本、叶廷琯手抄释淡归《遍行堂文录》、张瑶星《濯足堂文钞》等，多为清代禁书。张炳翔卒于1932年，其孙即张辛楣先生。

文从简，字彦可，文徵明曾孙，晚年居桃花坞，筑半庾园，园仅二亩，中有玉兰堂。后来迁居山郊，做了隐士。袁徵《文彦可移居和子垂韵》诗云："棕鞋桐帽野人装，家具无须载满航。台隐客星垂钓处，山留君子读书堂。宵同巢鹤听松雨，午就溪僧煮蕨香。张北周南邻可卜，结茅终拟傲君旁。"袁徵，字公白，吴县贡生，著有《蘧庄遗稿》。

文伯仁，字德承，号五峰，又号葆生，晚号攝山老农，文徵明侄子。生于弘治十五年（1502），卒于万历三年（1575）。文伯仁秉质颖异，年十五补博士弟子员，屡踬文场，退而耕于阳城湖之上。嘉靖三十四年（1555）避倭寇徙南京。四十年作《浙江海防图卷》，备御倭军用。后游太湖，旅杭州，晚居虎丘西麓，《吴郡名贤图传赞》称其"游都门，以书画自给。故交沈炼以言事忤严嵩，下诏狱，朝士无敢白其冤。公裸而詈于门屏间，一时义声震四方"。其文法韩愈，诗法白居易，书法锺王，画法王蒙，笔力清劲，岩峦郁茂，为海内推重。著有《栖霞寺志》、《五峰山人集》。

文伯仁有两事，为世所诟病。他早年曾与文徵明发生诉讼，为什么事？文家始终不着一辞，从没有消息透露。因为这次诉讼，文伯仁进了监狱，在狱里病得很重。夜梦金甲神对他说，你别担心，你的前身是蒋子诚门人，每次画观音大士像，你都要吃斋数天，因为积


明高士文公伯仁
天水冰山
形諸怒罵
排洒煙霞
筆含造化

此虔诚,今生今世当以画名。文伯仁一梦醒来,病也好了,与文徵明的纠结也就此了断。王世贞《文伯仁溪山自适卷》说:“东南佳山水,太湖之抱于三吴者,最号清远。然大较山不胜水。自富阳而溯,新安之黄山白岳尤奇峻,然往往水不能胜山。五峰文伯仁家吴中,足以穷水之胜矣,而犹未快,乃因游新安,遂尽擥临其奇而发之于丹青。余近得一寓目,真若坐篮舆异翠微间,使人应接不暇,区区山阴道上行,乌足以当之哉。此君秽而好骂坐,不知胸中何以富此一段丘壑也。”“秽而好骂坐”,可见此人嘴巴不干净,脾气很臭。

苏州五峰园,向有文伯仁所筑的说法,但魏嘉瓒先生《苏州古典园林史》认为此说不确。据《文氏族谱续集》记载,他始居洞庭之韩村,晚年迁虎丘西麓,亦曾徙南京、旅杭州,并无筑五峰园的记载。世人之所以如此传说,或是因为他号五峰的缘故。

后　记

书写好了,不免要说些谦虚的话,诸如才疏学浅啊,祸枣灾梨啊。但这是高人们的外交辞令,犹如美人对你的嫣然一笑,是当不得真的。

我这书,虽然写得很辛苦,但自觉很用功。从学术性和通俗性两项指标来考察,似乎还过得去。如果读者觉得笔者在吹牛,尽管可以当废品秤掉。待到别人手上的都化为纸浆了,我的一本,就是孤本,也蛮好。苏州人攀谈,“癞痢头儿子,自家的好”。

柯继承兄说:“从历史上讲,许多历史名人都与桃花坞有关,苏轼、章楶、范成大、文天祥、郑思肖、张士诚、高启、唐寅、祝允明、陆润庠、曹沧州、俞樾、谢家福、费树蔚等,都在桃花坞留下了踪迹。”但仅仅留下踪迹,尚算不上是这块地方的历史人物。中国古代讲究籍贯,籍贯于此,就是这个地方人。从这个观点上稍作延伸,居住于此,也算,称为流寓。再延伸一点,在这个地方为官,也算。五百名贤祠里有很大的一批,就不是苏州人。

按照柯继承兄的这张名单，仔细斟酌。苏轼与桃花坞的关系不大，他仅仅是章楶的好友，因为章楶在桃花坞居住，苏轼来访，作为访客，似乎不宜以桃花坞的名义写他。范成大，在桃花坞有第宅，有花圃范村，周必大《范公成大神道碑》说："先以石湖稍远，不能日涉，即即城居之南别营一圃，阅杜光庭《神仙传》，记胡六子自昆山□海至范村遇陶朱公事，大喜，曰：'此吾里吾宗故事，不可失也。'题曰范村。刻两朝赐书于堂上，榜曰重奎。其北又葺古桃花坞，往来其间。"但范成大是否就算是桃花坞人，学界尚有争论，似乎不写为宜，故也不收。高启是娄门外唯亭青丘人，他的被腰斩，与苏州府署有关，与桃花坞无涉。张士诚虽然渡江后曾住在承天寺，但他的主要活动却是在子城。除此以外，章楶、文天祥、郑思肖、唐寅、陆润庠、曹沧州、谢家福、费树蔚等，本书都写到了。

桃花坞有两个非说不可的人物。一为泰伯，一为唐寅。本书不收泰伯，因为朱红先生另撰有专著《细说泰伯》，唐寅也另有老凡先生所著《传奇唐伯虎》，但《传奇唐伯虎》属于历史小说，与本书宗旨不悖，故本书将唐寅收入。

本书传主写到晚清为止，民国以来桃花坞还有很多杰出人物，受篇幅限制，只能留待以后再说。并非是厚古薄今，而是按照先来后到原则。谨此说明。

写书犹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看到经过几个月的辛苦而终于成稿，还是有点幸福感的。

胡伯诚
2011 年清明时节